

公益慈善周刊

2013年6月12日

2013年第20期（总第074期）

◎政策点击

- 王建军：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年底有法可依 4
- 民政部关于《“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通知 8
- 民政部：推荐中华慈善奖造假者三年内不得申报 9
- 关于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公益招聘平台”开通的通知 9
- 基金会2012年年度检查结果公告（第二批） 10
- 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2012年年度检查结果公告（第一批） 12
- 青海出台首部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意见 将探索建设“慈善超市” 13

◎专家视野

- 徐永光：星光灿烂慈善 14
- 徐永光：政社互动，共建慈善新体制 16
- 徐永光：是时候对慈善体制开刀了！ 18
- 王名：社会体制改革的春天来了 20
- 陈健民：“独立性都成问题，如何谈公民社会” 23
- 陈健民：行动者，聚众而不闹事，温和而有力量 25

◎行业观点

- 人民网评：尴尬的社监委并非红会的救命稻草 28
- 光明日报：让评估成为衡量社会组织的“一杆好秤” 29
- 文汇报：孵化园“加营养”助社会组织“长结实” 32
- 京华时报：基金会应更多支持民间公益组织 34
- 南方都市报：公民捐赠活跃迫使慈善组织改革提速 35
- 南方都市报：基金会自律联盟还可以更好 36
- 羊城晚报：富人公益新阶段：做慈善不再是简单捐款 38
- 瞭望：拓展公众慈善信任空间 43
- 中国财富：谁在批评壹基金 46

福布斯中文网：中国式救援的五年嬗变	50
公益时报：让“儿童优先”成为社会准则	53
凤凰网公益：看身负财富和转型的中国 再论现代慈善理念	55
慈讯网：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	58
王龙玺：青年参与公益：细分领域的专业社群发展	61
孔志祥：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建设需处理好八个关系	70
杨鹏：公募基金会就是要刺激公众参与	73
冯永锋：环保组织探索“邦联制时代”	76
焦兴旭：也谈“公益托拉斯”	80
谢家驹：社会企业的中国命题	83
高连奎：公益慈善背后的“成本黑洞”	85
刘国林：媒体在现代慈善中的功能与运用	88

◎行业动态

社监委与红会“撇清”利益关系 重查郭美美事件提案仅获两票支持	90
广州慈善组织监委会名单公示	91
粤 25 家公益机构联名上书教育厅 倡建校园性侵防治体系	92
儿童慢性疾病救助被公益组织忽视	92
我国 74 家 NGO 或将联手造福大病儿童	96
红基金会发布《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98
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状况的调查	99
南海外来工 NGO 进驻盘点	103
第五届 SEE·TNC 生态奖：官民合作共创美丽中国	105
回龙观拼车进城 公益组织买单高速费	109
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候选名单公示	111
彩蝶计划发布《中国儿童领域民间公益图谱》2013 版	113

◎公益人

曲栋：释放生命的创造力	115
-------------------	-----

◎亮机构

爱报道工作室：小学毕业的农民创立的公民记者团队	120
EXiDEA：希望大学生都能做公益	122

◎国际观察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十周年庆特刊（五）：2025 年的非营利组织	126
国际非公募基金会募款方式观察	128
影响公益未来的十个先锋概念之一：开源运动	131
印度孟买“送饭工系统”揭示社会企业本质	132
耐心资本的黑暗之舞 ——敏智经验与启示	134
新慈善-阿诺德的“点球成金”模式	140
Kiva：让普通人开“世界银行”	145
盖茨基金未来十年主推避孕 从源头解决贫困	148
廉价马桶改善非洲家庭卫生	149

◎企业社会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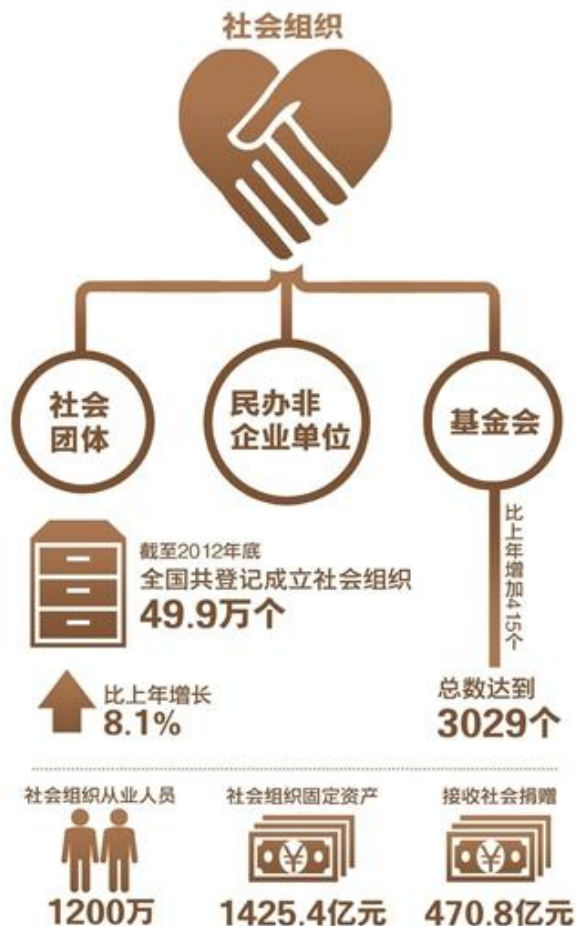
“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京召开	152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榜发布	153
“中国企业社工培育计划”企业社工认知度调查在京启动	154
《2012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基准报告》发布	155
央企社会责任：领先的尴尬	157
福特汽车全面拓展对草根环保 NGO 支持力度	160
信息技术助力南京非营利组织实现高效管理	163

◎公益布告栏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关于举办基金会培训班的通知	166
“社会性别与发展：社区项目策划与管理”培训	167

◎政策点击

王建军：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年底有法可依



今年初，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首次被纳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该方案明确，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4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这被视为具有社会组织发展里程碑式的意义。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面临哪些困难，如何解决？近日，本报就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专访了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王建军。

据介绍，涉及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具体细则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三个条例和相关配套规章正在修订中，修订重点将集中在改革登记管理体制、明确民政及相关部门权责等方面。修订工作将在年底完成。

现状

19 省份已开展直接登记

京华时报：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存在哪些问题？

王建军：目前，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社会组织还存在政社不分、服务能力不强、作用不充分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加以解决。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作出了部署，一方面将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等；另一方面也将有利于推进社会组织管理顶层设计，加快修订社会组织的三个行政法规，加速形成服务到位、监管有效、多方参与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新格局。

京华时报：方案公布到现在，目前直接登记的实行情况如何？如何保障落实？

王建军：事实上各地在推进直接登记方面，已经先行做了许多有益的实践。截至 2012 年底，广东、北京、安徽等 19 个省份都已经开展或试行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其他省份也在现有的政策法规框架内做着积极调整。

落实的保障在于法。目前，民政部正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配合国务院相关部门抓紧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困难

大多数县区无登记机构

京华时报：与以往的双重管理体制不同，直接登记将在管理上带来哪些变化？

王建军：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实施，可以说给民政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工作任务方面看，首先带来的就是直接登记工作量的增加。由于登记“门槛”的降低，社会组织申请登记数量将会大量增加，据初步统计，从《方案》公布以来，我部社会组织登记服务大厅接待咨询量成倍增加。登记数量的增加，必定会带来规范管理和执法监察工作量的增加。

直接登记后，随着政社分开的推进，双重管理体制下的部门职责要进行整合，做好职能顺利衔接、建立健全相关业务工作程序和制度，是摆在民政部门面前的急迫任务。

另外，登记管理责任和协调难度加大。如何增强社会组织能力，以有效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实现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综合体制机制，也都是民政部门亟待破解的难题。

京华时报：直接登记任务量大增，民政部门在登记管理队伍方面是否有足够的人员配置？

王建军：管理力量不足是个突出问题。据调查，全国绝大多数县区都没有单独设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呈现出“市缺、县无”的状况。430 个市级登记管理机关平均只有 2 个编制，县级机

关平均只有 0.7 个编制。全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面临着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形势、工作量与承担的工作任务、业务经费与承担的工作职能、管理手段和业务管理信息化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直接登记后，随着工作任务和职责的增加会更加突出。

举措

三个条例及配套规章正修订

京华时报：民政部门将如何解决上述难题？

王建军：我们正在加紧协调出台中央层面推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意见，加快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三个条例和相关配套规章，通过完善法规政策落实改革任务，化解工作矛盾。

其次，要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发挥政府有关部门分工合作、齐抓共管的合力，并要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加强组织自治，改进行业自律，推进社会监督。

同时，要转移职能、简政放权。把一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事务性职能转移给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并按照职能调整的要求加强社会组织登记机关建设，提升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夯实落实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组织基础等。

各部门职责是修订重点

京华时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三个社会组织行政法规的修订重点将在哪些方面？

王建军：三个社会组织行政法规的修订重点，将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改革登记管理体制，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的，以及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社会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外，成立社会组织将统一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同时，民政部门以及与社会组织相关的各部门的职责，将在条例中得到进一步明确，这也将是条例修改的一大重点。

民政部门将会承担起统筹协调、政策制定、宏观指导以及登记备案、年检评估、执法查处等职能，而各相关部门，则负责对本领域活动的社会组织进行行业指导、行为规范、提供服务等。

此外，创新管理方式也将是修订的重点，如鼓励同类型、同行业、同领域、同地域的社会组织成立自律性联合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务等。

京华时报：三个社会组织行政法规何时能修订完成？

王建军：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要求，今年 12 月底前，民政部将会同国务院法制办完成《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届时民政部门将可按新制度加强监督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扶持政府职能转移指导意见将出

京华时报：按照方案，社会组织今后将是承接政府职能的重要力量，政府职能该转移的要转出去，如何保证社会组织能更好地承接？

王建军：我们会致力于优化发展环境，加大扶持力度。下一步政府部门将加快职能转移，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将政府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民政部还将推动地方抓紧制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指导意见和转移事项目录，建立相应动态调整机制和公示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协调纳入政府产业扶持和社会事业发展扶持政策范围。

京华时报：在队伍建设等其他方面是否还有扶持政策？

王建军：在配套扶持政策方面，还将进一步完善。除了要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还要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扩大税收优惠种类和范围，逐步建立统一合理的社会组织税收政策体系。

在队伍建设方面，将协调推动各地各部门把社会组织人才纳入培养规划，研究制定专职工作人员职业标准，并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完善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保险政策，解决社会组织及从业人员实际困难等。

监管

将建综合监管体制

京华时报：社会组织监管问题日益凸显，民政部有何计划？

王建军：随着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其监管也将进一步完善。据统计，2012年全国共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案件1293起。总的来说，对于已登记社会组织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民政部门做到了查处及时、处罚得当，保证了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下一步将建立综合监管体制，着力建立健全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的综合管理服务体系，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管理、资金管理、信息公开、年度检查等制度，以及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维护社会组织良好发展秩序。

京华时报：在推进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方面，民政部门有何举措？

王建军：正在修订的三个行政法规，也将对社会组织自治权力进行规范，针对社会组织内部规范不明确、部分社会组织规范管理不够的状况，新条例拟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和活动准则，进行详细规定。同时，民政部门将研究建立社会组织引导型政策体系，包括制定出台全国性行业协会法人治理指引、社会团体选举工作指引、社会团体财务管理规定、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指引、社会组织商业活动指引等政策文件。

来源：京华时报

地址: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6/03/content_1994515.htm

[【返回目录】](#)

民政部关于《“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的通知

“中华慈善奖”是慈善领域的政府最高奖，是政府支持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体现，是政府对社会各界爱心善举的有效激励，是弘扬慈善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民政部通过成功开展八届“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民政部启动了《“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的修订工作。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现就《“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征求，欢迎社会各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有关意见和建议的征求时间为 2013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30 日。

感谢您对民政工作的支持。

民政部

2013 年 6 月 3 日

[点此下载《“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 登陆民政部网站[交流互动专版](#)“征求意见”栏目进入[意见征集系统](#)提交意见。

2. 传真：010-58123164

3. 电子邮箱：sunweidong@mca.gov.cn

4.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147 号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邮编：100721。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地址：<http://www.charity.gov.cn/fsm/sites/newmain/preview1.jsp?>

[ColumnID=362&TID=20130605091535246511295](#)

[【返回目录】](#)

民政部：推荐中华慈善奖造假者三年内不得申报

记者 4 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日前发布“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拟规定，被推荐或自荐参加“中华慈善奖”评选的个人、机构或项目，填报评审材料弄虚作假的，一经核实，三年以内不得再行申报。

根据这份征求意见稿，“中华慈善奖”评选表彰活动将每年举办 1 次，共设慈善捐赠奖、慈善组织奖、慈善楷模奖、慈善工作者奖、慈善项目奖、慈善传播奖等 6 类奖项，每次表彰名额为 100 名。

征求意见稿称，连续 10 年获得“中华慈善奖”的个人、机构和项目，由民政部向国务院推荐申请国家级荣誉。

“中华慈善奖”是慈善领域的政府最高奖，自 2005 年设立以来已成功举办八届评选表彰活动。

公众可登陆民政部网站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时间截止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来源：新华网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04/c_116031725.htm

[【返回目录】](#)

关于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公益招聘平台”开通的通知

各全国性社会组织：

2012 年 6 月 20 日，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民间中心）与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FESCO）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FESCO 作为民间中心的人力资源战略合作伙伴，协助民间中心为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社会组织提供人力资源服务。

FESCO 作为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在为广大中外企业提供专业人力资源服务的 30 多年中，一直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为拓宽全国性社会组织选拔人才渠道，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的公众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优秀人才从事公益事业，我们与 FESCO 在其官网上合作开辟社会组织“公益招聘专栏”，为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科技类、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免费刊登招聘信息。有招聘需求的上述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登录网址 <http://hr.npo.net.cn/v2> 注册，按照填报要求，填写、提交招聘申请表，待民间中心审核通过后，在 FESCO 官网刊登招聘信息。

特此通知。

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1306/20130600468065.shtml> [【返回目录】](#)

基金会 2012 年年度检查结果公告（第二批）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公告 58 家基金会 2012 年年度检查结果。凡公告的基金会，请于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持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到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大街 55 号王府世纪大厦 516 房间）加盖年检印鉴

序号	基金会名称	检查结果
01	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	合格
02	瀛公益基金会	合格
03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	合格
04	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	合格
05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基金会	合格
06	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	合格
07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合格
08	思利及人公益基金会	合格
0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	合格
10	纪念苏天·横河仪器仪表人才发展基金会	合格
11	张学良教育基金会	合格
12	中央财经大学教育基金会	合格
13	宝钢教育基金会	合格
14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合格
15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合格
16	北京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合格
17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	合格
18	中国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合格
19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合格
20	河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合格
21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合格
22	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	合格

23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合格
24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合格
25	中国保护黄河基金会	合格
26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	合格
27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合格
28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合格
29	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	合格
30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	合格
31	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	合格
32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合格
33	泛海公益基金会	合格
34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	合格
35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合格
36	中国航天基金会	合格
37	中远慈善基金会	合格
38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合格
39	南都公益基金会	合格
40	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合格
41	民福社会福利研究基金会	合格
42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合格
43	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	合格
44	中国海油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益基金会	合格
45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合格
46	开明慈善基金会	合格
47	中国检察官教育基金会	合格
48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合格
49	天合公益基金会	合格
5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合格
51	国家电网公益基金会	合格
52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合格
53	韬奋基金会	合格
54	中国绿化基金会	基本合格
55	中国电影基金会	基本合格
5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	基本合格
57	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	基本合格
58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不合格

民政部

2013年6月4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1306/20130600469177.shtml> [【返回目录】](#)

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 2012 年年度检查结果公告（第一批）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的规定，现公告 14 家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 2012 年年度检查结果。凡公告的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请于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持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登记证书（正、副本）原件到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 147 号 1326 房间）加盖年检印鉴

序号	名称	登记证号	年检结论
1	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	9501	合格
2	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9505	合格
3	世界健康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9506	合格
4	中华孤残儿童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	9507	合格
5	应善良福利基金会（香港）上海办事处	9508	合格
6	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	9510	合格
7	李嘉诚基金会（香港）北京办事处	9511	合格
8	半边天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9512	合格
9	梅里埃基金会（法国）北京办事处	9513	合格
10	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	9515	合格
11	中华浩德国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9517	合格
12	保护国际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	9518	合格
13	新希望基金会（香港）北京代表处	9519	合格
14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9520	合格

民政部

2013 年 5 月 24 日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地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zl/201306/20130600469699.shtml> [【返回目录】](#)

青海出台首部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意见 将探索建设“慈善超市”

青海省首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文件《关于进一步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5 月下旬起正式实施,《意见》从五个方面明确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将探索建设“慈善超市”。

据悉,《意见》从鼓励和规范各种慈善行为、培育和发展各类慈善组织、落实和完善慈善优惠扶持政策、建立和完善表彰与支持机制、广泛传播慈善文化理念等五个方面明确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出实行慈善组织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制度,并下放非公募性基金会审批权限,推行社区慈善组织备案制,探索建设“慈善超市”,健全慈善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政府购买慈善服务制度,并对企业、个人及政府部门用于公益事业支出部分,按规定减免相应税费。《意见》同时对捐赠人完整、如实、合法履行捐赠承诺,以及捐赠受益人合理、节约、依规使用捐赠财产提出要求。

来源: 中国广播网

地址: http://native.cnr.cn/city/201306/t20130603_512735297.shtml

[【返回目录】](#)

◎专家视野

徐永光：星光灿烂慈善

明星是慈善的宝贵力量，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今天，明星慈善既需要社会爱护，也需要自我提升。

大凡明星，几乎没有不做慈善的。

明星吸引人，慈善感召人；慈善需要关注，明星追求人气。明星与慈善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相得益彰。

明星慈善的经典之作，莫过于爱尔兰摇滚歌星鲍勃·格尔多夫发起的为非洲筹款的两场演唱会了：1985年的“Live Aid”（拯救生命）群星慈善演唱会，为非洲筹款5000万美元；时隔20年后，“Live8”世界巨星义演在全球十大城市再次唱响，100多位著名歌手轮番上场，威尔·史密斯、布拉德·皮特、安吉丽娜·朱莉等影星客串主持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政治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发表演说……这场义演吸引了全球30亿人收看，募款1200万美元。

试想，世界上还能有谁——无论是政治强人、财富大鳄或是思想巨人——能在短时间内搅动数十亿人的神经，去关注一个远在非洲的贫困问题？没有别人，唯有明星。因为他们拥有数目庞大的粉丝。

明星慈善在中国起步并不算晚。20多年前，台湾艺人凌峰来到大陆，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希望工程百场义演。义演活动历时七年，凌峰分文未取。希望工程借助明星的影响力更加深入人心，凌峰的名字也在大陆家喻户晓。

实际上，明星慈善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他们本人捐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们影响了多少人去了解和参与慈善，在于他们对慈善文化和志愿精神的正面倡导，也在于他们身体力行地投入慈善活动和社会创新，为世人做出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讲，李连杰堪称典范。

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从挂靠中国红十字会敲开“人人公益”的大门开始，到在深圳获准注册独立的纯民间公募基金会，直至芦山地震发生、在紧急救援中壹基金接受公众“大考”的表现，李连杰的慈善创新之路可谓功德圆满。

芦山地震发生后半个小时，壹基金便启动灾害应急动员机制，一小时后，首批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此次地震救援中，壹基金与100多家公益基金会和草根NGO一起，高扬民间慈善的大旗，借国家民政部首次提倡由公民自主选择受捐机构的政策之利，以专业、高效、透明赢得了公众信任。震后短短两周，壹基金就收到来自160万民众的捐款2.5亿元人民币，数额既超过红十字会总会，也是中华慈善总会的五倍。芦山地震救援行动，是中国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慈善捐款由公

民自主选择自己信任的机构、“用脚投票”的开始。看来，中国民间慈善转折点的代表，非壹基金莫属。

行文到此，不免要多说几句题外话。芦山地震发生后，面对壹基金大受追捧、红会备受质疑的局面，李连杰表示：“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这是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从2007年到2010年，假如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提供的受捐运作平台，李连杰的“壹基金计划”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在壹基金离开红会走向独立时，舆论界曾有过“离婚”还是“嫁女”的定义之争。“离婚”是悲剧，还要分财产；“嫁女”则是喜事，可以陪嫁妆。实际上，红总会不仅支持壹基金独立门户，还把壹基金筹募来进入红会账户、法律上已经归属于红会的公益资产，继续用于支持独立后的壹基金开展公益项目，颇有“扶上轿送一程”的意味。今天，壹基金成功了，红会也脸上有光。

在明星慈善中，李连杰是属于投入生命的一位，而且非常专业。即便如此，他也挨骂。骂他最多的话是，“你自己那么有钱没捐多少，凭啥让我们人人捐一元钱？”但是，看到芦山地震中160万人给壹基金捐款后，那些骂李连杰的朋友可能会理解他了。这可比他自己捐多少财产都值钱！

在中国，做慈善很难，明星做慈善亦不例外。甚至有“明星慈善，掌声少、骂声多”的假象。事实上，掌声一响就过去了，骂声则带有现代传播的病毒功能，容易持续发酵。从正面理解，既然做慈善，明星同样需要接受公众监督。骂声，也是明星慈善成长的必要经历。当然，对明星慈善不应苛责，毕竟慈善不是多数明星的专长。用媒体狂欢消费明星慈善的某些并非道德层面的瑕疵，伤害明星慈善的热情，则很不足取。

汶川地震后，章子怡深陷“诈捐门”。笔者在向有关基金会了解情况后，通过央视等媒体给予辩解：章子怡的捐款没有及时到位，有外部客观原因和个人疏忽责任，不属于“主观故意”欺骗大众。因而，给章子怡扣“诈捐”的帽子是不妥的。

章子怡的案例也给了明星慈善一个正面启示。在其后由陈道明、张国立、冯小刚三对夫妇联名发起的“心系旱区，送水赈灾”活动中，他们将个人捐款发票扫描件公布在网上。冯小刚说：“我有些朋友也响应倡议捐了款，我跟他们说，一定要拿好发票。我不希望大家做了善事反而被说。”此举在演艺界影响很大，公众反应甚佳。

明星还有一个优势，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慈善。尽管这不属于明星慈善的讨论范围，但鉴于明星的传播力，也需要他们在创作时怀有社会责任感和必要的专业知识，给社会传递正能量。笔者曾对央视春晚小品《捐助》误导公众表示愤怒，后在《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上分别发表了《赵本山的〈捐助〉不仅误导公众还会成世界笑料》《赵本山〈捐助〉受捧乃公益之悲》的评论。如此较劲，盖因小品渲染了一个公开劝募活动中的种种怪态：捐款人不知道自己捐了多少钱，组织者多收了十倍捐款悉数由受助人拿走，受助人给捐款人送礼、下跪、认亲、退钱，一个有组织的公益

慈善行为最后竟以“私了”收场。在希望工程实施了 20 年之后，央视春晚还如此误导公众，实乃公益之悲。

明星的影响力加热情，是慈善的宝贵力量。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尚处初级阶段的今天，明星慈善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既需要社会爱护，也需要自我提升。星光灿烂、灿烂慈善，此为明星慈善的题中应有之义，亦为社会之福。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3/0605/1322.html>

[【返回目录】](#)

徐永光：政社互动，共建慈善新体制

中国慈善体制改革已经艰难启动。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社会体制改革”，要求“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现行慈善体制，可以说是政府主导、主办、垄断的，是扭曲了慈善本质的体制。慈善体制改革正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十八大以后，慈善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开始。

2012 年 11 月 21 日，李克强副总理发表文章指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开、事业和产业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按照上述布局，一部分事业单位改革后将与民办非企业单位合流，成为民办事业单位。

2013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方案包括四类社会组织即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会服务类组织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5 月 13 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政府该管的事必须管住管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指出“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政府）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构。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对企业、老百姓和政府，都是‘惠而不费’的好事”。这可以看成是对公共服务领域计划经济、政府包办的体制的反思，且提出了多元发展新机制的构想。

4.20 芦山地震发生后，民政部首次提倡由公民自主选择救灾受捐机构，公民开始用脚投票，支持那些专业、高效、透明的慈善机构。据说壹基金收到来自 400 多万公众的捐款 3 亿多，数额数倍

于红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芦山地震救援行动，是权力开始退出慈善捐赠市场的转折点。

当然改革的道路还很漫长。毕竟改革属于权利的博弈、利益的博弈，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是要壮士断臂，割政府自己身上的肉。

目前慈善体制改革的总态势是，中央政府有了明确目标和操作路线，社会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社会对于官民一体的慈善体制容忍度已经到了极限，甚至失去了耐心，对慈善机构的批评不断成为社会热点。这些批评有理性的，有不理性的；今天是对红十字会，谁知道明天会对谁。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组织、特别是那些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是否在认真了解和呼应这个变化，是否做好了改革的准备或已经着手进行改革，我看整体上还没有动静，还是死水一潭，麻木不仁。古医书讲：“皮死麻木不仁，肉死针刺不痛”。依我看，有不少长在政府身上的官办慈善组织，已经到了皮死或肉死的地步；政社分开，去行政化，失去权利的背书和蔽护，可能会要一些机构的命。因此很多机构会固守利益，抗拒改革。

现在，球已经踢到了慈善行业这边来，改还是不改；自觉改还是被动改；到底怎么改？这是慈善行业，每一个慈善机构都必须回答的。当然，对于一些机构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比如说，全国县以上慈善总会 1923 家，几乎都是退休官员做领导人，真正懂慈善的能有几人？有改革想法的又有几人？

没有政社互动，没有慈善行业的积极回应，慈善体制的改革前景堪忧。如果慈善行业继续被动下去，甚至抗拒改革，只有等着被社会抛弃，也许只有置于死地而后生一条路了。

最后，政社分开，直接登记，慈善行业会不会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讨论不改革会不会乱？我看，不改革不仅会乱，而且已经在乱。因为慈善是政府控制，政府办的，乱就是给政府添乱。政府因为怕乱，只好保护那些问题机构，造成慈善的溃败，发展下去，可能酿成大乱。

改革，放开，让慈善回到民间定位，保持独立性，与政府拉开距离，也许会有一个混乱期，但这不可怕。正如我在批判以权谋捐文章中说的“民间属性的慈善，有法律规制，政府监管，舆论监督，行业自律，公众自主用脚投票，自会走上公开透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道路，越办越好。慈善一旦被权力劫持，上述一切规则都失灵了。今天，慈善这点事总搞不好，令人纠结，不正是该民间做的不让民间做、不该政府做的政府抢着做、该政府做的政府又不好好去做造成的吗？”

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

地址：<http://mjj.mca.gov.cn/article/shgz/201306/20130600467449.shtml>

[【返回目录】](#)

徐永光：是时候对慈善体制开刀了！

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公益慈善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一头磕在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公益慈善体制上，余痛未消，偏遇上信任缺乏、资讯高速传播的时代，在真相与谣言的摇摆中更显乱象。

5 月 29 日，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以“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为题，从社会体制的定义与功能谈起，探讨政府与慈善行业在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中的角色与功能，试图提出改革路径与解决方案。

会上，“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发言振聋发聩：“社会体制改革最迫切的就是慈善体制改革！该对官民一体、政社不分的慈善体制开刀了！”他指如今的慈善体制为“不伦不类、人格分裂，不思改革、固守利益，自甘堕落、麻木不仁，拖累行业、伤害社会，再不开刀，误国误民！”

到了改革的时候！

“当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经济大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契机，在慈善事业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慈善在社会体制改革中的杠杆作用……”被“负面新闻”缠身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情绪似乎并未受太大影响，在论坛上慷慨陈词。

出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王振耀，曾见证了中国社会近 30 年的转向：1977 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 年，民政部组建基层政权建设司，王成为该司下属农村处处长。2001 年，他出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2004 年推动组建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负责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担任司长——他的每一步，似乎都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颇让外界关注的是，2010 年他辞去民政部职务，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现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王振耀说，2012 年，我国人均 GDP 增长至 6100 美元，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未来五年内完全可能超过 1 万美元，迈入发达国家门槛。“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整体格局将迎来新变化，在国家战略、政府职能及社会理念等方面都将进行一次全面的转型。”

同时，他指出，这也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房价虚高、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暴力拆迁、视频安全、环境污染——在他眼里，当下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莫不源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而解决之道则是加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中等发达水平意味着国家职能的系统转型。国家的职能不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此外，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使人们更加寻求尊重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要求社会需要形成宽容与尊重的社会心理。”王振耀认为，社会体制改革要落脚于社会服务，而社会服务的

开展需要发展各式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

他执着地纠正人们对“草根组织”的称谓，认为应该叫作“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理由是草根组织中也有很专业的机构。

徐永光：愿当慈善体制改革的“刽子手”

然而，社会组织生长却受限颇多。过去双重管理体制，将大批潜在的社会组织拒于门外。

2009 年底，王振耀和徐永光、杨团、陈健民、冯燕五人发起百人论坛时，就遇到过登记注册的门槛。因百人论坛涉及两岸三地人员，在当下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中，很难注册下来。最终，百人论坛为解决合法性问题，只好作为一个项目挂靠在非营利组织之下，一直开到今年的第七届。

今年，作为论坛轮值主席的王振耀成为首位发言人，他首先掷出话题：放宽登记注册。“一是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其次，进一步扩大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权限，将当前一些省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资格的尝试扩大至全国。”

但是，百人论坛唯一的一名政府官员却提出疑问：“我们以为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拼命去追，追到之后发现不是我们想要的。放松管制到底是不是最重要的？”

这名官员担心，放开登记注册将导致混乱。未等她说完，徐永光便激动地说：“这个‘乱’是再正常不过的！之前的‘乱’是政府控制下的乱象，以后的‘乱’将是‘活跃’！”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则举广东为例：需要前置审批时，很多公益组织想注册却无法注册，很混乱。改成直接注册登记之后，反而不乱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郭宇宽则补充道：“这和改革开放之前的讨论是一样的。”

及至下午，与会者稍感昏沉，“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发言却相当提神。他说：“社会体制改革最迫切的就是慈善体制改革！该对官民一体、政社不分的慈善体制开刀了！我愿做这个拿刀的‘刽子手’！”他指如今的慈善体制为“不伦不类、人格分裂，不思改革、固守利益，自甘堕落、麻木不仁，拖累行业、伤害社会，再不开刀，误国误民！”此言激起掌声雷动。

徐永光话锋一转：“这是基本状况，但是也有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基会’）杀出了一条道路，青基会也在改革。今天还有好消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宣布推出了向全国草根组织开放的联合劝募平台。”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扶基会的改革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当时的背景下，仅此一家。“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不具有代表性，但确实是一个改革的成功范例，其实是为其他公募基金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样板。改革就会有活力，募款的额度会急剧地增长。”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6/03/content_1869701.htm

[【返回目录】](#)

王名：社会体制改革的春天来了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近期最出名的，大概要属两会期间一段关于“放开二胎管制”的言论。看似无望的呼吁，触及了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养老危机。一名学者的担当可见一斑。作为国内最早接触NGO的研究者，王名用了15年将一个边缘学科拉进了主流研究范畴。最近，他频频挥师南下开讲座，被业内形容为是来送“鸡血”的。对社会改革持乐观态度的他，5月28日在中山大学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部分官员对公民社会仍存较大误解”

南方都市报公益周刊（以下简称南都）：能否谈谈中国NGO的发展历程？

王名：先看社会系统，上世纪80年代缺乏法制，但整个社会在迅速成长中；到了90年代，完善了制度，社会在政府的清理整顿、规范中前进。2000年以后，就是社会系统的迅速发展时期。再来看NGO的发展，2006年之前，政府的态度趋于保守，不支持也不限制，那个时候国内NGO发展很快。2006年之后，政府从监督、培育、管理并重转向支持发展为主，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政府探索的过程。而从现在开始应该是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里社会组织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南都：现在政府的确培育了不少社会组织，但有一些做法仍是“运动式”的。这些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垄断了社会资源，也没有建设公民社会的理念。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王名：社会组织的概念是在2006后才开始有的，并频繁出现在政府的文件、工作报告中。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社会系统的发育需要力量，我把它叫“还组织于社会”。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我理解为，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建设公民社会。政府现在主动面对公民社会，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官员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仍存在很大误解，过于敏感，贴标签。其实完全可以定义一个共产党领导下，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公民社会。

党的领导和公民社会并不是对立的。其实要讲公民社会的历史、内涵，它跟社会主义的关系更近。把公民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是错的。习总书记上台后说要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能不能恢复对马克思主义公民社会的信仰？如果马克思的理论包括公民社会理论，我们可以下个定义，讨论公民社会的内涵是什么，不要乱贴标签。

可以有美国的公民社会，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公民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离社会主义很近，马克思讲的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公民所有制，公民所有制是跟公民社会非常接近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政府官员不了解这个概念，没有论证清楚，在理论上就已经认识错误。

“顶层设计在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改革”

南都：你这次来广东，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说，呼喊“春来了”的人来了。现在真的迎来了社会改革的春天了吗？

王名：我的分析是这样的，从改革开放致富至今，就存在一种很强的、自发的、由市场经济发展本身释放社会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一开始就存在，而且一直在进步，包括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服务的提供、社会治理，都在积累这样一种动力。现在我们看到，从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在今后改革方案中间，顶层设计在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改革。

我把广东的改革看做是来自顶层设计的一种。两会后，全国政协社法委来广东做了一次调研，广东走完后又去浙江走了一圈。我基本的判断是，浙江的改革是一种社会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广东的改革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顶层设计推动的，尤其在制度层面。现在这种力量表现在中央层面，一种难得的、顶层的力量开始达成共识。它是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在一种普遍的危机意识下，形成的共识。这样两种力量，有可能实现一种上下互动。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社会组织发展或者社会体制改革的春天来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全面展开，它需要一个过程。

南都：有人说你过于乐观了？

王名：其实我是一半在解读，一半在期待。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中国是有希望的。我们去 MIT（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美国人说中国没希望了，钱和官员、精英全都跑了。我当时回应他们，中国的希望在那批腐败的官员身上吗？他们代表过去的中国。我们这些年轻的官员会到美国来吗？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我们相信、热爱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在努力。那些腐败的官员其实已经死了，不是他们抛弃了这个国家，而是被国家、这个国家的未来抛弃了。这个体制里面还是有很多努力、干净的官员，包括我们现在学政务的学生，财富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追求的是个人、所在地方、社会的进步。有未来的人不会为了钱财糟蹋自己的未来。现在很多官员都已经认识到“当官不发财，发财不当官”。只要这些人在，中国就会有希望。这是我乐观的根据。

南都：你觉得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吗？

王名：改革本身很难说是自下而上。自下而上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但改革的整个设计、战略和推进一定是自上而下的。村民自治已经做了探索，看上去是自下而上的，但最终也是自上而下的。

南都：就你的判断，中国未来的改革图景是怎样的？

王名：我从新领导人那里读到了一种社会改革的倾向。很多问题都不是政治改革能解决的，比如上访、利益集团、土地、住房、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拆迁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社会改革得到有效的化解。在整个社会系统发育成熟以后再启动政治改革，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途径。

中国的改革，社会建设要先行，但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建设会达到一

定的程度，这对未来的改革是一个很积极的过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让社会稳定，这个稳定的系统对于下一步的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经济改革也会遭到很大的危机。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最担忧没等社会建设好就已经溃败”

南都：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王名：社会溃败。一方面社会没有长起来，一方面社会问题越来越激烈，这个过程中社会溃败是存在的。就怕没等社会建设好就已经溃败，这才是我最大的担忧。但还是有希望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上和下两种力量，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怕的是上没有动静，下面在使劲推动，下面面临的阻力又很大。

南都：作为一名研究 NGO 的学者，你如何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社会转型期，你认为学者的作用在哪里？

王名：我把自己定位为一种实践研究，也参与 NGO 的一些实际工作，包括创办 NGO，当理事长。我是有偏向性的，尽可能去理解、支持 NGO 的工作，不是中立的角色。我支持、捍卫 NGO 的权益、政策层面的诉求。学者的作用应该在两方面，一是观察和把握社会进程和发展方向，另一个便是影响政策。中国在改革转型期，思想上、制度设计层面需要更多的智慧，包括政策的制定、立法的过程，学者要尽可能参与这个过程。

南都：说到参政议政，你应该是很有经验了，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据说，今年初，还出版了一本《建言者说——十年政协提案小集》，这是为什么？

王名：政协提案很多是没有效果的，但我还是认真地做了这个过程，我希望我的提案能够记录下来。这是对我自己负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建言这方面的也已经成熟了，从一开始的不懂到后来可以驾轻就熟。我也知道有些建言政府根本不想采纳，但我的目的是想让社会知道，发出我的声音来，让社会达成一种共识。比如，今年两会呼吁“放开二胎管制”的提案。

从改革开放致富至今，就存在一种很强的、自发的、由市场经济发展本身释放社会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一开始就存在。——王名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6/03/content_1869702.htm

[【返回目录】](#)

陈健民：“独立性都成问题，如何谈公民社会”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陈健民教授提到“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越来越小”，让不少草根 NGO 感慨不已，在当今中国目前的国情及政策下，NGO 该如何突破公民社会越来越小的局面，用自己的服务及行动赋予中国公民社会更多力量？NGOCN 为此专访采访陈教授。

NGOCN：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您提到中国大陆“第三部门越来越大，公民社会越来越小”，我听到不少 NGO 同行对这句话很有同感，这句话具体指哪些方面？

陈健民：我看到目前很多中国社会组织，第一，只做服务，或者只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做服务；第二，相对政府而言，很有可能变成“二政府”，因为政府把这些职责交给他们，你只是政府的延伸，但公民社会不仅仅做社会服务，公民社会有很多内涵，还包括监督政府等，退一步讲，这些社会组织需要有独立精神，如果连独立性都成问题，如何谈公民社会。所以我很强调独立精神、参与感等等，至于是否要对抗、博弈等等，这都是策略问题。

NGOCN：近几年来，社工机构在政府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不少社工机构依赖政府提供购买服务资金，而且更加注重提供服务而不是倡导监督，如何转化他们这样的地位，从而使其服务于培育公民社会呢？

陈健民：我在研究香港案例的时候，即使是面对 SARS 这样的危机，出来倡导的都不仅仅是平常所见的倡导性组织，而是不少专业机构，甚至社区机构都会出来向政府提出各种意见，甚至向政府施加压力，监督政府，这些说明过程是能进行转化的。

但这种转化需要一定的基础，比如香港政府能为社会福利团体提供稳定的资源，而且不是随便可以剥夺的，即使我拿不到政府的拨款，也可以进行（公开）筹款，所以这些福利团体安全感及独立性比较强。

反观中国大陆不少社工机构，在资源上完全依赖政府，而且不能独立筹款，同时政府赋予官员较大的权力，可以随便剥夺这些资源，那就会失去独立性，这很让人担忧的，但这个转换过程仍然是可以发生的。

我其实也看到不少成功转换的例子，包括香港的一些社工机构，政府有时候也不希望它们去做社区参与，但是有些社工机构本身有这种理念，而且很聪明，他们在培育志愿者的时候，可以推动志愿者组织一个新的机构去做社区参与，即使不能直接实现社区参与，但通过传达这种社区精神，培育了一个草根组织来进行社区参与，只要你有这种精神，总会能找到对应的空间，但如果完全没有这种精神，就很难找到这种空间。

另外，我们看到某些政府，比如英国政府在新工党时期，在贝里雅担任首相期间，推动社会组

织与政府签署了一个契约，契约内容要求这些 NGO 或者服务组织不仅仅提供服务，还需要产生社会资本，就是提供机会让大家能参与，并且联结起来学会通过自身能力解决问题，另外还需要强调公民权利与公民参与，就是不仅要联结起来，还需要有公民意识，对政府的施政提出意见等等。这是英国政府当时对社会福利政策的反思，认为不能仅仅靠政府提供拨款，以社工机构为主力解决社会问题，因为如果人民不参与进来一起解决，是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社会问题；另外，由于政府出台的措施常常引起很多争议，不如在出台前就让民众参与，提供意见。

这些经验跟国内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需要鼓励居民的参与，更应该鼓励居民参与到政策制定上去。另外，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是否有一个客观的评估标准，并且政府尊重且严格执行，让政府不能随意剥夺社工机构的相关资源，这对社工机构的独立性是很重要的。

NGOCN: 就上述的一些问题，是否有一些破解的方法？

陈健民：需要突破筹款的瓶颈，徐永光先生提到要推动中国体制改革，首先要从慈善制度开始，而主要就是筹款的问题，你不打开筹款大门，大部分社会组织只能依赖政府，不可能有独立性。同时，NGO 需要发挥能动性，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筹款方式，即使得到政府资助，也不能放弃自己筹款的能力，如果不这样就很危险。

另外，我也非常看重理念的培养，因为目前整套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传播意识形态，好像在暗示社工及社工组织就等于公民社会了，就是第三部门等等，所以一定要有个平衡的声音，在大学教育中，比如高校社工教育及民间培训中，强调公民社会的理念，而不只是注重财务、人力等的技术能力。因为即使发展了更好的专业知识，但从一开始就没有摆清楚自己的位置，没有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提供服务，也同时肩负给政府提意见，监督政府的责任，这样就很危险。

NGOCN: 目前政府及公众对于 NGO 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包括财务透明、信息公开、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等等，面对那么多要求，NGO 不得不注重自身的财务、人力等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坚守自身的理念，其实这些对于 NGO，尤其草根 NGO 的生存压力很大。

陈健民：那需要同时回应这些要求，比如政府需要我公示透明（财务信息），那政府本身会公开透明吗？或者政府希望 NGO 向公众交待，那请问政府是否支持这些草根组织，然后才对他们有所要求，这些要求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其实里面存在很多问题，当你单独拿出来讲是有问题的，因为（权利及义务）没有，对应也不是整体来看问题。所以政府需要先做好自己本位，否则这套话语权扩展下去，大家就会认为这些社区服务跟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是没有区别的，只是现在由政府管理变成比较社会化管理。

来源：NGO 发展交流网

地址：<http://home.ngocn.net/space-21892-do-blog-id-26983.html>

[【返回目录】](#)

陈健民：行动者，聚众而不闹事，温和而有力量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公益界涌现出不少行动者用行为艺术等方式，去表达对公共话题的关注及诉求，这种极具荒诞感的表达方式，成为了新媒体及传统媒体的宠儿，但同时也引来各种争议，曝光在聚光灯下的行动者，反而显得格外孤独无助，甚至有时还不能确保自身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在这个无所不能人肉的网络时代，无论是 NGO 还是行动者，该如何去拓展公共讨论空间，推动社会改变呢？NGOCN 就此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陈健民教授。

NGOCN: 近两年公益圈涌现了不少青年行动者，比如雷闯、女权主义者等等，作为一种新生力量，他们通过行为艺术等方式去拓展了不少公共话题的空间，这些跟传统维权或暴力方式很不一样，请问陈老师如何看待这些新生力量呢？

陈健民：我很欣赏这种做法。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如果采用完全暴力的方式，虽然也可能对官方产生影响，但是会疏离了主流人群，现在我们需要让自己从一个边缘的位置逐步走进主流社会，让更多公众可以了解我们。因此，需要采取比如非暴力的方式去获取主流社会的支持，能与公众产生更多对话，从而进一步让公众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为了过瘾或闹事，而是希望去关注或推动更多人关注这些社会议题；也需要让公众明白，我们与公众一样，公众可能看到的是传统慈善或者一个个由社会问题产生的个案，而我们所关注的是个案背后的社会制度结构等等的问题，而这些行动者就是推动公众去关注这些问题，并且推动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需要不断与公众解释，否则大家可能认为这些年轻人在“搞搞震”（捣乱），但他们已经很厉害，因为他们已经在逐步争夺话语权，以及进入议程设置。我很欣赏这些做法，也很受鼓舞，我更希望这些行动者和提供服务的机构，可以有更多互动。比如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简称 SoCO），他们做了很多行动，但也取得不少市民的支持对他们进行捐赠，他们也为社区提供很多服务，这说明服务与政策倡导是可以结合的。

目前做服务的机构不知道做政策倡导的重要性，做政策倡导的机构或人虽然理解服务的重要，但觉得不足，如果政策倡导能与服务结合，就会变得有群众基础。比如我以前做社工的时候，当我想做政策倡导，例如争取建一家医院，我是需要群众基础去举办居民大会之类，这些就与我们社工机构的工作联接起来，老人中心会带老人过来，儿童中心就带来了儿童的家长等等，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向他们解释，因为他们平常已经很信任我们中心所提供的服务，所以在信任的前提下与他们解释为何要做政策倡导，他们更容易接受。

所以做政策倡导的机构或个人如果能逐渐与提供服务的机构进行互动，通过服务机构向群众解释为何做倡导，就会拥有更多群众基础，而不仅仅是那么几个人不断采用行为艺术。目前这种（人

少) 状态是可以理解, 因为都是自愿发动, 但到了下一个阶段, 需要群众呼应的时候, 没有群众基础就很难对政府施加压力或者进行监督。

这个跟之前的组织方式不同, 之前是人多就容易闹事, 现在说不闹事但人数少, 但如何能聚众而不闹事, 即是有群众基础, 但同时也用很温和也很有力量的方式去做, 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思考的。

NGOCN: 这与最近观察到的一个案例很相似, 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叶海燕最近做了一个“开房找我”的行为艺术, 在微博及互联网上成为了热门话题, 但随后发出微博求助, 说他们家人被滋事干扰, 而最后叶海燕为保护自身及女儿安全怀疑伤人被拘, 这种反差很大, 请问陈教授如何看待?

陈健民: 这种力量其实是很脆弱。动员大家参与能有很多力量, 比如抱团互相支持等, 但一旦聚众闹事就会将群体边缘化, 政府很可能采取极端的措施, 而小众做事, 可能会得到社会同情, 但出了事情就会变得无助, 所以需要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 聚众而不闹事, 温和而有力量。

NGOCN: 在这次儿童受到性骚扰事件的倡导行动中, 也有一些行动者选择到妇联举牌抗议, 此举引起一些讨论, 有人认为不应该针对妇联组织, 而是应该针对更具有决策及进行处理的部门。对于这些在公众里面的不同意见, 陈教授有什么看法呢?

陈健民: 我认为不能这样看, 妇联事实上也是一个官办 **NGO**, 某种程度上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 而且应该特别针对女性儿童问题发声, 而不是仅仅举办活动联谊等等, 他们有责任对妇女儿童的制度体制问题进行回应及采取措施。

但无论是行为艺术还是举牌抗议, 其实还应该和相关调研做支持, 比如调查妇联去年共获得了多少资助, 其中款项用途是按照怎样的比例进行划分, 多大的比例用于救助那些遭遇家暴或者边缘化的妇女儿童群体等等。如果有了这些数据及调研做支持, 那么公众就会认为, 这些行为艺术不是为了捣乱, 而是有理性和有系统地在做事情。

做一个好的倡导活动, 首先应该有一个好的研究基础, 但通过研究摆事实政府可能不听; 所以第二需要有群众基础, 需要学习如何动员群众; 第三需要有媒体策略, 目前行动者可能做得比较好的是这个; 第四需要有政治机会, 就是掌握在什么时机取得这个政治机会, 包括你需要与政府某部分有联系, 寻求官方中的支持者, 或者看到政府部门之间有矛盾, 在这个节点上采取行动, 让政府不得不回应你, 这几样东西都很重要, 一个完整的倡导将会包含进去。

目前我们这些青年行动者比较擅长利用媒体策略, 但对于其他三个要素, 其实仍未能充分掌握, 需要具备所有要素, 这些倡导运动才会真正推动社会改变, 而不是纯粹做各种各样的行为艺术, 但作为一个起点, 我认为很厉害, 但目前需要深化, 需要看到仍有三样东西没完成。

NGOCN: 如果要完成所有要素, 单靠行动者个人努力是不够的, 请问行动者与 **NGO**、研究机

构，包括政府等等，如何产生互动呢？

陈健民：当你慢慢成熟以后，就会产生互动。因为如果你需要推动某个政策或者改变，就不能单靠零零散散的一次次行动，需要可持续持续关注同一个议题，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案，包括研究这些，个人很难做到，所以慢慢会走向组织化，构建出相关的网络。所以如果要推动倡导，影响政策，组织和网络是要产生互动的，目前行动者的方式只是引起关注，做到了媒体策略，但要做到四个要素都有，你慢慢发现组织及研究要做，否则很难做好四个要素。

NGOCN：对于目前的青年行动者，你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特别想跟他们说的么？

陈健民：我觉得他们已经很聪明，不走传统的维权之路。在当前中国威权统治的情况下，不建议采取暴力维权的方式，特别是年轻人，我不想看到有这样的牺牲。而从世界潮流来说，无论是香港、美国等等，最主要的倡导力量来自于网络及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善于使用网络，所以他们可以通过网络把很多讨论联结起来，包括对话、讨论、策划行动等等，然后在关键时候用行动推进，所以我很寄望年轻人，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就是年轻人联结起来推动世界的改变，也有信心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

来源：NGO 发展交流网

地址：<http://home.ngocn.net/space-21892-do-blog-id-26984.html>

[【返回目录】](#)

◎行业观点

人民网评：尴尬的社监委并非红会的救命稻草

2011 年 6 月，因为郭美美事件，红会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至今未能消除。去年 12 月 7 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社监委”）成立，但是社监委陷入舆论质疑的漩涡，无法脱身——先是被指为红会公关部，继而多名委员被疑与红会有利益关系，是红会的“卧底”。6 月 9 日，社监委将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社监委定位、职能等问题将提交讨论。

社监委是第三方独立监督机构，由 16 名委员组成，与红会是监督与被监管的关系。当初，社监委成立，旨在通过监督红会，提振红会公信力，提振红会的正面形象，但从现实反馈看，不仅红会形象并未因之好转，社监委也被“拖”下水，遭遇尴尬，甚至被讥为由红会养着的“公关部”，这一幕恐怕谁都没有料及。

社监委今日尴尬，并不奇怪。这是因为社监委的一些委员确实不够独立，甚至与红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串联。同时，社监委目前的工作成效与公众预期尚有较大距离。成立半年来，社监委确实做了一些事，比如查证成都红会捐款箱长毛事件，要求红会对全国的捐款箱进行排查，以及在芦山地震期间多次为红会辟谣等等。这些事情不能说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或者说仅靠这些工作不可能重塑红会公信力。红会遭遇的信任危机，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化解，也不是社监委做了三两件事就能达到奇效，使红会恢复公众信任。重塑红会公信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刀阔斧改革，需要持之以恒的信息透明，也需要反腐动真格，如果社监委只是在门外“兜圈子”，注定徒劳无益。

如今，面对公众质疑，社监委意识到了危机，有委员透露，在 6 月 9 日的会议上，委员们会对社监委的定位和职责进行讨论，给予社监委一个明确定位。这种讨论是必要的，等到信任危机不可收拾之际再讨论就迟了。社监委以监督红会为己任，但谁来监督社监委？社监委本身也需要监督，社监委的健康成长离不了公众强有力的监督。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社监委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势必无法监督好红会，也不可能赢得公众信赖，一旦声誉破产或者频现问题，必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当然，社监委不是红会的救命稻草，不能指望社监委一出马，红会就立即重回昔日的荣耀，赢取公众的信任。这一点，社监委委员王振耀说得很清楚，“红会的信用不能靠社监委来挽救，社监委只是帮助红会的一点点力量。”这一点点力量用好了可以事半功倍，用不好则事倍功半，不仅加重红会的信任危机，还透支公众当初对社监委的美好期待。

社监委何去何从，将如何定位和履行职责，需要公众耐心等待。不管它的走向如何，红会都有责任继续接受公众监督，更有责任公开、透明、廉洁、高效，提高公信力。谁能挽救了红会？不是社监委，也不是公众，而是红会本身。

来源：人民网

地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609/c1003-21797347.html>

[【返回目录】](#)

光明日报：让评估成为衡量社会组织的“一杆好秤”

2007 年，民政部启动了首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参与评估的只有 62 家，评估对象仅仅是基金会。

2013 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参与第 6 批评估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已达 661 家（不含复评基金会 47 家），评估对象涉及行业协会商会、学术类和公益类团体等 8 类社会组织。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等待评估，怎样让评估成为衡量社会组织并促进其有序发展的“一杆好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都要上秤”？

在国际上，评估已经成为衡量和监督社会组织的重要工具。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统计，目前我国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有 49.9 万家，每年正以 20% 的速度增长，这组数字似乎很庞大。

“但实际上，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百万，而相比之下，我国社会组织所占的比例和规模明显不足，社会组织承担就业、提供服务的能力还很弱。”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说，“评估通过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和考核，促进了社会组织各方面的提升，使其发展壮大。”

记者从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获悉，在 2012 年度社会组织评估中，北京、福建等地参评率超过 40%，而山东、新疆等地至今还没有启动社会组织评估工作。

从事多年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对此表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组织评估在各省发展不平衡，总体水平较低。评估工作是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降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促进政府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的基础。”

在我国，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以 A 为单位划分为 5 个等级。2012 年 12 月 20 日民政部公布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规定，3A 以上的社会组织可获得政府委托服务的资格，还是纳税额扣除的重要参考条件。目前，进行评估的社会组织中，5A 级 39 家，4A 级 126 家，3A 级 291 家。

广东等地已据此出台了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名录，社会组织能否入选要通过评估来决定。“这个经验值得在各地推广，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实际上是一种放

权，这就把社会组织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面对众多社会组织，政府职能转移给谁？政府购买谁的服务？评估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说，“政府职能能否顺利转移，关键在于社会组织能力能否跟得上。因而，要充分发挥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发展的作用。”

过去政府往往通过年检的形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但由于年检渐渐流于形式，因此政府采取预防制，通过设立“高门槛”来管理社会组织，这也称之为“重登记、轻管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组织缺乏活力与效率。一些社会组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导致问题重重，很难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只有运用评估手段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政府才能够转移职能给社会组织，行政体制改革才可能深入推进。否则，政府职能无法顺利转移，行政体制改革也就陷入精简、扩张、再精简、再扩张的恶性循环之中。”廖鸿说。

谁做“掌秤人”？

谁来评估？靠政府，还是第三方机构？

廖鸿向记者解释说：“第三方机构是民政部委托的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各地因地制宜，有的地方采取成立社会组织评估中心，有的地方委托给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有的地方委托给科研院所或社会组织，这些统称为第三方机构，承担着评估的具体组织协调工作。”

不同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也不相同。据记者了解，根据政府的参与度不同，目前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完全参与型。例如香港社会福利署，在这种评估机制中政府充分参与，由政府发起评估、担任组织者和实施者，资金完全由政府部门承担，评估结果为政府所用。

第二种是政府部分参与型。例如菲律宾的PCNC非政府组织认证委员会是发自民间、得助于政府，又反馈给民间的评估模式。政府官员参与理事会组成，评估结果由税务部门认可，并给评估通过的组织带来捐赠人免税的优惠。

另外一种第三方负责型。例如美国的马里兰州非营利组织联合会，在该评估中看不到政府参与，而完全是发自民间又反馈应用在民间的评估模式。

华北电力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说：“我国评估模式都是政府和社会合作进行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如浙江、山西、辽宁、青海依托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开展评估工作，上海成立三级推进机构，成立社会组织服务处。另一种是政府指导，社会协同。如广东的社会组织评估中心、福建的海西社团评价中心，北京是委托已经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学术机构。”

“很多社会组织来源于权力机关和事业单位，因此存在‘权社不分’‘事社不分’现象。社会组织只有保持独立才能实现其客观性和公益性。”马庆钰指出。

“虽然政府评估权威性强，但容易造成政府部门主导评估，行政色彩太重。甚至一些地方政府

将评估作为扩充部门权力的手段，导致评估的作用大打折扣，一些被评为 5A 级的机构甚至最后爆出丑闻，更有甚者出现权力寻租现象。”邓国胜建议，“评估应该走政府支持或购买服务、由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的模式，而且政府购买服务应该组成一个由社会人士参与的相对独立的评估委员会，由评估委员会对第三方机构进行再评估，同时应广泛征求社会对评估结果的意见。”

如何调准“秤”？

下一轮社会评估还将继续，社会组织能否快速地健康成长，政府职能能否顺利转移，继续拷问着我们的“掌秤人”。

“未来我们将会从‘重登记，轻管理’到‘放宽登记，多种监管’方式并举的过程中，明确评估作为社会监管的重要方式之一，推动实现评估金额在各部门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经费中列支。”廖鸿还透露，“民政部这一级，今年符合条件却没有参加过评估的全国性行业商会、公益类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全部都要参加评估，整体推进评估的覆盖范围。”

在第三方机构的建设上，邓国胜认为，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将评估机构本身作为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国外的评估是一门重要学科，很多大学都有评估课程，而我国也应该用这种途径培养专业的评估人才。”

另外，评估指标犹如秤上面的刻度，它的设定是否精细、全面十分重要。如何把握评估指标，如何保证评估标准的统一，如何使用评估结果？

朱晓红说：“评估指标的设定往往容易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指标设定过于繁琐，使社会组织没时间应对；另一种是指标不够细化量化，评估效果不明显，导致社会组织不重视评估。”

马庆钰认为，在指标设定上首先要针对社会组织所标榜的宗旨，其次要针对社会组织的结构。例如在非会员社会组织中理事会、监事会、执行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监督关系是否清晰，会员性组织中会员大会对理事会的选举是否民主等，这些指标的设定有助于对社会组织的资金安全性、活动公益性进行监督。

最后环节即评估结果的运用也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基金会、社团的募款额及会费数额，影响着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

“应该提高优秀社会组织的政治地位，让这些组织参与到国家的参政议政中来。”马庆钰说。对此，他将和许多专家学者一起建议将 5A 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提名产生单位。

“我国的社会组织评估仍处于探索阶段，还需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出适合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组织的评估模式来。”朱晓红说。

来源：光明日报

地址：http://politics.gmw.cn/2013-06/08/content_7903280.htm

[【返回目录】](#)

文汇报：孵化园“加营养”助社会组织“长结实”

编者按：上海各区县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培育公益类社会组织及项目的方式方法，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虹口区从创意、创业、创新三个层面，为哺育社会组织成长提供摇篮，每年投入 1000 万元专项资金；长宁区着力为社会组织、企业、社区搭建合作平台，推动社会公益项目落地社区；静安区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提高社会组织服务能级；闵行区大力培育初创期公益机构；松江区建立集聚多项功能的社会组织服务园，吸引更多公益性、支持性、枢纽性社会组织和被孵化机构入驻。

公益类社会组织要“长得结实”，离不开资金、政策、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服务。虹口区社会组织孵化实践基地成立两年多来，不断探索哺育社会组织——除了每年投入 1000 万元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为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提供财力支撑，虹口区政府陆续出台规范化管理及扶持政策、建立孵化实践基地联席会议、培养社会组织和公益服务项目负责人，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源泉，从而着力解决当下诸多社会管理的难题。

据悉，虹口区经过孵化基地培育注册的首批社会组织达 14 家，承接公益项目 17 个，正在孵化的公益项目有 8 个。在孵化园经过一个阶段的培育后，入驻基地的社会组织陆续“发芽”，并以寸草报春晖的精神投身公益服务事业，一批公益民生服务项目随之“破壳而出”。

到咖啡屋聊聊公益

让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相约咖啡屋？听起来，这个想法很浪漫，却似乎难以办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虹口区学习借鉴国内外发展社会组织的成功经验，引进了世界公益咖啡屋这种新型的集体对话方式，围绕“聊聊公益，出出点子，为我们小区做点实事”主题，为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搭建平台。

记者了解到，公益咖啡屋目前已组织举办了 3 期活动，每次针对不同事项，讨论者对社区公益事业发展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汇总了百余个金点子，促使 20 多项公益项目得到落实。

在这个特殊的咖啡屋里，虹口区的公益组织多了一个彼此交流学习、互动提升的载体。此举也鼓励了公益机构逐渐成长为学习型组织，并为企业志愿者提供服务机会，让更多参与公益的人享受那份自豪与快乐。同时，依托社会组织专家咨询团，对专职工作人员实施专业指导，提供政策信息服务，为实施社会组织品牌战略注入智力支撑；邀请高校专家参加公益项目评审；创办孵化基地刊物，每月交流社会组织经验。

化解社区管理难题

业委会组建难、换届难、售后公房管理难是难啃的“硬骨头”。据介绍，孵化基地与凉城街道培

育的“新家园建设与合作事务所”，以破解三大难题为己任，自 2011 年 10 月在孵化基地诞生以来，通过发挥专业优势，共完成 20 个居住小区业主大会和业委会组建、换届工作，协助化解 10 多起小区综合管理方面的矛盾和信访件，受到国家住建部的肯定，并入选 2012 年度上海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十佳示范案例。

此外，虹口区旧区改造难、化解动迁居民家中利益矛盾的“难度系数”也不小。“梁惠英名师带徒”和“和家睦邻老娘舅”两个公益项目应运而生。孵化基地与虹口区社区服务协会和调解协会合作，以资金支持公益服务项目的形式，扶持“梁惠英调解工作室”扩大社会影响力。调解工作室深入旧区改造基地，用真情真心融化动迁居民心结，入驻旧改基地以来，调解不少动迁家庭内部矛盾，调处成功率达到 75%，不仅实实在在促进了旧区改造，也为社会培育出一批“小梁惠英”。

孵化基地成立两年来，虹口区社会组织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忆不容缓”、“川北妈妈”、“剪刀老爹”、“吴语软语”、“老伙伴”、“宏城优抚社工”、“晚霞心苑”、“心理咨询师协会”等一批各具特色、针对性强的项目“破壳而出”，立足解决养老敬老、心理咨询、文化培育等现实问题，在多个社区和群体间发挥着纽带作用。

保证孵化基地顺畅运作

为了促进成果转化，虹口区政府鼓励街道以需求为导向跨界合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成果。其中，对街道向社区内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区专项资金按 1:1 比例给予配套；向社区外社会组织购买的则按 1:1.5 比例配套，以鼓励公共服务招投标的竞争开放性。按照政府扶持、市场化运作思路，探索建立公益项目招投标、社会评估、动态管理、准入退出、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培养、公益服务资源共享及财力保障机制，这些机制保证了孵化基地的顺畅运作。

有了公益项目，还需要一支领军队伍开展实践。记者了解到，虹口区着眼于凝聚一批愿意做公益的人，通过党建引领、人才引进、业务培训以及一系列奖励机制，充分调动和释放孵化基地每位员工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为办好孵化基地夯实人才基础。此外，虹口社会建设学院专门对社会组织和公益服务项目负责人进行培训，从弘扬公益服务敬业精神和提升公益服务品质两个方面开展专业理论和业务培训，提升领军人才综合素质。

来源：文汇报

地址：http://wenhui.news365.com.cn/shjs/201306/t20130605_1205112.html

[【返回目录】](#)

京华时报：基金会应更多支持民间公益组织

近日，中国公益研究院与壹基金之间的善款流向问题引人关注，基金会出钱支持民间公益组织本为分内之事，纷扰皆因钱的来源及去处未明引人猜忌，而壹基金随后在网上的说明为事件揭开一角面纱，阳光、透明终究是最好的防腐剂。

雅安地震后，壹基金获得大量公众支持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公众在网络上看到壹基金亲力亲为做项目的过程，公众从感性上容易接受最直白易懂的做项目，而对基金会把钱再投到其他公益组织，则有雾里看花、难辨真假的感受。

在公益事业较发达的国家，基金会的角色通常是接纳捐款，并通过甄选把款项拨付给专业的公益组织完成公益项目的一个平台。

目前鉴于中国社会组织管理注册过程较为复杂，有些操作性的项目索性注册成基金会性质，所以，中国不少基金会自身成为了操作实际项目的公益组织，这虽然不失为实现公益愿望的方式，但资助型基金会的减少，让境况艰难的公益组织又失去了一部分资金来源。

5月31日，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在上海与民间公司组织合作的一个救助儿童项目运行满一周年，理事长王兵在谈到基金会的角色时说：“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现状并不乐观，筹款难是普遍问题，所以爱佑真正想做的，是想通过我们的项目，去扶持民间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成熟。”爱佑基金会是目前中国唯一以发布会形式公开年报的全国性基金会，并制作发布基金会的周报、月报、季报、半年报，便于公众了解基金会的信息情况。

基金会用信息透明项目高效获得各种社会资源的注入，再次将这些资源嫁接注入到民间公益组织，爱佑基金会的意义即在于此。

长远看，资助型基金会将是中国基金会的未来之路。而从这个角度说，壹基金募集定向捐款，不是直接用于弱势的个体民众身上，而是用于资助一个好的民间公益组织，无疑是一个更有价值的善举，而阳光、透明、专业是让基金会资助行为获得公众信任、发挥最大价值的法宝。

来源：京华时报

地址：<http://beijing.jinghua.cn/c/201306/03/n3870808.shtml>

[【返回目录】](#)

南方都市报：公民捐赠活跃迫使慈善组织改革提速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数据显示，2012 年全国共有 49.2 万个社会组织，比上年增加了 3 万个。但社会组织的增长没能带来捐赠量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12 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量约为 700 亿元，与 2011 年度的捐赠总量 845 亿元相比，下降 17% 左右。

一边是社会组织数量的增长，另一边却是社会捐赠金额的下降，这大概是慈善蓝皮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数据对比。而在这样的对比中，公众的目光又特别留意于中国红十字会。据蓝皮书的披露，去年中国红十字会接收国内社会捐赠款物总量下降近三成。这意味着如果计算平均值，作为社会组织中地位最特殊的红会，其在 2012 年受“社会捐赠总量下降”的影响尤在 17% 的平均值之上。

慈善蓝皮书主编分析了捐赠下降的几个原因：首先是受 2008 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影响，在 2012 年各种影响集中爆发，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对于以民营企业和民众为主体的社会捐赠总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因“郭美美事件”等 2011 年“问责风暴”的影响，公众对正式组织产生逆反心理，遭遇公众质疑的慈善界公信力于 2011 年“触底”，未在 2012 年“回升”。

“郭美美事件”尚未完全平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利益门”风波又起，在这样的语境中，审视“社会组织数量增长”和“社会捐赠金额下降”这样具有鲜明对比性的数据，人们很难不同意慈善蓝皮书表达的观点：数据背后反映的是公众对慈善界的不信任。

慈善界的公信力危机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就像那个古老的“狼来了”的故事，也许只有在最后不得不直面社会捐赠萎缩的现实时，才会激发相关人士的一点痛感和耻感，因为一旦失去社会捐赠，任何公益慈善组织就等于无源之水。如果蓝皮书的发布，真能通过客观数据的警示，促使这些组织向公众期待已久的独立、公开、透明发展，则善莫大焉。

但是有一点也需注意，公众对红会等组织存在一些疑虑，并不表示国人的慈善热情有所消退，社会组织所接收的社会捐赠总量下降也绝不代表中国的慈善事业陷入了低谷。欲对此进行验证十分容易：今年雅安地震中，中国人展现的救助同胞的喷薄热情怎么可能把人们导向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悲观判断？

一方面，因其自身运作过程中的瑕疵，公益慈善组织遭遇了部分抵制，另一方面，国人的慈善热情势不可挡。面对这样一幅图景，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国人的慈善热情究竟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释放渠道？

慈善蓝皮书观察到了上述现象，其中特别提到，“正式组织之外的公民捐赠空间大为拓展”，蓝皮书并且把“社会救助与社会问责网络微公益转化”称为“2012 年中国慈善公益界最显著的特征”。

众所周知，这一“最显著的特征”到了 2013 年的雅安，以李承鹏、肉唐僧等人一种“完全通过微博、淘宝等网络平台发起并最终完成的救灾善款募捐形式”，又由于其组建独立委员会，延聘第三方全程监管，及时详细报告捐款账目、用途等运作，有了更生动地呈现，也日渐为更多的人理解和

支持。

有别于红会等正式组织操作的公民捐赠，近年来为中国慈善事业贡献了多少正能量？慈善蓝皮书发布的数据中，“包括网络捐赠在内的非正式组织捐赠基本上未在统计之列”，但只要想想肉唐僧等人发起救助时网民的一呼百应，就能明白其对慈善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纯物质。

慈善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当其从个人善心萌动向组织运作转化时，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而今公民个人捐赠的活跃是否一种退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只是组织募捐的补充，由此形成的多元竞争格局不但对整个慈善事业有益，而且就现实而论，也有利于促使原本具备更大潜力的公益慈善组织加紧改革和完善。

公益慈善也不可垄断，让竞争来得更猛烈些吧。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6/02/content_1869204.htm

[【返回目录】](#)

南方都市报：基金会自律联盟还可以更好

在社会与国家同构的时期，公益机构的公信力由政府赋予，这也是官办慈善的合法性来源。在民间公益崛起，公益形成新秩序的过程中，公信力的来源必须是社会，而且只能是社会。自盟公约就此点题，这不仅是基金会的命门所在，也是社会自我进化的机遇。

芦山地震后，有 140 多家基金会介入了各种形式的灾后重建。在这个背景下，部分基金会发起成立了自律联盟，并且起草了《4-20 救灾行动联盟公约》。截至 4 月 28 日，自愿加入自盟的基金会已达 41 家，包括公募基金 29 家、非公募基金 12 家。

基金会自律联盟的“初心”，是通过信息披露，做到救灾的透明公益，从而获得社会信任，进一步增强行业共识与社会公信力。在现有的公益实情下，这一做法切中了公益的关键问题。公益的核心在于公信力，基金会自律联盟是要保卫公信力的“供需”生命线。

但也要看到，无论是自律联盟还是自盟公约，其问题意识均来自公益旧秩序的现实，它们出发的原点绝不是问题的终点，而只能是与问题“同行”。因此，自律联盟能否协调各种因素，舍弃面子

而又别开生面，走出一条自卫、自为的新路子，也需要勇气。

五年前，公益界也制作过《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准则》，提出“自愿、自律、自救”三原则。如果以公众对公益的态度流变做衡量，这一框架性的自律准则名存实亡。而今，由自律准则过渡到自盟公约，问题更加尖锐，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基金会中心网在三年前成立，这是基金会自盟公约能够实现的一个大平台，也为信息公布提供了技术能力。历经数年的经验积累，基金会自律可以做到有数据可依。例如芦山地震，至少在募资及支出的透明化上，基金会自律联盟不再沦为空谈。

尽管这样，自律联盟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在公益数据的披露上，尤其不能满足于报告笼统的捐赠数目或救灾支出总额，还应该建立明细。细化分两个方向：一是公开救灾款项及物资的投放地，要明确到镇村户，二是这些救灾钱物要反映到人，细化项目。

联盟以自律为名，然而还不能止于行业内部，始终要面对公众。公众对公益的要求，早有进步，其知情权同样不满足于听到一些“大数”。如果自律联盟以独立获取公信力为目标，还要在信息上让渡更多拥有权。说到底，公益机构的公信力也体现为权利交换。

信息细化不止是技术层面的，自律联盟很快就发现，信息披露的深浅问题关系到如何协调不同性质的基金会。参加联盟的，包括红基会、宋基会、青基会等地位、作为及评价都很复杂的机构。自律联盟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证明联盟的诚意与所追求的目标相匹配。

为了中立、专业地面对联盟的挑战，基金会自盟公约就被寄予厚望。毕竟这是自律的基础与依据所在。以大陆基金会的操作实力，拿出一个客客气气的文本不算太难，但拿出一个足够呼应行业危机、直面基金会公信力与专业化问题的契约，还是有难度。

总之，无论是以财力还是智力，基金会的掌舵者都属于中国的精英阶层。他们以自律联盟的形式，试图解决自身的问题。因为这些行业问题，必然牵扯到其他更多的问题。因此，自律联盟在为公益自身寻找答案的同时，也为其他的问题清单提供应对的索引。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ndgongyi.oeeee.com/html/201306/03/67965.html>

[【返回目录】](#)

羊城晚报：富人公益新阶段：做慈善不再是简单捐款

富人为何热衷公益？

富人如何做好公益？

富人慈善不再是简单捐款

公益聚焦

上个月，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马云卸任，表示将投身环境保护等慈善公益事业，此举让“富人慈善”再度引起社会关注。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不少企业家都是热心的公益参与者。富裕阶层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是一股重要推力，他们为何热衷公益？如何让这股力量得到持续良性发展？日前，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以及佛山、深圳等地的企业家。

慈善动因

“好人好报”的乡土传统

2008 年汶川地震引发了中国慈善的“井喷”现象，富裕阶层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认为，中国的富人慈善从此进入持续发展新阶段。

今年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上，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以 4.2 亿元的捐赠额成为中国首善。而珠三角企业家中，佛山碧桂园杨国强父女、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均上榜，杨氏父女还连续 5 年蝉联广东佛山首善称号……

“当我们讨论中国富人慈善的动因时，‘做善事求福报’的乡土慈善传统必须加以重视。”朱健刚提出。

“好人有好报”是中国传统慈善观念，许多财富之士并没有忘记这一古老的训言。功成名就后，常常出资帮助家乡、小区改善基础设施，兴建学校，举办公文化活动等。“这种乡土慈善传统相当普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富人做慈善最常见的方式。”朱健刚说。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将慈善视为自身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慈善被看做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

除此之外，存在着一批具有社会关怀的财富人士，他们认为公益慈善是建设社会的基础，有意识地以慈善建设社会。

5 月 3 日，马云在出席美国加州圣莫尼卡的公益捐款活动时，谈起自己投身环境保护等慈善公益事业的原因：6 年前，他回了一次老家，发现一处湖泊近乎干涸。一个农民跟他聊天说，他们施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农产品，根本不会给自己家人吃。这件事深深触动了马云。“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错误的。”他说。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传播总监周如南则认为：“富人慈善的动机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参与的行动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改变境界

做慈善后不再是钱的奴隶

1998 年，赖建雄和妻子在佛山的百花商场创办了第一家流行美饰品专柜。2011 年，“流行美”在全国的开店规模突破 2000 家，年销售额达到七八个亿。

“白手起家很辛苦，我每天都在想钱的事情，经常会觉得很迷茫。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快乐幸福又是什么？我感受不到。”广州流行美时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大学慈善企业家联合会秘书长赖建雄说，无休止地追逐利润等同于“无期徒刑”。

赖建雄后来开始陆续加入各种慈善团体，他说：“我感到从‘无期徒刑’中解放出来。”

在他看来，“企业家到更高的层次理解社会责任、公益、钱、资本，那就是另外一个境界”。

境界改变后，赖建雄做企业也更加得心应手。比起原来的操心、忙碌、焦虑，他发现对人的理解改变了，在授权、信任、合作等方面，宽容很多，企业做得更好。“我现在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做公益，没有以前那么忙，但我的企业仍一步步成长，得益于自己对企业、对人生、对社会、对金钱的理解呈现不同的意义。”

东莞天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坤，发起建立“千分之一公益服务中心”，十余年来，帮助湖南凤凰、江西寻乌、广西宁明、四川青川等地 2000 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我就是一个凡人，一个普通人。助学对于我，其实就是一种消费，但我选择了这种消费，我心理需要它。”

“普遍认为，富人是金钱的主人。我不认同。做慈善前，我是金钱的奴隶，为钱愁苦，做慈善后，我才翻身做主人。”赖建雄感悟道。

问题渐出

仅仅捐款或成暴力慈善

周如南认为，富人慈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仇富”心理，“在市场以资本逻辑主导的财富初次分配和政府以社会公平主导的财富二次分配机制之外，社会以道德逻辑主导的财富第三次分配开始以慈善的形式呈现”。

但随着富人慈善成为风尚，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

朱健刚说，有些人以为把钱放到受捐助者的手上就完成了慈善。这种行为不但很难改变受捐者的命运，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是心理上的。严重一点说，这样的慈善更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暴力。

为了引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向财富人士传播现代公益文化，培养本土慈善家，2012 年

9 月，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成立了中山大学慈善企业家联合会（以下简称“中企会”），吸引了 23 位企业家参与。

“中企会有别于传统的个人或企业慈善行为，更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培养，整合社会资源为公益慈善的专业性和前瞻性提供帮助。”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资源发展专员邓圆也说，通过提供学术资源，满足了慈善企业家对更为前沿、开放的公益慈善知识的需求。

此外，如果慈善事业只有富人参与，效率、成本、财富价值体系会逐渐成为公益领域的主导性价值观，而平等、爱、参与、团结等价值观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

朱健刚表示：“广大的平民如果长期被排斥在公益领域外，和社会的脱离会进一步加剧。弱势群体如果只是受帮助的对象，也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对立。如果慈善方式处理不当，体现不到对受助者的尊重，那么慈善行为或许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满和仇恨。”

因此，朱健刚呼吁：“在鼓励富人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全民慈善，慈善不是富人的专利。”

周如南表示，当前倡导的公民公益理念，是指无论是否具有贫富、地域、教育程度等差别，都可以参与公益行动当中去。同时，它超越简单的捐钱慈善，是积极投身社会公共事务的快乐公益和志愿行动。

在深圳市罗湖区，有一家“慈善五星级酒店”，大堂挂着一幅题字：“消费了一百元，做了一百元的好事。”2000 年彭年酒店开张伊始，董事长余彭年就承诺将酒店所有利润用于慈善。如今余彭年将这家酒店连同其他所有财产一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进行托管监管，成立了“余彭年慈善基金”，在其百年后全部用于慈善。

年逾九旬的余彭年祖籍湖南，是上世纪 40 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做过记者，知道穷人生活的艰辛。他至今仍坚持所有慈善工作亲力亲为，是因为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捐给长沙的 10 辆进口救护车最后竟成了领导的“坐骑”。

捐赠救护车被改成公交车

祖籍湖南的余彭年在香港经商 50 年，以经营房地产业为主，兼营酒店旅游业。在香港事业有成后，上世纪 80 年代余彭年开始回到湖南老家开展慈善捐赠。谈起做慈善的初衷，余彭年说与自己早年的记者生涯有关。上世纪 40 年代，从长沙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的余彭年曾做过 4 年记者，其间目睹了众多底层人生活的艰辛：“有人生病了，结果没有救护车，只能背着去医院，路上耽搁了救治时间，眼看着人就那么走了。”

80 年代末，除了给家乡捐赠学校、医院外，余彭年还专门给长沙捐赠了 10 辆进口三菱救护车。车内配备了齐全的急救设备，没想到两年后余彭年获知救护车已被改为领导的座驾。最后余彭年无

奈地将被“改用”的救护车收回，转赠其他医院，结果再次被改用。

被改装的救护车成为了余彭年早年进行慈善捐赠的“心头痛”，在那之后，他坚持所有的慈善工作都亲力亲为，不委托其他机构，直接接触受助者才能让他安心。“其实很多港澳、华侨的富商都想为家乡做些贡献，但对大陆的慈善运作没有信心。”

如今在彭年酒店的楼下停了五辆大型流动白内障手术专用车，车身上印着“恢复光明不要钱，赶快去找余彭年”的大幅标语。截至2012年，“光明行动”已陆续对内蒙古、辽宁、西藏、湖南、安徽等18个省及自治区的患者进行救治，治疗白内障患者25万余例。为了不重蹈过去的覆辙，至今余彭年坚持每晚和派出去的医疗小分队队长通话半个小时。

当被问到做慈善是否不图名也不图利时，余彭年笑呵呵地回答：“老百姓给的名我要，其他的都不要！”

奉劝政商别给儿孙留家产

胡润慈善榜显示，余彭年连续5年蝉联“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5年间，他捐款总数是62亿元。胡润百富榜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余彭年是中国“裸捐第一人”。2010年，余彭年跌出胡润百富榜，胡润说：“他已经把自己财富都捐出来了，自己没有财富了，这次没有上榜，但同样值得尊敬。”

据胡润百富榜调查，目前拥有余彭年全部资产的“余彭年慈善基金会”资产总价值达93亿港元，该基金主要致力于医疗救助以及资助教育。

2002年，余彭年曾向深圳市人大提交了财产捐赠意愿申请，专门注明自己的财产、遗产永远不由任何亲属继承。同时他也要求深圳市人大立法保护自己的彭年酒店及其他产业不被侵占、挪用、毁损，或者转让、抵押，而所有的利润将全部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余彭年说，自己的酒店就像是一只母鸡，鸡仔是专做好事的，但一定要保留这只母鸡。令余彭年感到遗憾是，深圳人大最终没有通过这一立法。

在重家族传承的中国，不把财富留给儿孙而是“散给”他人，“裸捐”仍然不能为全社会所认同。余彭年说：“大家都知道‘富贵无三代’的俗语，但却没有人真正舍得将财富用来做好事。”

对于“裸捐”，余彭年的经典回答是：“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于我，留钱做什么？”他还奉劝那些手握大权的政治家和有亿万身家的企业家，千万不要多留钱给子孙后代。余彭年认为，与其将钱留给儿孙花天酒地，不如自己享受做好事的感觉。

广东省林治平基金会（下称林治平基金）发起人、会长林治平是位土生土长的佛山南海大沥民营企业家，5年前他痛失爱女。14岁的女儿临终前的心愿就是能管理一个慈善基金会，为了实现女儿的遗愿，林治平后来以女儿的名义成立了挂靠基金，如今基金捐款已超千万。

女儿的心愿触动了她

林治平基金并不是林治平设立的第一个基金会，2008 年，他以去世女儿的名义成立了挂靠在南海区慈善总会下面的“林嘉琪基金会”。

2008 年 8 月 30 日，14 岁的林嘉琪因癌症去世。回忆女儿，林治平没有太多的悲伤，更多的是慈爱和自豪。林治平告诉记者，当时女儿连续两年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期间从没掉过一滴眼泪，看到有穷人没钱治病，就发动大家捐款，也总是用自己的零花钱去帮助别人。

“一次，在病床上，她突然说，‘爸爸，你要努力赚钱，然后设立一个基金会，我高中毕业后，就去管理这个基金会’。”林治平说女儿最后的心愿深深触动了她。

女儿去世之后，林治平想尽快为女儿实现遗愿。随后他找到了南海区大沥社会事务办，让其帮忙寻找 100 位贫困学生（目前增加为每年至少 300 人）进行资助。

后来，林治平听说可以以挂靠的形式在南海区慈善会成立以个人命名的基金，马上便以女儿的名义设立了慈善基金。2009 年 4 月，南海区慈善会举行首次企业(个人)冠名慈善基金仪式，29 家企业共认捐 350.8 万元。其中，就有林治平为女儿设立的林嘉琪慈善基金。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林嘉琪慈善基金会先后为玉树地震捐款 20 万元，大沥新医院建设捐款 500 万元以及为贫困家庭及学生提供资助。迄今已捐款超过千万元。“这是圆女儿的梦想，也是圆大家的梦想”。林治平说。

幼时家境贫寒借钱读书

谈起为何如此热衷于慈善事业，林治平笑着说，慈善是人的本性。

小时候，林治平家境贫寒，只能跟别人借钱读书。“是好心人让我‘圆梦’，我现在更应该去帮助那些没有圆梦的人。”他说，人从出生开始，就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林治平基金会会有一个“助梦”计划，要发动周围的企业家帮助还没“圆梦”的人群。

2009 年 10 月，梅州 17 岁少年吴国强因患白血病住院，父亲早已得癌症去世，全家人对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一筹莫展。可怜的妈妈无法再拿出钱给面临死亡的儿子治病了。林治平看着报纸上的报道，眼泪就掉下来了。他立即打电话到医院核实后，让助手拿 10 万元存入医院当作医药费，又另外拿了 2 万元给了吴国强亲属，让他们保重身体。林治平还交代助手：“钱放下后，必须马上走。”尽管如此，家属还是激动得跪地磕头。

林治平表示自己做好事时不会留下电话号码和名字，他认为这是一种“负担”。

更多朋友做起了慈善

既然不愿意留名，那为何以个人的名义成立基金会？林治平表示，身边很多企业家朋友都想帮助别人，但找不到比较好的渠道，感到很困惑。郭美美事件之后，“壹基金”等基金会受到关注，朋

友们希望林治平也能成立一个基金会。

“大家愿意把钱捐到我的基金会，这不只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担当’和‘责任’。”林治平说。有了基金会，就拥有了一个做慈善的合法平台。目前，广东省林治平慈善基金是在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国家一级法人非营利性机构，也是佛山唯一一个由个人冠名的慈善机构。

为保证善款的接收和使用能公开公正透明，林治平基金每笔款项都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基金会专门聘请了志高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监督每笔善款的去向。

“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加入公益队伍了。”林治平坦言，自己的行为也影响到其他人。对于目前越来越多的富豪参与公益的现象，他表示，这是一种很好的趋势，中华民族的文化原本就是“大爱无疆”。

来源：羊城晚报

地址：http://big5.ycwb.com/news/2013-06/06/content_4511095_3.htm

[【返回目录】](#)

瞭望：拓展公众慈善信任空间

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合力。当前尤其应该摒弃门户之见、行业之异，以尊重、包容，互助互通，协作共享，实现慈善效益的最大化

“4·20”芦山地震进入灾后重建，群众爱心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从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到民间慈善团体皆不断受到社会质疑。当爱心渠道“遇堵”，捐助善举“打折”，如何能在关键时刻重拾公众慈善信心？如何确保善款每分钱都花在灾区人民身上？如何进一步激发从善、向善、行善的社会风气？中国的民间慈善之路，已走到转型的十字路口。

信任疑云笼罩中国慈善

“4·20”芦山地震发生不到一个小时，中国红十字会便在其微博上转发消息，并发布赈灾信息。深圳市壹基金启动紧急救援号召社会捐赠，邮政局和部分快递公司纷纷开通向地震灾区捐献物资的免费通道，更有不少民间人士自发到灾区一线救援捐赠。

然而，一边是从官方到民间热火朝天的爱心涌动，一边却是网友们几乎一边倒的“不信任”。数天里，不少网友晒出在人民币上的签名，以此防范钱款被黑。

一些被定义为“民间慈善”的社会组织也受到质疑。作家李承鹏发起的民间捐赠陷入“帐篷门”事件，“物资堆积、无人发放”的照片在网上迅速传播……

公众在问：“我们的捐款究竟去了哪里？”

“做慈善这些年，最大的困惑还是善款的用途，能不能更加公开透明。”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被评为“2012 年中国内地首富”的宗庆后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娃哈哈集团成立以来投入慈善事业的资金有 3.1 亿多元。2009 年，浙江娃哈哈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初始基金 1000 万元，目前通过基金会投入慈善事业的款项有 1640 多万元。

宗庆后坦言，除了投向希望工程等教育领域的捐款，会对捐赠款项的用途作出跟踪说明，这些年大部分的慈善投入，并不太清楚最后去了哪里，“钱花了，效果怎么样？很多都没有反馈”。

2007 年，宗庆后向希望工程捐助修缮了 25 所希望学校。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希望学校建在哪里，娃哈哈可以提供建议，在建校区域的表格上，哪些是不符合条件的，希望工程都会标注出来告诉他们。

“虽然最终落实建学校，是地方政府操作，各学校的建造成本也不尽相同，但都有明细表单交给我们。知道我的钱捐到哪里了，看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我才会安心一点。”宗庆后说。

捐款用途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人认为，并非公众没有爱心，而是爱心无处安放。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杨女士说：“以往捐款大家都很积极，但这次很多同事都会问一句，这钱是捐到哪里去的？一方面是人们的监督意识越来越强烈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种不信任感。”

一名从事慈善事业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捐款人开始只捐一元钱、一角钱，然后就要求对方出具捐赠收据。拿到捐赠收据后才敢放心大胆地捐出更多钱。

理性面对灾区“三难”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捐赠不踏实？因为不知道物资去了哪里，不知道物资由谁派发，不知道最终谁受益。”广东省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坦言，为解决公众的“三个不知道”，广东省红十字会要求物资发放，有计划、有清单、有反馈，做到程序透明，“有去有回”。

广东省红十字会赈灾先锋队队员王敏懿向本刊记者介绍了物资发放的流程。先锋队共有 9 人，到达后先与当地红会和前线救援指挥部取得联系。随后，先锋队勘探小组先行探寻盲点、地理环境、受灾情况，拍下照片交给指挥部，再由物资运送小组、救援小组前往，对方村委会主任提供名单，派每户代表接收物资，并提供接收清单和回执。省红十字会有人专门负责回访，监督、核查物资发放。

“一般一户人家能分到一顶帐篷，4~5 箱水，50 斤米，基本能熬一个星期，坚持到政府把物资发放下来，慈善组织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政府救灾。”王敏懿说。

但实际操作中，在惊魂未定的灾区，仅仅是把物资运进去、发出去，其困难就不是一般人能想

象的，更不要说建立公平的发放方式、严格的物资登记签收制度，实现“账目日日清”，对于国内尚未成熟的慈善组织来说，近似天方夜谭。

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救灾中的“小插曲”：由于灾民对物资的需求十分紧迫，如何分配物资考验着慈善组织的智慧。在一些村庄，每户的人口数量有多有少，差距较大，原本按户分配的物资可能会出现不均衡的状况。最后，救援队和村民协商，把所有物资拆开重分，由按户分配改为按人分配，结果从下午一直发到凌晨两点，才结束工作。

有些人认为，捐赠物资比捐赠钱款更“靠谱”，因为钱款有可能会被私吞滥用，变卖物资换取钱财则需要更高的成本。但不少慈善组织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捐赠物资反而会加大慈善组织的工作量，工作人员要对物资进行分拣、检视物品质量。一般来说，药品不能接收。一些已经过期的食品、物品也必须处理掉。

针对一些物资堆积的情况，一些慈善组织解释说，工作人员都在努力派发物资，但人手太少，物资和需求的匹配不高，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发放物资前最好先进行需求调查，这样才能确保物资的合理发放。

慈善需要合力

如今，中国的慈善事业面对着发展“上台阶”的挑战，慈善组织的蜕变转型迫在眉睫。专家认为，一些负面事件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处理得当，反而对慈善组织的成长有促进作用。舆论的压力已经让慈善组织意识到公开透明的重要，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公众对慈善的信心。

广东省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应该尽快健全“高效、透明、规范、廉洁”的慈善事业管理机制。

一些业内人士建议，目前灾区正处于关键的灾后重建期，不少援建项目还要依靠社会群体捐助投入建设。挽回公众信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可尝试定期将捐赠资金及物资的去向通过网络或新媒体公示，从以往的结果披露向过程披露转变。公布的账目要细化，不能是让人看了一头雾水的“大账”、“神仙账”，要让公众更全面地了解慈善项目运作的动态。

而从长远来看，慈善组织的发展更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公民社会研究中心（CCSS）对13个发达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政府投入在非营利组织运营资金中的比重达到40%，而企业和私人的慈善捐赠仅为11%。在多数欧洲国家，政府投入占到50%以上。

以红十字会为例，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慈善组织，而是承担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动员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 and 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民间外交等政府委托或特殊交办的工作。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都与政府关系密切，一些国家政府拨款或向红十字会购买服务的比例，比中国要大得多。

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主要由政府帮助解决人员工资和机构运行经费问题。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亦明确，红会在编人员及机构的经费支出不得使用捐赠资金，这并不改变中国红十字会的社会性质。可见，政府财政对慈善事业的支持责无旁贷，最后受益的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需要帮助的群体。

来源：瞭望杂志

地址：<http://news.sohu.com/20130603/n377811123.shtml>

[【返回目录】](#)

中国财富：谁在批评壹基金

从神坛到祭坛，仅一步之遥。在本篇里，我们将努力为您还原一个“不完美”的壹基金。尽管肩负着无数人对民间公益崛起的期待，刚刚步入“学龄”期的它，自身显然还存在许多不足。部分合作伙伴的不满、内部的分歧、理想与能力间的差距……这些能否转化成壹基金成长的动力？

诚如其创始人、理事李连杰所言，他希望壹基金永远做一个探索者，给别的公益组织减少未来成长的一些障碍。“它就会掉沟里，它就会走着走着被水淹了，它要站起来就说，兄弟们我淹了，你们以后别走这样的路，我错了，对不起，我换一条路走。”李连杰说，“这个我觉得才是壹基金。”

4·20 雅安地震给了壹基金另一个舞台。

截至5月6日24点，壹基金官微显示，超过297万人次向壹基金联合救灾雅安专项捐款，其中善款2.45亿元，预计定向捐赠总额将超过3亿元（资金加物品）。

与壹基金受到公众的热情支持不同，中国红十字总会则陷入了另一番情境。中国红十字总会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出的募捐倡议遭到网友满屏“滚”的回复。

5月9日，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这是慈善回归民间的转折点，也是公众捐款‘用脚投票’的开始。”

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中国公益界已进入多元化时代。秉持自由联合理念行善的壹基金，让慈善回归了民间。不过，随着捐赠额的飞速增长，在社会信任体系脆弱，以及仍未形成气候的民间公益链中，壹基金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品牌与联盟

芦山县城的公安局大楼两侧，整条街道被一字排开的公益组织占据，敞开式的帐篷张贴着不同公益组织的标签，社会组织服务一条街如展销会一般。其中，“华夏公益服务中心”和“壹基金救援

联盟”显得尤为醒目。而走在大街上的志愿者，也同样是清一色两种服装：穿着蓝色壹基金志愿服和身着四川省 NGO 备灾中心黑色反光背心的志愿者。

“壹基金对我们很有意见，觉得我们没穿他们的制服。我很直，不是壹基金给钱我才救灾，这是我们机构的业务使命，我们要坚持做我们自己的品牌。”四川 NGO 备灾中心的张国远对本刊记者说。

他认为，壹基金的传播策略过于强势，把其他合作伙伴都淹没了，实际上整个救灾过程都是合作伙伴执行的，但所有传播都必须加“壹基金”冠名，对此，他颇有微词。

公益界的竞争已经开始出现，强弱分野之下，也带来了一些合作上的摩擦，彼此之间如何找到准确的定位，也成为一个问题。

华夏公益服务中心自称联络了全国 1700 多家 NGO 和志愿者团队，在此次救灾中扮演起后勤角色。而壹基金的两支常备军：以 250 家户外运动专业队伍组成的壹基金救援联盟，以及跨 10 省 200 多家机构组成的联合救灾网络，也都在第一时间进发灾区协作发放物资。

联合救灾网络的定位是要推动中国灾害管理领域的进步，壹基金的异军突起，多多少少让仍处在幼小状态的中国多数草根 NGO 充满了期待。

华夏公益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郑壹零说，民间救灾需要考虑有效性和有序性，壹基金作为联盟之首，需要承担起组织零散志愿者及其疏导的工作，以及为志愿者提供后勤服务和保障的角色。

张国远则认为目前壹基金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在芦山工作站，壹基金支持每个工作站 7 名志愿者食宿补助，但实际上一个工作站平均每天有几十名至上百名志愿者在分发温暖包。这些都是工作站自己解决，他们要么找其他资助方，要么自费。”

显然，壹基金品牌的迅速成长让一些 NGO 感到了威胁。张国远称，今年联合救灾想“去壹基金化”，以前叫做“西南联合救灾委员会”，现在重组改名，但其实也并不理想，跟以前西南联合救灾委员会没两样。“只是写项目申请书，最终决策还是壹基金自己作出，我本人是联合救灾行动组的指挥，所有行动也没通过我。”

“从公民社会角度来讲，NGO 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包容的组织。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价值观也是多元的。”张国远觉得，把各个 NGO 统一在一起是不可能实现的。

NGO 与基金会之间的合作看起来仍然需要磨合。“公益资助项目规范操作是很费神的。”面对一些草根组织的抱怨，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将一份包含有协议、项目建议书、项目预算、管理手册以及资金管理规定的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西北机构的协议拿给记者看。

而对于壹基金品牌强势的质疑，杨鹏则并不太以为然。他回应道，壹基金从一开始，便有着将支持民间公益机构发展作为自己的战略任务的历史传统，从过去的“典范工程”到现在的“透明典

范”，从资助大量 NGO 到支持 USDO 这样的民间自律联盟。“你说壹基金是带来了民间公益的丰富性还是破坏了丰富性？”他反问道。

“公益组织之间很难建立长期联系，特别是在各个公益机构有自己的项目情况下。从平台的属性而言，支持性的平台很难成为长期发展建设性的，更多的平台是在购买劳动力。眼下，壹基金雅安地震的项目支出也不太可能交给分散执行机构做。”一位业内观察者如是说。

转型之困

壹基金今年 6 岁了，正值“学龄”的壹基金一度步履维艰。为取得公募基金会的“身份证”，它经历过艰难求生，还曾有过两个不同法人身份：为获取公募权发起的“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和为获取独立运作项目权利而注册的“上海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2011 年壹基金转型为独立公募基金后，改名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同时也完成了“去李连杰化”，其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中聚集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诞生的商业大佬，从此走上了与中国财富阶层共同成长的道路。这种主体身份的不断变化，植根于民间组织在国内缓慢而艰难发展的大背景。然而时至今日，公益生态仍然脆弱，成长仍在继续，民间基金会仍然需要做出不断调适。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对壹基金评价甚高。他认为，壹基金近三年的主要发展得益于其明确的战略，以及救灾方面的专业化操作。

独立后的壹基金在当年 7 月的理事会上便通过了以自然灾害救助、儿童关爱和公益人才培训三个业务领域。时至今日，从前两项领域来看，壹基金主要是以直接运作项目和发放物资的形式运作，而后一个领域更倾向于资助和平台化建设。不过，在走专业道路的 NGO 看来，这样的领域分割对于一个基金会而言有些精力分散，有人认为壹基金应该更多地成为资助性的平台，而非亲自参与诸多项目。

中国鹰派联盟创始人、鹰眼益云的发起人万涛透露，自己正是受壹基金的启蒙步入公益界的，“从这次地震来看，壹基金的强项在于筹款，支持专业 NGO 发展，壹基金的救灾体系包括备灾还有更大潜力。”

在他看来，基金会的分工应该区分为平台型基金会和专业化基金会。“信息和资源应当彼此分享，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彼此关联，需要更加专业化的联合。信息共享带来价值是因为传播后可复制，价值最大化，资源也可以下降，覆盖面更广。”

然而，壹基金也面临着公益支持领域的实际困难。因为符合预期的执行组织并不多，大面积支持仍然具有风险。

平台型基金会侧重于做资助，而专业化基金会侧重于做项目。其实早在两年前，壹基金内部就有过这样的讨论，据《21 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一次理事会上，代马化腾出席理事会的窦瑞刚曾提

出，作为一个资助型机构，壹基金的运行成本有些过高。而杨鹏认为，这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思维，不做项目只发钱，但公募基金会这样做就会死掉。

在业界人士看来，对于快速成长的壹基金，以其筹款优势，往平台型基金方向发展会是未来的一大方向。但公募基金会天生具有信任分散的特点，理事名誉越高，投放就越发谨慎，这种谨慎的信任需要与平台型基金会的开放性恰是一对矛盾。

3 亿善款该怎么花？

5 月 7 日上午，周其仁、王石、李连杰、冯仑、牛根生等该机构理事或理事代表紧急在北京召开了为时 4 小时的理事会，专题讨论雅安救灾行动计划。

摆在壹基金面前的一个现实挑战是：雅安地震中募得的 3 亿善款该怎么花？

理事会是壹基金最高权力机关，执委会是最高执行机构。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壹基金目前的治理结构以风险控制为主，权利制衡较强。这样的结构让壹基金三年来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略显不足的问题。

“壹基金目前的救灾部主要业务是发放温暖包，作为救灾部门而言技术含量比较低，所有的机构都可复制。在建立有效有序的救灾机制方面，救灾部门仍有潜力。”一位业界人士指出。

万涛则以极客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另一条思路。“基金会也需要反思以往走流程和项目管理的模式，应该研究下让更多合作伙伴参与进来实现扁平化管理。”如何创新运作模式？由于缺乏参照系，壹基金也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基金会管理体制上的一些先天性不足，也制约了这种创新的能力。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基金会下一年支出不低于上一年募资总额的 70%，并以当年公益支出总额 10% 框定行政办公和人员福利开支上限。照此计算，壹基金要在明年花掉 2.1 亿。

过去，为了控制管理费，壹基金秘书长薪酬实际为发起机构专项捐赠，部分人员岗位为合约性质。成本的制度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优势人才的吸纳，不仅是壹基金，这也是整个公益圈所面临的难题，影响到行业的能力建设。但另一方面，对目前雅安地震的灾后重建而言，需要增大单个项目的支出额，或者以更大规模的管理费用开支，保证团队研发和投放项目的能力。

一方面要考虑社会的信任度和美誉度，因而将风险控制摆在首位，一方面又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创新与应变，在这样的框架下，灾后重建项目的管理投入对壹基金而言无疑是一大挑战。

其实，就在一个月前，受行业气候等影响，壹基金为了筹集零星捐款支持项目遇到巨大瓶颈，曾面临减员危机，雅安的巨额筹款让壹基金松了一口气，但重负仍未释放。

此间种种，杨鹏感触道：“壹基金一路不容易，它是民间公益走上公共舞台的象征，壹基金如果失败，对中国民间公益将是一大打击。”

来源：中国财富

地址: <http://zgcf.oeeee.com/html/201306/03/67962.html>

[【返回目录】](#)

福布斯中文网：中国式救援的五年嬗变

4.20 雅安地震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网民们曾经澎湃的热情，早已转移到其他热点话题上。在网络世界里，人们的眼球总是被此起彼伏的热点牵着走，每天根据最新的焦点露出不同的神情。

但是，对于灾区的救助并非政府、社会、媒体、企业、个人一时扎堆就能完成，像雅安这样的救援和重建就是一个琐碎的过程。正如专门为民间 NGO 提供后勤补给的专业平台华夏公益服务中心几天前在微博所说：“随着重建阶段的逐渐到来，救灾逐步从争分夺秒的节奏中放缓下来，但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的挑战才刚开始。”“尽管可用资源相对充沛，民间力量参与雅安灾后重建，落实到行动中，仍还是一团迷局。”

5 年来一直负责天涯公益的天涯社区新媒体总监、著名民间公益人梁树新形容：如果说 2008 年的 NGO 还像个刚开始焕发生机的婴儿，那么现在算是小学毕业了。但还是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刚刚从天涯成都的援助雅安爱心直通车物资接收站回来，接着又为微基金的“午餐计划”到贵州进行回访。过去一个月马不停蹄的梁树新，开始对 NGO 的未来发展路向有更多思考。

公益五年级的成绩单：更专业，更理性

对比这次雅安救灾与 5 年前的汶川地震救灾，梁树新的最大体会是 NGO 组织变得更加专业、理性，分工明确，而且以联合救灾的形式进行了更有效率的工作。

5 年前，在汶川地震如此重大惨烈、突如其来的大灾面前，慌乱、盲目、不理性等现象难以避免。比如志愿者们凭着一腔热血涌入灾区，却没有做足准备，未清晰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公益理念尚不成熟。而当时社交媒体在中国尚未兴起，互联网反应也相对迟钝，灾区医院成主要寻人信息源。汶川地震后发生的两周时间里，负责收容伤员的各家医院电话被打爆，寻人未果的人们像发疯一样，跑遍各家医院寻找亲人。

梁树新回忆，5 年前汶川地震发生当天，天涯社区在 5·12 当天晚上即与壹基金合作开辟了在线募捐平台。并且很快启动了“天涯爱心直通车”面向全国网友募集救灾物资。此外，天涯公益同步在网上征集专业心理援助志愿者，在震后一周梁树新即带领志愿者以及爱心大使世姐张梓琳到什邡市红白镇为灾民进行心理辅导。这一系列动作，完全是出于本能反应和感性判断。事实上，到达灾区后才发现各地志愿者和 NGO 蜂拥而至，却不知道从何下手。甚至出现多个公益组织抢着服务同一

个灾民的混乱现象。

2008 年，政府默许 NGO 参与灾区救援，改变了以往政府单一主导一切救灾活动的模式，这也令中国民间沉睡已久的力量得到激活，进而令社会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虽然当时与政府的对接以及志愿者们的工作有着种种不完美，但梁树新认为那一年是中国 NGO 飞速发展的分水岭。汶川特**后，深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队伍达 300 万人以上，在后方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人数达 1,000 万以上。灾后各类 NGO 更像雨后春般冒出来。

而 5 年后，雅安地震的当天梁树新得知消息后，他带领天涯公益团队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起一个“天涯救援信息首发与汇总平台”，将网上**式的各类信息进行筛选、甄别、筛选其中有价值的信息。让网友的捐赠物资能够根据灾区的最新需求有效调节，而寻人、求援等信息也能去伪存真。

他觉得这个信息平台很关键，能够把救援资源用在刀刃上。比如头两天灾区急需的是方便食品和饮用水，但两天后这两样物资迅速饱和甚至过剩，一些更容易被忽略的生活物品如妇婴用品却异常紧缺。网友查询天涯随时更新的信息后，可以及时调整捐赠方向，不至于造成浪费。

已成天涯传统公益项目的“天涯爱心直通车”也迅即第五次启动，4 月 21 日晚上便开始发动网友进行物资捐赠（不收现金）。与 5 年前不同，汶川地震时天涯公益在全国四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海口均开设了物资接收点，长途跋涉运送到汶川。从接收到网友的物资到运输到灾区，每趟运送物资长达三、四天，而且物流及人力成本所费不貲，当时整个天涯公司几乎都参与了救灾工作。

这一次因为过去 5 年中电商以及互联网的发达，天涯只在成都分公司开设了一个物资接收点，网友将物资从全国各地或通过成都卖家直接快递到天涯成都，两天后就开始每天一趟车直接进入灾区。一周时间就募集到了 11 车共 60 吨物资并及时运抵芦山，并通过当地志愿者的帮助把物资直接发放到受灾村民的手里，每次运送物资的所需时间缩减到数小时，而且可以每天更新灾区最紧缺的物资信息。救灾工作也主要由成都分公司的员工以及招募的志愿者负责，并未打乱天涯社区的日常工作。

梁树新感慨，雅安救灾得益于网络社区、社交媒体以及电商的便利，不但能更准确地针对灾民需求进行更到位的救援，而且人力与物流成本都大大降低，物资补给时间也从数天缩短到数小时。

联合救灾模式将成主流

通过这次救灾，他感觉到让专业的 NGO 负责专业的项目，会让民间公益救援变得更有效率。同时，各擅其长的联合式救灾在这次救援中渐成气候。这应该算是民间组织通过多次灾害性试验而形成的共识。

比如 5 年前大家对壹基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更多是靠李连杰的个人品牌在运作。但是现在大家都会清晰地理解到壹基金在紧急救援以及筹款方面的实力。在雅安地震发生后，仅用了两个小

时，壹基金救援联盟第一批两名队员就抵达了现场。后续队员先后到达双石镇、龙门镇红星村等滑坡较为严重的地区展开救援，其中在双石镇，他们先后救治了 30 多名伤者。他们的反应速度比官方机构更快。而在筹款方面，他们有着更加透明的披露机制以及强大的企业家团体支持，其在地震初期筹款数超过红十字会数倍。

在雅安地震的前一个月，壹基金吸纳了 11 个省的 200 多家 NGO 联盟组成一个“联合救灾”平台。“联合救灾”成立不到一个月就迎来的 4.20 雅安地震的考验，并于 4 月 21 日在雅安设立芦山民间救援指挥部，初步实现民间救援组织的配合，统一协调物资与人力的分配。

而华夏公益服务中心作为一个专门为民间 NGO 提供后勤补给的专业平台，他下设的 13 个分中心分别承担宣传、发展、保障等事宜。在雅安地震中，由华夏公益宣传中心派出的 200 多名志愿者分散到震区各地采集地理信息，制作专业简报每天早上向公众和各个机构发布。简报搜录灾情数据、救灾进程、天气预报、交通路况、灾民需求、民间组织和政府救援的最新情况等，已成为了此次救灾中的重要信息指引。而华夏公益会根据前线发回的需求汇总，对后方进行物资筹备的协调，分阶段、有针对性的送到灾区一线。而根据华夏公益的芦山服务中心工作汇报，他们除了为志愿者提供了食堂、生活区灾后重建项目办公场所、物流服务队之外，还对进入芦山的数百名志愿者进行现场培训，为他们的热情找到适合的安放之处。

2009 年 250 余家草根 NGO 通过网络集合成立的“华夏公益联合会”，则可以作为 NGO 联盟的服务中心，诸多会员协调事务性的工作，整合资源、提供资讯。让志愿者的工作更加组织化、专业化。还有一些专业的民间救援队，则可以在平时通过公益式的小型救援练习，来磨合与大型公益组织的合作以及提高紧急救援效率，他们的组成会大多是配备专业设备的户外人员，形成一种海陆空的救援体系，平时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让机构获得更专业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救灾模式让梁树新特别兴奋，他为此发了一条微博，提出壹基金可以更聚焦在联合救灾、筹款方面，转型为 NGO 联盟的领导者，在紧急救援时发挥力量，平时则利用品牌影响力设计项目和筹款，执行可以交给本地草根 NGO，壹基金负责监管，而这些很有生命力的小草根 NGO 也能获得发展空间，从而形成和扩大民间公益生态圈。

过去做公益靠热情，现在靠的是专业与联合的力量。让每个 NGO 组织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通过联合的平台，在尊重各家成员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大组织的高效运营，梁树新觉得这是未来中国 NGO 的发展方向。

相对于政府，NGO 的救助更注重灾区民众的特殊需求和个性化服务。使之能深入到灾区一线，提供源于灾区实际工作的第一手信息。NGO 在成长，政府也在成长，“5·12 汶川地震”后，政府不再限制民间公益组织发展了，这是好事。但要让民间组织真正在救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打

通“最后一公里”，建立必要的沟通机制和对接平台，而不是将一腔热情的志愿者视为无组织的“添乱”对象。”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地址：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306/0025919_all.shtml

[【返回目录】](#)

公益时报：让“儿童优先”成为社会准则

对儿童的保护与教育，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之一。

2013 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让我们与相关的研究者一起把目光投向儿童权益保护和儿童公益教育的领域。《公益时报》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携手推出“儿童与公益专题”，我们试图与研究者们一起，通过相关调研报告的解读以及调查数据的挖掘呈现，为儿童公益的从业者提供参考，共同为祖国的花朵安全健康成长助力。

权益保护是儿童公益的核心

过去一年，有关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事件和话题频出：自闭症儿童被退学、幼师虐童、校车事故、毕节流浪儿童死亡、兰考袁厉害事件等等，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激烈的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玉荣曾表示，儿童权益事件频发，首先与公众的儿童权益保护意识和监督意识增强有关，以往并非没有这些事件，但现在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更多，尤其是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曝光和传播速度更快。通过这些事件也可以看出，我国在儿童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上有很多欠缺。

公益组织能为孩子们做什么？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儿童权利公约〉在中国的 20 年——以民间组织为视角》报告。可以看到，关注儿童福利的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得也非常迅速，5 年或者 10 年前，相关 NGO 覆盖的领域还不全面，现在，关注聋哑儿童、心智障碍儿童等不同问题儿童的组织，每个类型都有百余家。

完善的制度是一步步架构起来的，不断地呼吁和修正是其必经之路。国家农村学生营养计划，儿童白血病、先心病免费医疗等，都是近两年国家普惠型儿童福利政策的表现。

今年 3 月 11 日，广州市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针对亲属携带子女乞讨、监护人故意遗弃等情况，提出了探索、建立救助保护机构诉讼代理人制度，

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护受助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反复教育不改仍携带子女乞讨等不履行监护责任的，救助保护机构将依法向属地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资格，由法院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这无疑是法律法规上的一种积极探索。

儿童福利要树立儿童优先的理念

社会对儿童的关爱中，“儿童优先”的意识也尤为重要。高玉荣说，政府加强管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实际上，即便有了制度和法律，也是要靠人来执行。保护好孩子，父母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儿童工作者也要有责任意识，比如校车事故中，做司机的幼儿园园长本身就是儿童工作者，本应该有很强的安全意识。比如毕节流浪儿童事件，如果此前见到他们的成年人对他们多一些关爱和教导，也许他们会回到家，不再流浪。

一份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2）》，从公益领域从业者的角度对儿童权益和保护问题投去目光。“让儿童优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也成为关键词，认为儿童福利要树立儿童优先的核心理念，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的治理结构，重视和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报告还建议，将来除了需要确立独立的儿童福利制度外，还应将制度设计从救助型向津贴型推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我国儿童工作的挑战在于缺乏基本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大家还没有意识到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是需要通过一个完善发达的儿童福利行政系统来保障的。这个行政系统包括工作人员、专业化的照料机构、专业化的设施，是非常具体的组织。

儿童公益教育是公益素质的根本

归根结底，公众的公益教育为公益素质养成之根本，而提升公众的素质，根本的措施是从孩子做起，对孩子进行公益教育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根基。

北京师范大学张秀兰教授提出，中国公益的未来在于公益教育。基于此，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组建了公益教育研究团队，以公益教育为理念，通过行动研究构建一种学校、社区、家庭互动的教育支持体系，充分发挥其教育的整体功能，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文明、快乐成长的公益教育环境。公益教育研究团队于2010年9月份-2010年12月份对北京市11所小学的学校领导、一线教师以及部分学生，3个社区对公益活动的开展现状、参与现状以及存在的障碍和困难等进行了预调研，在此基础上于2011年5-6月份、2012年5月分别对北京市海淀区36所小学和207个社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最终撰写了多个研究报告，对儿童公益教育领域做了全方位的调研和探讨。在了解并分析了公益教育利益相关方——学生、教师、家长、社区工作者的需求后，研究项目组根据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学校资源开发了一套适合在小学推广的公益教育课程及校外公益教育活动指南。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尚立富表示，希望通过一系列相关的调查研究以及

课程推进，构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建立学校、社区、家庭三联动的机制，给孩子提供一个全面发展的平台，整合各种力量，使孩子能走出家庭、单位的局限，构建社区大家庭，在这里大家能够一起去参与和支持，为孩子和社区发展提供最大的支持。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yaowen/201306/399ab007402446e6a9c7817657af68a9.shtml>

[【返回目录】](#)

凤凰网公益：看身负财富和转型的中国 再论现代慈善理念

身负巨额财富和转型压力的中国，为现代慈善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看到，现代慈善积极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在为巨额财富寻找回归社会的最佳通路；与此同时，转型期的社会价值观也亟待慈善精神的构筑和引领。

从事现代慈善，需要现代慈善理念，遵守现代慈善伦理，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普及一种新的常识，其实要花较大的功夫。

以捐赠为例：2008年5月末，在汶川地震发生两周后，一家企业向地震灾区捐赠了500万元。有人说捐得晚，有人说捐得少。2013年4月，庐山地震发生后，有的企业选择匿名捐赠而不为人知，又备受指责。

5年来，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与慈善沾边儿带来的不是赞颂而是质疑。甚至一度，为避免争议，很多企业捐赠都绕道而行。

如果用现代慈善理念来审视，这样的现象有些匪夷所思。应给予捐赠者以尊重和赞扬，本是现代慈善最基本的伦理之一。

不仅如此，现代慈善还有着更多的理念，需要不断地升华。过去几年，中国公益研究院曾经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慈善理念进行过多次阐述。但是，当前关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些讨论表明，确立现代慈善的理念，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社会过程。在现代慈善体制还相当欠缺的条件下，现代慈善理念的全面确立面临着较大挑战，特别需要慈善理论工作者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说明。

当前，特别需要澄清的理念包括：慈善究竟是政府强制的义务还是公民自觉的奉献？慈善的评

价是不是适用商业的标准？慈善家的尊严与隐私如何保护？公开透明的界限应该如何划定？诸如此类问题，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认识和管理习惯，都会得出有悖于现代慈善理念的结论。

比如说，如果认为慈善是一种义务，那么，一旦人们捐赠，就被视为完成社会义务，就成了公众人物，就要如同政府公务人员那样接受监督和质疑，谁还敢再捐赠？那种把慈善家变成传统社会中皇帝树立贞节牌坊式人物并百般挑剔的理念与行为，并不适合现代社会。

其实，如果按照现代慈善理念，捐赠者属于公民的自觉奉献，他们将自己的财产奉献于社会，当然会有其不同的个性表达，有的高调以倡导，有的低调以涵养。无论如何，真正的慈善家在现代社会中都会受到尊重，因为他们毕竟将自己的财富奉献社会，走在了社会的前列。如果说，企业家是社会的稀缺资源的话，那么，慈善家更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人们对慈善家往往持赞赏与宽容的态度，这是现代慈善的一个基本通则。

再比如，慈善界与商界的行為标准有没有差别？应该说，两者之间因为立足点的不同而有着本质差别。商界以“取”（即挣钱为自己所有）为主，慈善界则以“给”（即财富回馈社会）为主。商界规则 and 标准是为规范“取”而建立起来的，如果将其简单地搬到以“给”为主的慈善领域，有时则会得出相当荒唐的结论。举两个例子：慈善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跨界合作成为潮流。要建立儿童大病救助体系，就需要捐赠方、保险公司、银行都加入进来，有的甚至是志愿加入，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关联”行动。这是关联交易吗？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向联合国捐赠土地，会不会因此得到较为良好的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回报？这些问题，都不是一般的商业规则所能判定的。而这正是慈善的魅力所在。

确立现代慈善理念和伦理体系，对于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乃至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现代慈善应该是一项让捐赠者、参与者以及受助者都有尊严的事业。基于此我们认为，以下一些基本理念是不言而喻的：

1、赞赏原则：应对捐赠者给予赞赏

慈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因而对捐赠者应该给以更多的赞赏而不是百般挑剔，以鼓励更多人参与其中；

2、自愿原则：公民自愿 社会主导

慈善是公民的自觉奉献而不是政府强制规定的义务，因而慈善应该以社会为主导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

3、宽容原则：对慈善工作者宽容

慈善工作者以使命为定位，从不同角度推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对于慈善工作者的错误和缺陷，人们往往报以宽宏大量的态度而不是无限上纲；

4、透明规则：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

慈善的公开透明与政府的公开透明有着重大区别。政府因为是纳税人供养，因而必须向全社会公开。但捐赠者的捐献是出于自愿而不是义务，因而公开透明的前提是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在相当多的情形下，捐赠者不愿意向社会公开，社会舆论十分尊重这一规则。这里通行的是捐赠权高于社会知情权；

5、关联属性：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推动

慈善工作既要推动社会进步，就需要政府和商业界的加入，同时也不乏与政府和商界的合作，慈善界追求建立更多的关联以壮大自身，这种“关联交易”往往十分公开并鼓励社会参与。世界第一慈善家族洛克菲勒捐赠纽约的联合国用地并推进华尔街的改造以及为中国建立协和医院，已经为国际慈善界树立了典范；

6、提升功能：需要大量社会创业性投资

慈善事业需要大量的社会创业性投资，包括建立与支持学校、兴办图书馆和医院、研究与科技、文化、体育等公益事业以提升人类文明；

7、行业意识：汇聚专业人才而不是无偿奉献

慈善事业是较为发达的专业而不是一般的施舍，因而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并且需要建立起系统的行业体系，从业人员同样需要工资与报酬，不能将慈善专业与无偿奉献混淆起来；

8、专业意识：提供专业服务而不仅是募捐

慈善事业的主体功能是在救济弱势群体的同时提供以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等为基本对象的社会服务，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需要各类专业知识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募捐；

9、资产意识：慈善资产归社会所有

现代慈善已经不是现收现支的行业，慈善组织往往拥有巨大的资产因而同样需要经营和投资，股票与房地产业往往是慈善投资的重要领域；不过，这种投资所得，是为慈善组织所有而已经不是个人支配。慈善界通行的是社会所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或者个人所有，这是所有制的巨大创新；

10、共享精神：慈善反对剥夺 提倡共享

慈善是优雅的社会行为，因而更多地注意保护慈善家的尊严和隐私。富豪们的慷慨捐赠，决不能变成对降低富豪生活质量的苛求。慈善反对剥夺，慈善提倡共享；

11、包容精神：行善不问动机 倡导大爱

现代慈善特别关注社会的积极效果而往往不是严格拷问慈善家的社会动机。传统社会往往认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但现代慈善确实倡导超越性的大爱。即使犯罪人士捐款行善，慈善界同样接纳；

12、传承精神：提倡为己行善 推己及人

现代慈善倡导平民慈善，尤其推行组织行善，即使家庭行善，也往往鼓励成立基金会以形成机制。现代慈善提倡为己行善，因为行善往往是先惠及自身，促进家庭传承，跳出“富不过三代”的陷阱。

我们重开现代慈善理念的讨论，目的是推动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我国的慈善事业的格局已经迈入现代，但过去的理念还在牢牢地束缚着社会的行为。希望通过系统讨论，促进现代慈善理念的进一步普及。

来源：凤凰网公益

地址：http://gongyi.ifeng.com/shenbian/detail_2013_06/08/26251513_0.shtml [【返回目录】](#)

慈讯网：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

前言：近年来，中国草根组织逐渐显示重要的功能，出现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大众并不了解草根组织，媒体工作者对草根组织的了解局限于某些组织，政府部门及国内资助型、运作型基金会对草根组织的功能多存争议。本文摘引自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完成的研究报告《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以草根组织促发展》。

研究项目于 2012 年 4 月启动，2013 年 6 月结束。本项研究所述的草根组织是指自发的（民间的）、自治的（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其中，服务于社会底层/弱势人群的草根组织更具代表性。本项研究运用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对草根组织的价值和功能进行剖析，涉及数百个案例，对 35 个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度调研。研究从“是否”的角度看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即只要中国草根组织在发挥某种功能，我们就认为其具有这样的功能。报告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围绕草根组织功能的理论进行解析。第二部分从对个人、公民社会、政治系统、市场系统四个方面阐述和剖析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第三部分进一步剖析中国草根组织的发展状况、成因，并对草根组织的未来发展给出建议。本文涉及的内容只是研究的一部分，摘引了其中一些研究结果。

近年来，中国草根组织逐渐显示重要的功能，出现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大众并不了解草根组织，媒体工作者对草根组织的了解局限于某些组织，政府部门及国内资助型、运作型基金会对草根组织的功能多存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草根组织“可有可无”。本文主要回答：草根组织有什么用？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价值是什么？草根组织与事业单位、官办组织相比，有什么不同？草根组织正在经

历何种挑战？如何正确认识草根组织？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与理论陈述相符，中国草根组织的“实然”功能与“应然”功能没有差别，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不具特殊性。但是，中国草根组织发挥功能的程度则具有中国特殊性。中国草根组织对个人、公民社会、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所发挥的功能不成熟且不均衡，西方草根组织在此四方面所发挥的功能相对成熟且均衡。比如，我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极大的拓展，在促进市场和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引领和推动社会创新等对政府、企业有益的方面，草根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反抗市场暴政、参与公共政策、制约政府权力、促进政治民主化、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以及保障人权方面（特别是第一代人权）实际发挥的功能相对微弱。

中国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

1、对个人

草根组织针对中国人权长期严重受损，个人权利意识薄弱及责任意识缺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特别是对第一代人权（公民权、政治权）的维护，称得上是“捍卫”，表现得更为“冲锋陷阵”。在维护特殊人群的第二代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环保领域维护第三代人权（集体人权）方面，以及提升个人（劳工、艾滋病等领域）的权利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草根组织“具有推动着公民权利从符号化、虚置化向实体化转变，具有对公民意识的权利个体的锻造”的功能。

2、对公民社会

中国国家权力依旧极其强大，社会发展空间及力量仍然非常弱小。公权力得不到制约，有时被肆意滥用，单个的公民有效地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才能有效地形成制衡国家或市场权力的集体力量。然而，中国当下极度缺乏独立自主，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并合作、参与公共事业的态度和行为，即公民精神；缺乏广泛、丰富而紧密的公民结社；公民间基于自由交流与合作形成的牢固的信任和合作网络（社会资本）严重缺失，人与人之间纵向网络被隔断、横向网络难以建立，人与人的关系疏远、淡薄，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被称为“我不信”时代。社会信任本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和控制机制，是维系社会系统的重要凝聚力，是社会整合的超级“粘合剂”，一旦破坏难以重整，但一旦建立，则具有正叠加效应。民间良性互动增强时，社会资本会进一步增值。中国草根组织在社会资本构建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显示了它不仅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互惠，还有助于维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助于确保政府的绩效，大大降低政府规范市场和解决矛盾的投入。

草根组织对促进公民精神、实现线上及线下结社、积累社会资本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3、对政治系统

随着社会力量的成长，社会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政府权力的越界越

来越难以接受，对政府无法顾及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边缘弱势人群的利益进行补充，对滥用职权、不作为、浪费和贪污腐败等进行监督、制约。

一方面，草根组织弥补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发展教育，发展文化、科学事业，发展医疗、卫生，发展基层体育事业，促进环境问题解决，维护社会治安）上的不足；另一方面，草根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的、自主、自发的力量，从政治参与、政府问责两个方面，对政府的权力运行发挥制约作用，这种对某些政府权力不当、不作为的制约长期而言，不是消极的制约，而是向政府的谏言，是期待政府体制的改善，有助于政府提高绩效，有助于政府形象的改善。长期来看，有助于政府合法性的建立，具有积极作用。

对经济系统

三十年改革开放，“市场失灵”现象以及政府对市场失灵进行的不恰当干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贫富差距、资源及收入分配不均、生态环境恶化、市场监管不力，以及随之产生的寻租、腐败……

草根组织在认同、支持市场良性运作的前提下对市场发挥了弥补与制约功能。在经济生活方面，有助于解决就业。监督企业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慈善责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

与事业单位、官办组织相比，草根组织对个人的第一代人权的保障、对公民社会的促进、对政治系统及经济系统的制约，显示出独特的作用和不可替代性。

与事业单位、官办组织相比，草根组织的不可替代性除了直接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功能外，在其他方面，如社会及群体利益代言，独立的组织意志，传统慈善加现代公益的工作策略和服务供给方式，广泛的活动领域，贴近基层，非官僚的管理方式，及时地回应现实需求，充满活力、灵活度，创新性、相对有效的资源利用效率，是使草根组织能够有效发挥其不可替代性的保障。

严峻的现实

草根组织有“繁荣”，也有“萧条”。虽然人们认为现在的草根组织很“繁荣”、热闹，这些草根组织声音虽大，来自政府、社会、行业的支持很多，但是草根组织获得的资源及服务覆盖的规模仍然难以与事业单位、官办组织相比。

更不幸的是，草根组织一些难能可贵、不可替代的功能体现为“萧条”，例如在保障第一代人权方面、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方面、监督与制约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方面，均显示出功能发挥的艰难。草根组织在夹缝中求生存，具有社会合法性，却难以获得法律合法性；它们资金来源少，且不稳定；它们的人力资源多为志愿者，少专职人员……

草根组织的“萧条”不是其本性所致，与其外部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萧条”的背后更多是政府与民间/社会力量抢夺资源和利益，对草根不友好，而业内支持少，自身发育不良、能力弱。草根

组织本身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如内部治理缺失，资金困境，业余主义，特殊主义等。

正确认识草根组织

1、草根组织具有鲶鱼效应，是社会“搅动棒”

草根组织大量出现、“四处游动”的过程中，触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方方面面，包括政策与体制；草根组织的行动也使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产生反应，变得紧张起来，避免被“吃掉”，而修正缺陷和不足。草根组织推动突破性的改革。

2、草根组织是社会“稳定器”

草根组织以组织化的方式捍卫、保障服务群体的利益，对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具有积极作用。它们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利益维护，避免了权利缺失者“上街”维权，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缓冲带”。各地草根组织快速成长，其“触角”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延伸，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政府管理的“减肥剂”、社会融合的“黏合剂”和社会矛盾的“稀释剂”的作用。社会发育帮助政府“瘦身”转型，草根组织分担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作为市场体系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心下移的载体，构建了利益协调机制，推进了社会自治。

3、草根组织独特的优势可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

草根组织激活、强化社会力量。社会活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安定有序、长治久安。不能正确认识草根组织的积极作用，歪曲、怀疑、低估草根组织的功能与价值，长期来看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来源：慈讯网

地址：http://www.icixun.com/2013/0531/1262_2.html

[【返回目录】](#)

王龙玺：青年参与公益：细分领域的专业社群发展

2008年因为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不但社会发展领域如同春风化雨，中国青年志愿者的发展也受到极大促进。2009年开始，支持青年参与社会发展领域的机构和项目不断增多，到2013年，会议培训与小额资助项目两种模式逐步形成，分庭抗礼。其中会议培训以MAD（创不同，Make A Difference）为代表，每年年初在香港召开，有来自亚洲各地从事各类社会发展工作的年轻人与知名学者参加，充满了国际范儿。而在江苏无锡起步的春晖论坛，经过5年的坚持和探索后，也成为了充满鲜明本土特色的大聚会。一北一南，遥相呼应，成为目前国内全领域参与的典型代表。小额资

助最广为人知并具备影响力的是谷歌的“益暖中华”和零点咨询下的“黑苹果”项目，此外例如 Co-China（我在中国）、康师傅创新挑战赛等都成为中国青年参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志(ChinaYouthology)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因为既不属于传统 NGO，也不是传统意义的企业，同时关注更广范围的青年事务，所以虽然其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但暂且不在社会发展领域与青年参与的话题中进行探讨。

但是在整体上，大部分志愿者及其组织的发展形态还处于初级水平。主要表现为不具备独立的知识结构、技术与管理发展能力。细分领域的社群是指具有具体而非宽泛工作内容的个体和组织，例如罕见病或者性教育。社群的形成并不只是个体或组织的存在，而是在一定规模基础上技术、信息、方法、理念的交流，活动与重大事件的串联以及公平竞争中的发展制衡。

青年参与社会发展项目应当包含至少三个条件：

1、为最终目标人群提供专业的服务。例如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在青年人中开展性教育、通过艺术促进自闭症儿童转变等。

2、为社会发展工作降低成本。例如志愿者工作降低时间与人力成本、分解机构零散工作等。

3、提高自身社会竞争力并成为社会资源。例如经过培训的志愿者掌握了开展性教育培训或项目管理的能力，不但自身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对于性教育机构或社会发展组织来说都是行业储备人才。

2009-2013 五年期间，同益学生圈（Vjoin）于 2011 年上线的 Ijoin 项目是少有的优秀案例。这个项目的模式是：寻找到一批名牌高校（如清华、北大、斯坦福等）中管理、咨询相关专业的学生，经过培训后组成不同项目小组，为社会组织提供业务咨询服务，同时在企业中找到一批具有相当管理咨询资历的职业工作人员担任顾问，在项目执行中提供指导。Ijoin 项目成功的满足了三个基本条件：为社会组织提供了咨询服务并提出具体行动建议，降低了咨询工作带来的成本，对自身专业提供了实践并成为咨询行业的储备人才，实现了三方受益。

虽然在多领域和机构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青年组织开始以专业的形式参与社会发展工作，但是因为发展阶段的限制，氛围快速变化的同时并未在实质层面造成太多高质量的改变。我们可以小额资助作为案例分析。

小额资助项目的基本模式是：机构提供一笔资金支持社会发展工作，符合条件的青年组织或个人可以提交项目申请，通过之后给予资助。根据不同机构的项目目标、项目设计以及机构风格产生差异化的三个要点是：

1、资金可能支持全领域项目，例如益暖中华与黑苹果，无论是助残、环保、扶贫、动物保护还是性教育都可以进行申请。也可能支持细分领域的项目，例如青基会与耐克 2010 年启动的“爱超越”项目，该项目目标是支持社区青少年参与运动发展，共支持 100 个小项目，每个项目最高可申请 1

万元资金，因此只有和促进青少年参与运动相关的项目才可以申请。

2、资助机构可能只对项目进行筛选、支持与考核。例如艾博基金会始于 2011 年的“青年自主实践小额资助”项目，该项目关注领域为“艾滋病直接相关的任何问题”，单笔申请上限为 2000 元，执行周期约 8 个月。项目结构较为简单，除申请、选拔、报告与财务检查外不提供额外培训。也可能提供配套资源，例如“爱超越”项目在申请成功后会先进行为期 4 天的集中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基本运动训练（由耐克公司的专业运动教练提供）以及社区参与的认识与方法（由提供能力建设的专业机构进行）。

3、受资助“青年组织”可能只限于学生社团，例如中华环保基金会 2007 年启动的项目，至今已发放 6 批资助，只有高校注册学生社团才具有申请资质。也可能支持更广义范围的“组织”。如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的“青年先锋”项目，支持包括跨学校与地域群体，职校工厂等流动青年在内的多元群体构成。

在性教育领域，2000 年起，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中国计生协（CFPA）、美国帕斯适宜科技卫生组织（PATH）、红十字会（Red Cross）、玛丽斯特普中国（MSIC）等数个国内国际组织开始在中国高校中支持性教育社团与志愿者小组的建立。这些机构在数年间建立了诸多社团并培养了大批志愿者。截止 2012 年 11 月，MSIC 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CPWF）的社群调研资料共收录社团 153 个（估计全国类似社团总数超过 300）。2008 年起，项目逐渐结束，资金和技术开始撤出，但大部分社团留存下来持续开展工作。这些社团目前虽然都在正常运行，但开展活动多数陈旧单一，缺乏创新和信息传递的可及性。同时因为管理能力的不足，许多社团长期做同样的活动，重复消耗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并没有为社团带来知识结构与提供服务能力（包括技术、渠道、可及性与质量）的增长。

青年组织的改革重点

虽然在十年之间，这些青年组织为上百万的年轻人提供了具备一定专业性的性教育服务，但一旦失去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质量会迅速下降，并且不具备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而除了环保和性教育之外，其他社会发展的细分领域甚至尚未成型。一分为二的看，青年组织与支持机构本身对社群整体的发展困境都负有责任，青年组织（以下以高校社团为例）需要改革的重点包括：

1、建立以使命为导向、提供细分社会服务的社团形态。几乎每所高校内都有“青年志愿者协会”，而协会开展的工作也大致相同：助残扶老、环境保护、帮扶助教……而很少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出的差异化形态。在有明确重点领域的小额资助项目中，申请者在回答“你为什么想做……（某个领域的工作）”，出现频率最高的答案是“我/我们对……很感兴趣”和“我们觉得……很重要”。这和企业面试提问“你有什么优势”时回答“我觉得自己很有潜力”更难以让面试官难以接受。因

为跳出机构，从更广范围内看，虽然不乏有少数极为真心的社团，但大部分社团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可以拿到资助，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组织提供小额资金，只要条件并非无比苛刻，这些社团就很有可能逐一表示对此领域“很感兴趣”。这种短时的资助既不能带来真正的服务（因为无技术与经验的积累），也不能培养行业人才。

一些人提出异议的地方在于，是否只能做一个领域？如果发现不合适是否还要继续坚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不只做一个领域，但是不能漫无目的的做所有领域。即使是盖茨、洛克菲勒、福特以及全球基金这种拥有十亿甚至上百亿资产的全球超大型基金会也都会有自己的细分工作领域（全球基金主要关注疟疾、结核与艾滋病三个领域，福特基金则关注环境、性与生殖健康等六个领域），这些领域的选择都是建立在组织价值观、长期的实践探索以及多方讨论的基础上确定的战略方向。虽然青年社团或组织与这些超级巨鳄相差甚远，但在发展的本质上并无不同。即如果社团存在只是为了 **have fun**，顺便提供社会服务，那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想要致力于为缓解某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做出贡献（是为缓解做出贡献而不是解决），那么必定需要在使命的引导下确定工作的细分领域，并且寻求长期、持续性的发展。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考虑到年龄结构、流动性以及规模，青年组织和社团的使命与细分领域的最好有具体、明确的表述。例如青岛某高校做性教育社团的负责人说，他们社团的使命是：“让青岛 XX 大学的每一位女生都没有意外怀孕的困扰”，这种使命的表示既具体化，有可行性又有充足的发展空间。而诸如“为了实现青年人的潜能”、“爱心献社会，真情暖人间”或是“快乐环保，你我同行”这样的描述只能成为流于形式的口号。

2、建立适宜的组织架构及以岗位为需求的招募方式。很多人都以社团组织的人数为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一位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骄傲的宣称协会在校内有 2000 名会员。组织形态千变万化，我们简单的将提供社会服务的青年组织等同于雏形的 NGO，从目前国内 NGO 的发展形势看，大部分 NGO 的人数都在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偶尔有几十人（包括活跃在中国的国际组织），只有像 NPI 这种具有一定全国影响力的超大型（对 NGO 来说）NGO 才可能拥有百位数级别的职业工作者。2000 从数字上已经突破了当下 NGO 的极限，但是需要考虑的是，在服务状态的人员会有多少？

虽然目前尚无权威或有影响力的青年组织发展报告，但经验表明，大型的规模（100 人以上）并不能带来大规模高质量的服务，大多数的成员都处在一种闲置状态，而组织本身最终会成为主要负责人简历上的几行经历。考虑到青年人的学业或工作等时间因素，一般建议成员规模在 5-30 之间，比较适宜发展。

另一个需要改变的重点在于招募形式。以高校社团为例，大多数的社团招募都是接受无限的报名和面试，最终每个部门保留大约和上一届相同的人数，虽然这个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依据。而好

的制度应该是有明确的岗位需求，例如“宣传部”今年需要4个岗位，在部长的协调下，一人主要负责微博、公共邮箱等日常维护与管理，一人负责各类文件的撰写，两人负责海报绘画。那么在招募时就应该有明确的岗位描述与具体职责，例如报告撰写人的职责包括：学年5个主要活动、1个项目、1份年度报告的撰写以及其他日常活动的通讯。此外招募的人员和方案也需要具体的培训（下文第4点中会介绍）。

如果这样，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招募与组织形态的职业化，需要提前规划，而目前社团的运转模式大多为活动前的两周开始进行策划，或是因为某个特别机遇、甚至是管理者的心血来潮而突然决定增加某个活动。这种发展模式类似于“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社团无法具备长期影响力和竞争力，而形成的深层原因是没有长期的目标。所以无论何种短期问题的结局，经过讨论最终都会发现，所有实践层面的争论都会回归到同一个问题：组织存在的使命是什么？虽然其答案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使命为导向是世界范围内一切伟大组织基业长青的先决条件。

我们给出一个简要的两年社团运转模型：即将“退役”的管理者与新上任的管理者共同讨论并确定接下来一年的发展目标、关键指标以及主要活动。并以数字化以及时间表的方式确保一切进程可以被监控和评估。新上任的管理者需要在一年时间内推动目标的实现，这听起来就像公司董事会确定战略目标由CEO进行管理实现一样。

如果更进一步，在中国高校本科4年（除医学、城市规划等特殊专业外）的制度下，3年制参与期的结构更为合理（相比常见的2年）。即具有岗位专业潜力或能力的成员在大学一年级时参与具体事务，2年级可以担任部门负责人，带领小型团队推进目标完成，3年级时可以成为社团总负责人协调各部门推进战略目标实现。这一切的先决条件包括三个：社团使命与个人兴趣相合、社团提供专业化的培训与服务、社团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更广泛的社会事务（例如外界培训或项目等）。三个先决条件确保了在社团中能够得到非常具体的技能训练，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价值。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包括负责人）常常对工作产生无力感，失去一切激情，总感觉被推着完成不愿意做的工作，接到负责人的短信就心烦感觉又要干各种各样的活，这在职业发展中被称作“耗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疲倦与逃避情绪。

3、建立痕迹管理制度。“痕迹管理”对大多数的组织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如果将“痕迹”换成“档案”或许更容易理解。举例来说，如果某个社团在世界艾滋病日当天要办一台晚会，在晚会之前所有成员都会很忙，直到晚会结束收拾完会场，所有人都觉得这件事终于过去了，但实际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被漏掉了——晚会痕迹资料的总结与传播，或是只将痕迹材料粗暴堆砌而非筛选整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某个社团在某次活动中拍了400多张照片，结果他们将所有照片一次性一起上传到人人网，其中有大量重复的照片——真的会有人看吗？许多支持机构收到的项目材料

中也经常是好几 G 的未经筛选的照片。其实高质量的照片只要几张就足够了，如果每次活动的照片都经过筛选，那么用不了一两年的时间，社团就有很多精彩的照片可供不同场合的宣传、文件封面等使用。

痕迹管理基本构成包括两个方面：

(1) 规范的痕迹体系。例如我们一般推荐的社团痕迹包的一级目录中包括“行政与传播”、“人事”、“活动”、“项目”等几部分，二级目录为年份，既不能太复杂也无法太简单。还有文件的命名方式，我们经常会看到例如“项目书 final”、“项目书 final2”、“项目书最终 final3”这样充满辛酸的文件名，如果在修改过程中统一使用一定编排的方式，例如“文件名+姓名+时间”（“志愿者年会报告-wlx-20130405”）不但能顺利地找到最终文件，也能很好的了解修改过程。规范的痕迹体系能帮助每一个查找痕迹资料的人都能轻松顺利地找到需求的资料。

(2) 使用网络提供的系统进行公共管理。如果一个社团在经过良好的改革之后将痕迹资料完好的传承了 5 年，假设每年有 10G 资料（考虑到照片、视频等文件），5 年就是 50G。5 年之后这些资料会让新任的负责人非常头痛。而社团与机构毕竟不同，无法（至少绝大多数）通过购买服务器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网络系统进行管理就非常有效。例如建立优酷的视频空间，将所有高清视频传至优酷，视频只由原有人员保留，如果有特别需要可以通过保持更新的“人事”档案里联系该成员。建立公共邮箱，重要对外事务统一用邮箱联系。建立公共相册，经过筛选的照片统一传至相册，每届负责人掌握相册空间密码，每一届的人都得到细分相册密码随时下载等。

(3) 有效痕迹材料的识别能力。（见下文第 4 点）。

缺乏痕迹管理的最大弊端在于一切相似的工作都需要从零开始，而不是直接复制和改进以往的工序。社团于是就陷入了重复不断的轮回，年复一年的做同样的事情。

4、建立培训体系。培训体系是为了保证一个新成员加入社团后具备岗位所要求的能力，从而更好的服务于社团使命的实现，说小一点为了更好的完成各种各样的活动。举例来说，招募时通过统一的制服、胸针、标识以及纲要性的语言介绍社团，招募人员的站立以及接待的流程，提前的演练，考核之后统一发送短信的内容，谢绝和录取的内容，这些都可以工序化。大部分社团每年的报告很多，但真正拿得出手经得起考验的报告少之又少，如何能写出一份高质量的报告，这些都不能仅仅靠挑选一个文字能力不错的“新人”，这只能让他成为具备写好报告潜力的人，而在真正进行工作前需要进行基本的培训。还有上文中的痕迹管理，在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需要保留下来，例如一个社团一年实行了一个性教育的培训项目，在整个项目中需要搜集哪些材料，哪些数据、什么形式的感言、哪个角度的照片能够最好的反应项目的成果，这些都需要培训。培训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在长周期内促进专业技能与职业素质的发展。每一届人在接受过培训后都不需重新摸索，而在

实践中可能有更深的体会和改进，从而通过痕迹系统更新培训内容，最终形成良性循环。也只有通过培训体系，个体在组织中才能获得更专业细分的能力拓展，这也从利己的层面减少了人员流动性。

虽然一个青年组织能够长远发展的因素复杂无比，但总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两点：发展眼光与执行能力。发展眼光是指能够敏感观察到社会动向并积极参与其中的视野与远见。近几年来各类社会发展组织在青年参与领域投入的钱并不少，每年超过千万，真正的问题是缺乏具备资质甚至申请勇气的人。例如前文中提到的“爱超越”项目。为了更广范围内的挑选申请者，项目启动后青基会与耐克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数所大学进行大规模发布活动，鼓励社团申请。但也许长久习惯了校园温室环境的社团觉得受到基金会资助执行项目是一件遥远的事情，所以在 100 个最终支持社团背后，只有不到 400 个候选申请者。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支教类型的项目，并不具备任何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另外一面在艾滋病领域，一些提早了解动向的社团领导人以非常积极的姿态开始尝试，例如南京某大学社团 2010 届的负责人成功独立申请到了全球基金项目，在国内高校中不说绝无仅有，但也十分罕见。

执行能力则保证了在公开市场中能够胜出。例如 09-12 年间北京出现了数个以“分享社会发展领域信息与思想”为核心工作的青年组织，而目前看来，大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在建立网站、网络小组转发各类信息一阵后都很快销声匿迹，而 706 空间却在众多同类组织中高歌猛进，成为北京地区青年活动的一道风景线。这与其诸多细节的执行是分不开的，例如每位参加过 706 活动的人都会进行登记，专门的工作人员会在每次活动前通过飞信系统进行预告，这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痕迹管理做法，但大多数组织并不会很好的运用，因此如果眼光决定了道路，执行能力就决定了组织在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

支持机构的变革方向

支持机构同样需要作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改变：

1、制定核心信息或知识结构的框架。通过网络培训（基于 QQ 群或 YY 语音）、阅读材料与水平考试确保受资助人对行业基本信息有统一水平的认识与了解。将集中培训的内容集中在对课题的深入理解、实践方法的探讨与技能的训练。例如性教育领域，受资助人或组织应当在资助机构的指导下先自主进行学习，了解生殖健康、性行为、性别等基本知识，之后进行水平考试，考核通过的人才能够继续参加深入培训。

2、深入培训中对理念与技能方面应采取不同策略。理念方面寻找行业内杰出的人员进行培训，如同教授为小学生上入门课，多年的理解与工作实践能够促进参与者在最开始对行业有深刻的理解与认知。实践方面应当选择最具备一线经验的工作者而非知名人士，并且采用参与式的方法。例如“项目管理”是许多培训中常见的内容，而大多培训内容都枯燥无味，只是简单的进行框架与概念

性的培训，例如“什么是项目”，“什么是管理”，“项目与活动的区别”、“项目书的结构”。良好的参与式培训可以在培训前一天晚上布置作业，发放经过整理的数份不同类型的项目书，并提出具体问题，例如“项目的基本要素包含什么”、“X号项目书的是否有设计缺陷”、“Y号项目书的预算合理与否”等，参与者需要提前独立思考或小组讨论，在正式培训上进行分享并由专业人员进行指导、提炼与总结。

参与式的设计能让参与者有对主题有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在青年人的培训中，除了那些最具有大智慧的培训者能从理念上触及参与者心灵，相当多具有各类头衔的“知名”人士对于“领导力”“管理发展”等内容的培训都流于概念，而缺乏实践技能。最明显的是在目前国内的小额资助领域，几乎没有机构能提供操作层面的财务培训，包括发票的识别、票据管理与保存的形式等，更关键的是，机构财务通常要求所有花销必须有发票，而青年组织开展活动大多难以得到票据，特别是在二线城市或农村地区，这种情况下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票据作假，项目花销的合理性几乎难以得到验证。因此深入培训的整体策略应当是重两头轻中间，即找到教授甚至院士级别的人来进行深层次的影响，找到最一线和具备实践经验的人来进行实践能力的训练。

3、项目开展过程中给予持续性的反馈、指导与监督。小额资助项目的长远意义并非寄希望于从中产生出具备重大变革的社会发展项目，年龄与专业性限制以及中国本领域的发展阶段的因素限制了这种可能的产生，虽然不排除有少数极其优秀的年轻人做出具有一定影响力与革新价值的示范，但小额资助项目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提供早期的行业技能训练，支持社群发展并遴选潜在的行业人才。青年人毕竟有自身的限制，如果缺失反馈等过程性工作，项目形成的影响非常有限，仅仅是拿一笔钱资助一批年轻人做了一些事，参与者在其中得到的仅仅是开展工作的经历，在没有监督、规范与优秀参照的前提下，这些经历几乎不能带来任何个人或组织技能与视野上的拓展。而资助机构有多年累积的经验，这些经验都可以帮助解决非常具体的问题。

例如，在性教育领域，受资助的组织在开展活动时很可能遇到强大的阻力，社团为了争取支持会告知校方要在学校内开展某组织的项目，而校方或当地政府通常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特别是资助机构是国际组织时，青年组织甚至可能会遇到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很多社团都曾经抱怨校方不开放或观念落后，但实质是缺乏足够的沟通技巧与经验。解决的方式是，社团先告知校方学校的学生存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例如意外怀孕与艾滋病感染），而自己想要为同学的健康做出努力，但由于缺乏资金与技术就找到这个领域内某知名机构寻求帮助，其后得到资金与技术支持，现在需要开展具体活动希望学校也能提供一些资源，这样不但所面临的压力和审查会减少很多，还可能受到校方的大力支持。

4、对社会发展以及专业性的理念进行澄清，使参与者具备社会学、人类学等视角来观察社会发

展工作，而不是用“充满热血”但却略显幼稚的思维方式。诸如“不收费的纯公益”、“没有商业合作的真公益”、“志愿服务不求回报”等简单层面的思想水平，看似具备感召力，其实毫无实际意义。少讨论爱的奉献、神鬼轮回、善恶循环、感恩的心、商人唯利是图等，多讨论服务可及性、商业思维与社会发展、非盈利组织的管理等，鼓励在了解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文明讨论可能存在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理性看待社会发展领域的各类问题。

5、对专业性进行持之以恒的训练。包括守时、参加会议自带水杯、使用一次性水杯做好记号以免浪费、开会结束主动收拾会议室等基本自觉行为，成为具有职业素养的工作者。在项目书、报告、宣传等事宜中学会客观叙述，祛除习以为常的空话套话，例如从“与各大高校共同开展”、“立足校园，关注社会，奉献爱心”、“刮起了一阵……的热潮”、“X 位一体、科学创新”。学会用数据以及简单易懂具有实际意义的文字和语言叙述。在总结报告时学会从深层思考问题而不是一味抒情，例如“我们的团队就像家一样温暖”、“为我的青春画出了闪亮的一笔”。社会文化的长期影响让许多青年人深受其害，许多报告通篇寻找不到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具体措施外，从整体策略看，支持机构还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1、与受支持组织或个人保持合作而非从属关系，同领域内机构相互推荐，共同支持优秀组织与人员的发展，加强技术与管理方式的竞争，减小门户之见所带来的互相猜忌。

2、注重培训与过程的反馈监控、初期进行单笔额度高总体额度少的资助，挑选重点项目进行培养，以有效和创新为导向，社群形态成熟后进行单笔额度可调总体额度大的分级资助，复制和推广，发布指导材料，以管理与执行为导向。

3、注重长期回报，社群的形成需要技术与人才的发展，这些都需要 5-10 年的周期才能初具规模，特别需要鼓励优秀的人员毕业后参与领域之外（企业、政府）的工作，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国内社会发展领域刚刚兴起，各类优秀组织数量和规模有限，无法提供足够的职业岗位，早期受训实践并有优异表现的年轻人应该在更广的舞台上寻求发展，他们都会成为未来同领域发展的重要资源。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地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4062

[【返回目录】](#)

孔志祥：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建设需处理好八个关系

早在 2008 年 9 月，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就提出了“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体系”的工作思路。2012 年，作为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社会组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中国红十字会明确将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在枢纽型组织构建过程中，需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八个关系：

1. 新建与改造的关系 目前，各地大多采取对现有联合性组织进行提升、改造的方式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而且是以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人民团体为提升改造的主要对象。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充分利用人民团体自上而下的完备组织系统和人才队伍等现有资源，降低成本，而且可以成为人民团体适应社会转型要求调整自身功能、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缺点在于改造过程中会遇到原有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工作方式等方面的阻力，改造效果可能不尽理想。现阶段，立足存量、改造提升还是最现实的选择，同时，在现有联合性组织未覆盖的新领域新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方式也可以积极探索。

2. 外部授权与内部需要的关系 在如何成为枢纽型组织的问题上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以北京市为代表，由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规划和政策，对联合性社会组织进行调查，综合考虑工作覆盖面、工作积极性、工作能力、社会影响等因素，提出建议名单，由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予以认定。这种方式优势在于可以比较迅速地建立起覆盖面广泛的枢纽型组织体系，有利于工作全面铺开；劣势在于被认定的枢纽型组织对工作意义的认识和工作积极性不一致，有些缺乏主动性，导致实际作用发挥不理想。另一种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主动选择将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自身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有计划地从加强能力建设，主动发挥服务平台作用，积极向枢纽型社会组织转型。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主观能动性较强，工作力度大，基础扎实，效果较好；劣势在于缺乏外部力量的支持和推动，工作开展较慢，且主要以个案形式出现，缺乏整体的影响力。这两种方式都有可取之处，从实际效果角度看，内部需要显得更为重要，具有决定性意义。

3. 覆盖面与密切度的关系 枢纽型社会组织最突出的特点和功能就是能够联系、服务和整合一大批同领域的中小型、分散的社会组织。所联系中小组织的数量和占同领域社会组织的比例（覆盖率）是衡量枢纽型社会组织水平的重要指标，但“联系”与“覆盖”含义非常宽泛，如果片面追求覆盖率，很容易导致将大量只是形式上联系的社会组织计入“分子”，这种表面的覆盖率往往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枢纽型组织应把增强与中小组织关系的“密切度”作为工作重点，增加其与枢纽型组织互动的频率，提高项目合作、举办会议、参加培训研讨等实质性交往的比例，增强枢纽型社

会组织对中小组织的“粘度”和吸引力。

4. 个体差异与功能互补的关系 差异化的社会组织必须依靠相互的功能需要才能紧密地整合为一个整体，而不能依靠外部的命令、要求。功能的专一化使单个组织无法生存，必须在功能上依赖其他组织，这种功能依赖正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这种体系中，枢纽型社会组织应该充分尊重和利用其联系服务的中小组织的个体差异，建立良好的功能互补关系。一方面，枢纽型组织应根据自身的目标、使命和优势，明确功能定位，实现自身与所联系组织的差异化。一般来说，枢纽型组织应该努力成为专业化的支持性组织，主要任务是为执行性组织提供资源、信息、经验、制度、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性服务；另一方面，枢纽型组织应根据本领域社会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和缺口，有目的、有针对性、有重点地联系、组织、整合，甚至主动孵化、培育那些能实现与自身功能互补的中小组织，而不能一味求大、求全、求多，一股脑将性质、类别相近的中小组织都纳入自己的工作体系之下。例如，中国红十字会的核心使命之一是进行灾害发生时的紧急救援，在汶川地震救援中，总会发现国内救援队的数量、质量与救灾的要求差距很大。因此主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培育了赈济、医疗、供水、搜救和水上救生、大众卫生、心理、应急通讯等七大类应急救援队，总会出资金、设备、标准和培训，各个救援队出人力，灾害情况下出动完成救援任务，各取所需。这些救援队在 5 年后发生的芦山地震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培育和孵化实际上也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分化和专业化，进而促进了整个组织体系的合理化。

5. 资源集中获取与广泛分配的关系 强大的资源动员和获取能力对于枢纽型社会组织来说至关重要。社会组织需要的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财力、物力，还包括信息、制度、权威、关系等。相对中小组织而言，枢纽型社会组织一般具有较强的从政府、市场和社会获取资源的意识和能力，但这远远不够。资源的有效分配与资源获取同样重要，同样是枢纽型组织的核心能力。合理地将资源通过项目招标、委托执行、契约型合作、公益创投等方式传递、分配到所联系的其他中小组织，使同领域的公共资源得以集中共享，实现资源的合理规划和有效配置，并带领其他组织共同发展壮大，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才是衡量枢纽型社会组织成功与否的关键。资源分配一要广泛开放，让尽可能多的符合条件的组织都能参与；二要公平竞争，做到程序完备，一视同仁，按照组织的能力和效果分配资源，避免重复投入；三是公开透明，通过资源分配过程建立枢纽型组织的公信力，提高中小组织的归属感。汶川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曾通过下属基金会将 2000 万元资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分配给许多草根组织开展重建项目，效果很好。芦山地震后还可进一步完善这种做法，并使之制度化，可持续地将资源传递给更多社会组织。

6. 利益代表与群体自律的关系 中小组织力量弱小，希望枢纽型组织能够代表其利益，积极反映诉求、与政府对话互动，影响决策、争取资源，协调利益关系；政府希望能通过枢纽型组织在所

联系和管理的社会组织中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节约国家管理成本,实现对小规模组织的间接管理。“代言人”和“管理者”双重角色对于枢纽型组织都很重要,必须同时承担好,但二者有时会发生冲突。处理好二者的平衡,最重要的是要把为中小组织服务放在首位,尊重成员组织的利益和需求,听取他们的意见,敢于和善于向政府表达合理的诉求,获得中小组织的信任、认同和尊重。枢纽型社会组织对中小组织的“管理”是以“社”管“社”,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服从,而是一种认同基础上的引导和自律。中小组织数量众多,背景和诉求各异,能力参差不齐,良好的自律是同类组织的共同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要通过充分协商制定成员必须认同和遵守的行为规范,强调责任、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并通过加强自律和自我监督实现规范管理的目的。中国红十字会在庐山地震后成立了“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并邀请了10余家参与救灾的重要社会组织与民政部有关司局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提出了“不宜将社会组织接受的救灾款物全部统一交由政府管理和发放”的意见,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同时,平台“以开放的姿态欢迎所有有志于开展芦山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参与”,努力通过协商达成行动时的一致与协调,这种协商本身也是形成共识、接受共识、协同自律的过程。

7. 政府优势与去行政化的关系 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减少行政性、逐步增加自治性的过程,是正确处理与政府关系、与政府合理分工、与政府建立新型互动机制的过程。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应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把“去行政化”理解为社会组织离政府越远越好、与政府的关系切割的越彻底越好;二是在操作上不考虑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进行分类指导,搞“一刀切”。

政府与社会组织不可能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特别是枢纽型社会组织本身处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发挥着连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纽带作用,面对政府管理和社会自治的双重需要,具有协调政府关系和实行自我管理的双重功能,也应当具备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双重赋权。这种“行政”与“自治”的双重属性容易造成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角色冲突,需要进行适当调和,但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具备较强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对行政资源的动员力、对政府行为的导引力,正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具备且应充分发挥的独特优势,也是枢纽型社会组织担当政府与社会的“平衡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枢纽型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重点不是在形式上弱化政府联系、淡化官方色彩,而是在内部建立起适应社会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发展需要的,以认同为前提、以章程为核心、以参与为基础、以合作为纽带、以自律为保障的社会化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从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改革的状况来看,外“政”内“社”,即暂不触及行政级别、组织身份,而从内部治理入手进行改革的做法可能遇到的阻力较小,应该比较适合策略选择。

8. 平台开放与公平竞争的关系 “去垄断化”也是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点,作为公共

服务平台，枢纽型组织应打破部门、行业、身份的限制，对同领域、同类别、同性质、同地域的社会组织开放，欢迎、吸引中小组织加入平台。开放性会在不同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之间形成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对于枢纽型组织的发展和枢纽型组织体系的建设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公益慈善组织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开放和竞争关系，汶川地震、北京 721 水灾和芦山地震后，很多社会组织组成大小不一的“救灾联盟”、“平台”参与救灾，社会组织“联盟式”救灾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共同发起的“4.20 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明确提出以开放的态度欢迎所有有志于开展芦山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参与，并共同协商建立合作机制。平台不但参与救灾工作，还利用灾后重建机会推动县级红会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建设，孵化和带动当地的社会组织。基金会中心网与 100 多家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 4.20 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发布了联盟公约；陕西、甘肃、安徽、云南等省也成立了社会组织救灾联盟。但总的看来，当前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开放程度偏低，竞争程度偏弱，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引导。

来源：中国红十字总会

地址：http://www.redcrossol.com/sys/html/lm_8/2013-06-04/095850.htm

[【返回目录】](#)

杨鹏：公募基金会就是要刺激公众参与

《公益时报》：芦山地震，壹基金募款的表现非常打眼。对此，大家分析了很多原因，包括品牌效应、名人效应等等。你比较认同哪一种？

杨鹏：大家都没有分析到位，其实壹基金有个秘密。

一般的公益组织成立、运作都只有一个目标——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无论是做儿童帮扶还是灾害救助，大家在机构成立之初都有非常明确的服务对象，公益组织要做的就是系统地为这些人提供服务。这可以归结为慈善目标。

但除了这个目标之外，壹基金还有另外一个其他公益组织可能提过，但却并没有成型的战略目标，就是推动人人公益。壹基金不单要自己帮助服务对象，还要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帮助。“尽我所能，人人公益”是壹基金的愿景，我们在衡量业绩、评估项目时也会考量两方面因素：一是有多少人得到了帮助，二是有多少人参与了该过程。像这次芦山地震，我们参考的指标不单是总共募款的金额，还有参与捐款的人次。

壹基金非常注重刺激公众的公益体验，希望公众在有了一定的公益体验之后，能变成一个真正

的公民：有公益理想、关注公共事务。

《公益时报》：所以壹基金会经常举办一些以公众体验为主的公益活动？

杨鹏：是的。比如每年 4 月 2 日我们举行关注自闭症儿童的倡导活动——蓝色行动。就是要大家把脸涂蓝、拍张照跟网友分享，非常简单。我们就是希望提供便捷的方式让公众参与到公益中来。

再比如 7 月 20 号，壹基金会启动“为爱同行”的活动，要求 4 人一组，完成 50 公里的夜行。这个活动是为今年冬天的“温暖包”筹款，每组成员在报名时要承诺筹到 1200 块钱，但不要求报名的时候交，只要在夜行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完成筹款任务就可以。我们也不鼓励这 4 个人平摊，而是鼓励他们去向身边的朋友、办公室的同事募集。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项目，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人要有团队精神，同时也是一次诚信训练——在行走之前你有一个公共承诺，你要想着完成它。我们计划召集 1 千支队伍，就是 4 千人，每个人再辐射 8 到 10 个朋友，就是近 4 万人。在这 4 万人都有了这样的公益体验后，他们就会记住壹基金，记住“温暖包”项目。可能这一次他没有捐款，但是遇到像芦山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他们就会第一时间想到壹基金。对于基金会来讲，这就是人气的累积。

《公益时报》：其实对于基金会，尤其是公募基金会来讲，都有引导、教育公众的义务。

杨鹏：我非常希望动员其他公募基金会走类似的路：通过帮助别人来刺激公民参与，或者说通过刺激公民参与来帮助别人。至于非公募基金会，因为它是少数人出钱，应首先满足少数人的捐赠需求。但公募基金会不仅享有公募的资格和权利，更要承担一个向公众提供平台的义务，真正推动公民参与公益，这样才能体现其价值。

在这里，平台的作用是引导，不能说是教育。基金会只要提供平台让公众体验就可以，本身并没有教育的资格，公众在参与公益的过程中就完成了对自己的教育。当然，如果把这个当成筹款的策略来考量是没有力度和效果的。公众有判断能力，分得清你是真诚的还是有其他目的。

《公益时报》：除了筹款外，壹基金在这次地震救援中动员的志愿者数量也是最多的。那么在志愿者管理上，采取了哪些方式？如何在短时间内达到有序运作？

杨鹏：壹基金从来不缺少志愿者管理的经验。你知道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的发放是通过邮政系统，而我们“温暖包”的发放全部通过志愿者。由于渠道不同，他们的分拣、投递比我们精细，但我们却积累了很多志愿者资源。这也是之前提到的刺激人人参与公益的一种方式。

去年，也是在温暖包发放的过程中，壹基金帮助陕西的民间公益组织进行了整合，成立了陕西民间公益行动联盟。壹基金对其日常的工作有一些支持，比如秘书的工资由我们发放、发放“温暖包”时产生的一些费用：汽车加油费、志愿者简餐等我们给报销。他们也会参加壹基金组织的培训，

对壹基金的工作流程非常了解。这次雅安仓库就是由陕西民间公益联盟来管理，再组织一些当地的学生帮忙。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壹基金志愿者的核心组织系统不是临时的，是有成熟的组织框架的，核心志愿者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合作伙伴。

《公益时报》：壹基金将灾后建设项目定义为“4H计划”，着重提到灾民住家（HOME）。但据了解，壹基金此前并没有房屋建设和社区治理的相关经验。你打算该如何应对？

杨鹏：有些人怀疑壹基金这次募了这么多钱，拿那么多出来做灾后重建，之前又没有经验，到底行不行。但是大家不知道，壹基金整个灾害管理部都是从乐施会搬来的，深圳壹基金的班底与几年前挂靠在红会下面时的大不一样了。

对于乐施会来讲，这些人员的流动让其伤筋动骨，但对于壹基金来说，却等于有了一个灾后重建经验极其丰富的团队。

而在建房子方面，万科会帮助我们，他们在汶川和玉树地震后积累了大量建抗震房的经验。万科还有建筑研究所，可以帮我们做调研、设计，不需我们出钱。

房子建好后，在社区自治上，阿拉善研究的就是社区治理，而壹基金不单我是一个是从阿拉善过来的。所以，虽然壹基金此前没有相关案例可以借鉴，实际上却在各方面都有很成熟的经验。

《公益时报》：这次地震中，针对政府和其他公益组织的表现，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杨鹏：这次芦山地震有一件事情可以写入历史，那就是政府成为了一个规则的守护者。壹基金取得的成绩是享受到共同、平等竞争的结果，我真觉得要感谢民政部。3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放权让利，结果带来了经济的繁荣。30年后，雅安公告（《民政部关于四川芦山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就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笔，它甚至带动了整个公民社会的活力。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tjxw/201306/3b7a65377d2b472898b37a9642bad945.shtml>

[【返回目录】](#)

冯永锋：环保组织探索“邦联制时代”

每个人都是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是第一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相独立又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又互相欣赏。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某件事的核心力量或者说动力之源，也没有一个人再说自己是围观者旁听者打酱油者；没有一个人再相信世界有绝对的权威和章法，也没有人再相信，经验会比冲动来得重要；更没有人再拿理性、感性、智性来作对立化的分析和评判。

这样的时代，我姑且将其称之为“邦联制时代”，我在中国的公众环保运动，恍惚看到了这个时代正在到来。

冲动不是魔鬼，而是天使

大巴车缓缓地开动，接下来是至少两个小时的行程。车上的乘客或者说参会代表，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大家不知道窗外会掠过什么景色，也不知道路上会遭遇多少艰辛。

秩序稍微落定，主持人很快就站起身来，她拿起话筒，宣布“大巴演出团”开始上演。车上几十个人，究竟谁是“中国好声音”？谁会沉默到永远，抵死也不出来露面，专心成为“最佳听众”？

气氛在慢慢地活跃起来。有人主动献唱，有人想当麦霸，有人扭捏几秒后也略带羞涩地到了“舞台”。有人唱了一首歌还想再讲两个笑话，有人讲了笑话还想朗诵一首诗歌，有人朗诵了诗歌之后还想讲讲自己的生命故事。于是，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在欢快中度过，原本陌生的人，从此变得熟悉；原本隔阂的状态，从此变得融洽。

人人都是演员，人人又都是听众。老年人唱得未必比年轻人好，“受过教育”的人未必比“没文化”的人差。主动出场的声音可能不如那些沉吟许久才出来发声的人。因“冲动”而脸红心跳忘词走调的人，更能博得大家热烈的支持和响应。“理性”在这里也是有用的，因为，这样的人可以把一首活泼无章法的歌曲唱出新的味道。即使是一直在当听众的人，心潮也无法阻挡地澎湃着，他推脱的各种手段，也足以让大家欢娱。

如果我们把面对一个案例或者说一个事件比喻成一次大巴演出团巡回演出中的一次随机表演，那么，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这一批偶然聚集的“参与者”，可能正是邦联制来临的最好写照。

在这样的群体里，“司机”未必等同于领路人，“领队”甚至也可能不知道接下来要走的方向。而被调动起来放声歌唱的各路英雄们，上台“一展才艺”之前，不知道自己身体里究竟有多少潜能。但大巴在带着大家往一个方向而去。

最有经验的人，可能在这段行程中出手最缓慢，甚至最笨拙。最年轻的新入行者，可能一次毫不符合规则的动作，就成功地打破了僵局。在这里，冲动不是魔鬼，而可能成为天使。在这里，矜持可能不是优雅，而可能成为阻隔。在这里，规则会成为压抑石而胡闹有可能成为激发器。在这里，

“理性”可能受阻于理性本身而迟迟无法成功表达“自身的智慧”，只有感性和随机才让大家认同。在这里，混沌而无序让大家焦虑却也让大家兴奋，沉醉其间。有人在悄然担心案例参与的节奏，有人却被各种意外出现的机会所鼓舞。

面对一个“不可控制的难题”，也许，采用不可控制的方法去应对，是最佳的。无论这辆车驶向哪里，也无论这辆车将停靠何处，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将因为难题本身的激发而变得浑身舒畅，也因为同伴们的表演而感觉自身体内有无穷的力量。大家会发现，付出的过程是更好的吸收的过程，表达自己的过程是激发同伴的过程。相信自己的过程就是信托伙伴的过程。在文化面前，没有人是最优的，更没有人是绝对核心，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难题面前的“玛尼堆”上，放上了一块又一块化疑解难的石头。哪一块石头敢声称自己比另一块石头更漂亮更精致或者说更符合石头的标准更能够支持公众的信念呢？

先行者未必腐朽，新生者未必新锐

每一个行业都有先入行者。他们身上鲜明地带着时代的特点。但他们又多半是智性的，会随着时代而向前搏动。

每一个行业也都会有随时入行的人。一个行业越成规模，每天的新入行者会越多。按照我的理解，中国的民间环境保护，正在成为一个“信心满满”的行业，相信这个行业有前途，愿意进来“青春走一回”的人，越来越多。

和所有的行业一样，行业内部的互相评价，往往是每一个从业者都会本能化的表达。年轻人喜欢讥笑过来人，而过来人则永远以为自己负有指导年轻人的义务。有时候说的话很难听，有更多的時候，说话者都是无心无意的。只有听到的人跑去自动深究，才生起无数的大风浪小波澜来。

如果我们把一个时间点划为一个社会断面，把一个行业在这个断面上瞬间凝固一次，我们从里面逐一分辨出各种角色，也许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一个成熟的行业与一个常见的家族有多么的相像。在这样的生态系统里，每个人都在“进化”，新生者未必新锐，先行者未必腐朽；年轻者未必创新——我看到了太多疯狂追逐保守与稳定的年轻人；年长者未必对社会潮流缺乏敏感——虽然很多人确实是忠于过去的。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每一种树都会有大树会有小树，会有枯枝败叶会有种子在底下休眠。当这个行业的参与者越多，积累越丰厚，这个行业的“生物多样性”或者说“文化多样性”或者说“行为多样性”，就越庞杂。那些动不动就想对一个行业进行梳理、条块化、系谱化、流派化的人，在一个生动的行业面前一定感觉到异常的困惑和空虚。为了让其学术文章有所成就，他们必须强行推演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冲突和分野。

每一个行业都会让人惊奇，尤其是对新靠近者来说，他们很容易听到行业内部的“窃窃私语”，

很多夜半无人的私语都会涉及互相之间的评价,有些评价甚至猛一听有些恶意,或者至少颇为生猛,让人一听容易产生追问和牢记的冲动。由此时间在这里做了个截屏和休止,于是,有人就此相信,某个行业是矛盾重重,甚至危机四伏的。

其实很多话都是行业内部的耳边乱风,没有几个人把这些话当回事。互相评价其实只是为了寻找一个互相认同的机遇,或者说互相评价恰恰是因为行业刚刚引入的“时代新风尚”让大家起了讨论的冲动。

一个充满生机的行业,几乎每个人都不是静止的,三年前认识的人,三年之后多半已经脱胎换骨。如果我们用三年前的眼光或者说当时的断片对某人某事继续究讨,会产生严重的时空错乱感。最有趣的错乱是,当时以为互相交恶的人,三年后其实已经成为富有战斗情谊的好友;三年前互相的欣赏,在三年后可能欣赏得更加深刻和到位。

一个新生行业的特点是:你永远不知道谁入成为接下来推门而入的人,你也不知道这个新入行者对这个行业的领悟有多快,推动有多强。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很多领域的边界已经非常模糊。大量的企业成为社会必需品之后,我们已经很难分清他的逐利性与公益性的分野点在哪里;同样,一个机构无论声称他们多么的创新或者定向于公益,但这个机构内部的运营方式经常又是充满了衰朽、专制、保守甚至残忍的。我们没法用彻底性去要求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一个行业,我们也同样不必在意“公益”究竟是完全新生的阵营还是老阵营的内部分化。

人身上有自私性也有公益性,就像人身上有理性智性也有感性。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法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决定了“决策”的形成,过度强调“一种决策方式”的不可替代性,都是可笑的。科学证明、逻辑推理、混沌生成、感动激发、一时兴起、民主投票、个人经历、群体无意识,都可能对某个行动产生致命的影响。

行业内的人未必专业,行业外的人未必无知

著名公益人士邓飞在 2012 年 10 月份之后以迅猛之势介入了民间环境保护。这是他的第五第六个“业务模块”,无论是“让候鸟飞”还是“中国水安全基金”,还是未来要整合出来的“明亮工程”,都让人看到了一个新媒体时代、公民社会时代的民间环境保护新风潮。

如果你坐在对面和邓飞漫谈,你会发现,在他的嘴里,世界上所有的人,似乎都是他的好朋友、死党、兄弟、铁哥们、永久伙伴。相信他是真心这么确认和传达的。

让传统的业内人士最为不解的是,他罗列的人这些人,全都是“业外人士”。无论是公益界还是环保界,被他所借用的资源极为稀少,除了非在不可的公募基金会作为资源落地方之外,其他的“合作伙伴”,几乎全来自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

这种“极不专业”却又极速扩张和蔓延的“新公益少林拳”,在两三年之前席卷了无数国人的公

益梦想。像媒体不需要对报道对象了解有多深一样，公益，也不再需要对公益这个行业有多么专精的知识，恰恰是不专业的、临时的甚至无序的随机组合，给了邓飞的各个团队以无穷的生机。

人们当然会批评邓飞团队建设速度过快，以至于有太多的时候需要频繁地依靠志愿者接力来完成。但有趣的是，志愿者是如此的源源不断，找上门来要成为团队成员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这条线根本不会断粮。同样，志愿者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给力派”，原因倒也简单，就是清晰的目标给大家明确的业务生长力，在这清晰的目标面前，专业知识不再是障碍，原先的固执经验不再是障碍，年龄、性别、籍贯和口音，也不再是障碍。

甚至制度和章法也不再是障碍。虽然猛一听邓飞有点像“规则爱好者”，动不动就想做模式建规则，但邓飞很清楚，他自身就是“公益不规则运动”的典型产物，他 2011 年以来的所有社会发动效果，全是来自于不走寻常路的“社会创新”。

在这个极不规则的过程中，有一个暗中的思想是极为规则的，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国家，所有的人联合在一起的过程都像是一个个主权国家组成“联邦”的过程。这样的组合方式，用自然界的“共生群落”来形容最为恰当。

甚至传统的基金会也被这样“不规则和不专业”作派给盘活。中国的国家级公募基金会，由于害怕公众的指责，因此，应对的办法一般有两个，一是尽量减少做业务的量，以避免出现过多的差错，授人以柄。二是把大量的财务风险推给合作伙伴——或者说受资助方，让其陷在财务清白证明的泥潭里不可自拔。

但显然，与邓飞合作的专项基金由于事先具备了太多的信任基础，社会对财务方面的焦虑有所减缓，对业务焦虑的血压也在缓缓下降。这提醒了诸多的基金会，其实获取社会信任的办法恰恰未必是减少从业量，也不是粗暴地把财务风险当成折磨合作伙伴的心灵密码，而是积极地投入真正有价值的公益业务中。在这过程中，即使出现了一些意外和错误，也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因为，只有做事的人才会犯有价值的错误。

邦联制时代的到来，让传统的公益事业排序方式、参与方式、卷入方式都产生了急剧的变革。人们已经不必再为明天如何参与公益事业而发愁，真正需要发愁的将是那些抱残守缺，消极参与公益事业的基金会、各部委直属的民间公益组织，真正需要发愁的是那些仍旧以审判合作伙伴为基本工作手法的“资助方”。互助服务型的公益群落正在出现，因为，每个人的公益能量都随时可以得到激发和导流。

来源：作者博客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dcfa9701011dy5.html

[【返回目录】](#)

焦兴旭：也谈“公益托拉斯”

家禽托拉斯的故事

A 君是一个小县城的教书先生。作为知识分子，A 君除了教书育人也常常关心县政，时不时写一点文章做“警世钟”。一天，A 君路过菜市场，便临时起意想去逛逛体察民情疾苦。一个卖鸡的摊位引起了 A 君的关注。原来县城虽然物产比较丰富但都给给类店铺都让官家把持着。普通人要吃鸡除非去省城买，官家的铺子都是特供的普通人买不到。A 君一下子警惕起来：“能在这个市场卖鸡，肯定是县长小舅子。现在县城的社会结构越来越板结了，官商勾结。”A 君逛了一圈又有新的发现：目前整个县城做这个生意的就这么一家；而且这个老板不单卖鸡，连鸡食也是他们自家的，另外偶尔还卖烤鸡翅和茶叶蛋。A 君眉头皱的更紧了：“垄断县城鸡肉市场，上下游产业通吃，这个人想干什么？”作为县城大儒，A 君回去立马写了一篇大作——《家禽托拉斯——从某鸡铺看县城社会结构板结》，文章从“社会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四个角度阐述了目前县城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剖析深刻，影响了很大一群人也开始关心县政。年末 A 君还凭借此文，获得当年度“县城脊梁”奖。唯一的遗憾是县城老百姓吃“肯德基”这样的新鲜玩意还是只能去县城。

以上的故事虽然是杜撰，但对于 A 君这样学者却常常见到——书生造反，三年不成。有时候心里憋着“Too simple, Too naive”也不说，怕伤害到学者的自尊。这样的学者看问题只看到表面而不研究肌理，乱套理论还显得忧心忡忡真让人着急。学界与 NGO 实务界本来是天然同盟，但经常遇到这样一些“坑爹”的队友，让人觉得构建公民社会的障碍不来自利维坦而来自我们自己：怪兽的尾巴都没摸着，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了。

见木不见林

脱离行业背景看组织发展是见木不见林。不说公益行业现状谈公益托拉斯是不负责任。从我理解的公益环境来看，无论从 NGO 数量，从业人员质量，领域细分程度，公众认知，行业规范与伦理等等都还在处在初期。行业里面能和其他界别平等交流对话的 NGO 实在太少了，公益行业太需要阿里巴巴之于中国电商、苹果之于手机这样直接推动行业发展的组织了。我们国家现在将近 50 万的注册 NGO 里面，正儿八经的 NGO 还是非常少：26 万的社团里面大多是行业协会和学会，22 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里面大多是民办学校、养老院和幼儿园，基金会才三千家资金占大头的全是大学基金会。每万人 NGO 数量很低而且还不算很多注册了的官办 NGO 就是个空壳。从业人员知识水平、年龄结构、技能经验都远远不足，绝大多数的社会精英那是在国外、在外企、在政府而非 NGO。按照萨拉蒙的 NGO 分类目录里面我们还有多领域至今还是空白；业务模式上很多 NGO 还是手工作坊。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对我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希望工程”和“好人好事”上，大多数官员对我

们的认知还停留在“事业单位”或者“妇联残联”上，大多数企业家对我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帮困助学”上。各个机构间缺乏共识与伦理规范，网络上常常相互掐架。行业发展尚在襁褓，共同体连架子都还没起来。现在就谈公益托拉斯为时太早了。饼才芝麻大小，就去担心饼的分配不公实在庸人自扰。关于社会现状，我更认同秦晖先生所说：在一元组织体系下，社会变革缺乏可替代的组织资源。这个论断估计体制内明白人更有体会，职能转移的客体还没发展起来呢，我给谁去转移？在缺乏社会资本的背景下，我们的学者是否应该“少谈些主义”，如台湾学者一样多做些事情？

即便说了上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正面谈谈所谓“公益托拉斯”以正视听。

公益托拉斯是伪命题

公益是所有公民社会福祉的帕累托最优与各个群体利益相互妥协的最大公约数，天然就无法垄断。再昏暗的时光里，也总有日行一善的人；再厉害的中间人，也无法同时站在两边。公益从来就不可能被哪个主体所垄断。如果要谈政府垄断公益，说的也只是政府垄断了组织化行善的渠道和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目前的确是组织化行善最好渠道与最大的资源提供方。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原子化的社会结构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很多在既有政府体系内部没有细分的垂直领域（例如某个失独老人群体、尘肺病人等等），政府一点渠道优势也没有；随着非公募基金会的崛起、网络募捐对公募资格的颠覆、企业 CSR 的兴起，政府在资源上又不是唯一。就算某个 NGO 全面和政府贴身合作攻守同盟，也不能说就形成公益托拉斯吧。（公民社会中 NGO 相对于政府也未必各个都是独立自主：与政府结盟、与政府保持距离、与政府博弈的 NGO 都应该有才算多元。）最后，商业中公司最大特性是利益最大化，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形成托拉斯。但在 NGO 领域，价值观的多元性、利益诉求的矛盾性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行公益主体本身没法形成统一体，公益托拉斯从主体上也不成立。

组织规模与效能才是核心问题

公益托拉斯是伪命题，但公益领域机构有大有小，资源分配有多有少是个社会事实，到底如何解读？在这当中有的小机构乐于小而美，有的小机构要发展壮大；有的大机构裂变化，有的大机构还要进一步扩张，这些现象又该如何看待？之前和世强讨论过一个问题我觉得才是这些现象背后的东西：一个 NGO 到底应当多大？这个才是学界需要深思和研究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在于背后隐含了很多内容：

NGOer 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不匹配。NGO 要扩大组织规模，很大的一个动力就在于 NGOer 个人在发展。今年一个项目助理打打杂，过三年你还让人家打杂肯定不行。3 年前你给项目负责人发五千的工资三年后你还发五千对不住。个体的人在不断成长，组织如果不成长就很容易人才流失——一个人的薪酬和发展空间会受限。另外一种，一个 NGO 如果发展速度太快，人才成长跟不上，

那么团队要么工作压力山大要么组织效率低下。人和组织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矛盾难于调和。

NGO 的原始积累与科层制官僚化的矛盾。草根 NGO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如同民营企业一样必须经历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很难想象缺乏流动资金、缺乏人才储备、缺乏知识沉淀的 NGO 能够可持续发展。而上面说的这些都需要通过组织发展“攒家底”。这个过程使得组织规模必须到达一定的程度。但随着组织的扩大，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层制官僚化。人员数量增加一倍，沟通成本增加两倍，管理成本增加四倍。组织的扩大让组织内部的分工进一步加剧，个体的人会逐渐转变为机器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进程下科层制官僚化很难避免。

资源统筹在不同业务模式上的有效性不同。这里面业务模式包含了领域和层级两方面的因素。从领域角度来看，做以志愿者为服务对象的组织天然就需要很大否则没有规模效应。而一些以少部分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的 NGO，一方面专业细分普通人很难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服务对象本来就那么少 NGO 不可能规模很大。因此在一些领域可能是资源集中一些好，在一些领域可能是资源分散些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说 NGO 应该小而美或者大而强。从层级角度来看，在社区的 NGO、以城市为核心的 NGO、跨城市的 NGO 因为服务的方式不一样，统筹资源的有效性也会不同。就拿灾后重建来说，可以给 100 家小 NGO 也可以给 5 家大 NGO，哪种方式更有效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看法。直接切入社区 NGO 可能更贴近需求服务更有效，给大型 NGO 可能避免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因此资源统筹有效性的不同，使得 NGO 在组织规模方面还需要仔细研究。

总结一下，我认为 NGO 的组织规模与社会效益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最为关键的地方。一个能让内部良性互动，外部高效服务的 NGO，我真的乐见这样的 NGO 能成为“托拉斯”，虽然理性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不会出现。但我们对于 NGO 组织规模的探索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希望能和读者共勉。

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返回目录】](#)

谢家驹：社会企业的中国命题

社会企业在未来会成为潮流，但短时间内还做不到。今后 30 年，社会企业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

随着时代发展，企业家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回报，希望借助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也试图摆脱对传统捐款的依赖，谋求可持续性的财务来源。社会企业——这个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新鲜事物在中国应运而生，并开启了第一波社会创业潮。

社会企业既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机构。正如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所说，“社会企业的最大特色是通过企业家的思维，利用商业策略达致社会目标。”所以，其重视社会价值，多于追求企业盈利。

作为一种以公益慈善为目标的新兴组织，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前景十分可观。不久前，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黑暗中对话（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谢家驹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表示，未来 30 年，社会企业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

以资本运作达到社会目的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是一个新的领域，它该如何定义？

谢家驹：“社会企业是一盘生意，用以达到某种社会目的，例如提供社会所需的服务或者产品、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和培训机会、保护环境、利用本身赚取的利润资助其辖下的社会服务等。社会企业所得利润主要用于再投资本身业务，以达到既定社会目的，而非分派给股东。”这是香港政府对社会企业的官方定义，我个人比较认同。

NGO、社会团体等机构同样也很好，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要依靠别人的捐赠或者政府的资助生存。而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它不计较资金的来源方式，可以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形式集资。

社会企业要容许分红，如果不容许，投资者的钱就好像捐出去了一样，但是捐出去又会有很多选择。很多 NGO 都在募款，社会企业却能做到有投资有回报。香港政府关于社会企业方面的规定，大多是援引自英国，但英国只规定社会企业产生的利润大部分要用于社会企业内部，并没有说全部，而香港政府在引用之后就变成全部了。三年前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 NGO 反对得很厉害，他们认为社会企业也应该是政府提供资助的一种方式。

《中国慈善家》：为何美国的 NGO 要远远多于社会企业？

谢家驹：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基金会较英国而言更多，所以英国需要自己想办法。我提一个人——首尔的现任市长，他就是一个社会企业家，他以前名片上印的头衔是“社会设

计师”(social designer)。他参考了英国和美国的很多经验后发现,在英美,有很多组织要求其会员捐出每年收入的 5%或 10%,他觉得这个很有启发。回到韩国后,他将这个方案挪到社区基金,让社区里的每个人捐出年收入的 1%,2011 年有六万人参与了捐款。该机构有近 50%的钱都是从这种渠道获得的,另外 50%可能是比较大额的捐款。他们投资于 NGO 或社会企业,支持他们认可的、对社会有意义的组织或社企。由此看来,社会企业越来越不是需要依靠一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群人集结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社会影响力投资在未来会成为主流吗?

谢家驹:我希望社会企业在未来会成为潮流,但短时间内还做不到。一个人投资在社会企业领域,并使它产生影响,这是我对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最基本定义。很多人在投资时过于重视资本回报,比如做黑暗中的对话时,我们也向很多人士或者基金会寻求过资助,但他们对此不太感兴趣,因为觉得金钱回报率太低,他们希望自己的投入既有社会影响力,又能有相当不错的回报。

但情况并非这么简单。黑暗中的对话刚启动时,没人可以预测这个计划是否能成功,投资者也没兴趣投资给风险这么大的项目。这两年,香港有很多人都在谈论社会影响力投资,但我并没有看见他们真正付诸实践。

创新不足是社会企业的最大挑战

《中国慈善家》: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香港的社会企业最大的不足就是缺乏创新。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一点?

谢家驹:我所说的创新,是指社会企业所设计或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要创新。这也是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社会企业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要求。首先,它必须有社会价值;其次,它必须能创造收入及利润,让企业能持续地经营和发展。此二者缺一不可。但如若产品和服务设计欠缺新思维,或者运作模式缺乏创意,要想同时达到上述两个目标,便是缘木求鱼了。

社会企业作为中国的一种新兴机构,有着诸多不足,但是,创新精神的加入,能够帮助仍处于发酵期的中国社会企业走得更远。创新能够让企业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度,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这样才能达到它成立的最初目的一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在香港,NGO 从几十年前、甚至 100 多年前就开始起步,最初还是很有创新精神的,只要存在社会问题,他们就想办法帮助解决。随着 NGO 越做越好,政府开始直接购买他们的服务,不用亲力亲为。这样过了几十年后,有些 NGO 差不多就成了半个政府部门。然而,几乎所有 NGO 都表示不接受贷款,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可以做好。他们已经习惯了政府的资助,等资金用完后就把机构关闭,或者另外申请一个基金,又或者 NGO 自己补贴。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社会企业的出现,

为许多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的影响力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谢家驹：“social enterprise”是指社会企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则不太好翻译，大致意思是社会产业。后者除了包含前者之外，还包含例如慈善团体、NGO 等机构。大卫·伯恩斯坦在《如何改变世界》一书里指出，很多人是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但创办的并非都是社会企业。比如全球领先的社会企业家培育组织阿育王（Ashoka），在全世界大概有 3000 个伙伴，粗略来讲，其中只有一半是社会企业。

未来 30 年，社会企业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社会企业的书，是英国出版的，叫做《社会企业家的智慧》，讲述了六个英国社会企业的案例，它们最早出现的时候都没有政治参与，都是由普通人做的。

现在，美国硅谷出现了很多做公益的新方式，比如资本的运营和新技术的参与，这些都对公益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有个朋友就很热衷于研究这个，我自己也了解很多新方法。就国内来看，联想的项目运营得还不错。

来源：中国慈善家

地址：<http://news.hexun.com/2013-06-03/154805762.html>

[【返回目录】](#)

高连奎：公益慈善背后的“成本黑洞”

前段时间壹基金 2000 万善款流入自己下属研究院的事情，经过媒体的追问和壹基金的说明有两个事实基本可以确认，第一是流入研究院的 2000 万善款已经用光，其次这 2000 万中确实有 400 万来自于公众捐款，笔者对其中复杂的运作和披露细节不感兴趣，只想谈谈这件事情背后公益慈善的“成本黑洞”问题。

做公益慈善也是需要成本的，特别是专职的公益慈善，成本太高，具体来说，仅仅这些人的工资、办公、餐旅就是一笔极大的费用，一个小小的研究院，两千万的巨款仅仅几年就耗光，可见其开支之大，也许有人会说这里面有黑幕或是不正规的地方，其实就算是正规的公益慈善，其开支也大的惊人。

我们可以先根据美国的情况做下计算，根据王振耀提供的数据，美国 2008 年的捐款为 3000 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为当年美国财政收入的 10%。而美国现在的慈善组织上百万个，

有 940 万专职工作人员，另外还有其他义工、半兼职的还有 400 多万人。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是 43460 美元，那么 940 万人的工资支出是多少呢？4085 亿，算下来美国人每年募集的捐款，远不够给这些所谓公益慈善人员发工资呢，而这仅仅是公益慈善人员的工资一项，就够救助一次解决危机了，而真正的慈善运作还包含办公室的租赁费用，出差的餐旅费，人员的培训费等，最终算起来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而我们之所以选 2008 年，是因为当时美国受经济危机影响还不严重，慈善收入还比较高，而现在的美国由于经济危机影响，慈善募款越来越难，很多慈善组织都由于募集的善款不够给自己人开工资的而关门了。

不仅是美国，王振耀以前也对中国的慈善远景做出过估计，但按他的计算，这些善款同样也不够给专职人员发工资的。

既然一个国家的慈善总额都不够给这些人发工资的，那这些慈善组织是怎么运作的呢，其实美国很多公益慈善组织根本不用募款，他们有固定的捐款做基础，然后利用这些基金的利润来运营，他们要做的就是对这些善款进行分配使用。

美国慈善捐款从用途上主要分为几大类，其中最主要的一类，就是名牌大学的校友捐款，这些捐款大多是用于为大学修建体育馆，音乐厅，图书馆，设立奖学金等有品味的项目，基本上不面对弱势群体，实现的是“从精英到精英”的循环。

其次一类就是用于政治操作，美国公益捐款很大一部分都用于了“政治系统”或是“泛政治系统”，比如美国的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特基金会都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组织，他们不仅通过各种形式，操纵国内的政治，而且大力资助世界各国的反对派学者，这些跟传统意义上的慈善也就没什么关系。

以上两类是美国所谓公益慈善的核心部分，剩下的第三类主要用于社会救助，也就是传统的慈善，这一部分比例其实非常低，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和大众的捐款。

慈善从资金用途上可以分为定向和非定向，从资金来源上可以分为公募和私募，私募资金募集成本比较低，可以鼓励，但公募则成本极高，相信中国人见过太多街头募捐的志愿者，他们平均每人每天募集的资金都非常的少，单笔捐助一般都是五元，十元，当年汶川大地震时，笔者也看到很多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在街头进行募捐，而根据笔者的观察，几乎没有人捐款，而这些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如果是专职人员，每天募集的钱，估计都不够他们的工资和费用。

以上说的是募款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其实慈善的费用不仅发生在募款过程中，更发生在分配善款的过程中，由于很多接受救助的人都不集中，遍布全国，慈善组织将善款通过坐飞机、坐火车送到被救助者那里，都需要成本，而且对被救助对象进行真实性调查、救助效果跟踪也需要费用，

如果一个人接受 5000 元的救助，那在募款和救助两头所产生的费用可能就有 1000 多元，如果是更小额的救助成本就更高。

笔者在生活中也有几个朋友，他们成立了基金会，他们计划发起一个为贫困儿童送书包的活动，他们每年选定一个学校，一起将书包送给学生，但根据笔者的计算，他们这种“送书包”行为本身所产生的交通费餐旅费已经超过他们购买书包的费用了。当然他们都是民间行为，也不是专职人员，这样做是值得鼓励的，但如果是专职人员来做，那将是极大的成本。

公益慈善最大的损失是税收损失，为了避税中国很多公司也成立了公益组织，笔者曾注意到中国某非常知名的电影公司曾经捐过一笔款，而捐款的定向却是以自己公司命名的一个基金会，而目标却是给儿童拍电影，但后来拍了没拍就不知道了，但儿童题材电影算不算慈善了，这又是另一个疑问。中国某知名经济学者得到了一笔巨大的海外奖金，他也宣称捐给社会，但其实是捐给自己开办的咨询公司，这种左手倒右手，名义上是慈善，其实是逃税的现象，既普遍又严重。

现实中，专职慈善虽然没有公司之名，但在实际上却都是公司化运作的，而 10%-30%的管理费提成就是他们的利润来源，在经济比较好时，这些组织勉强维持运转，而一到经济危机就有大量的慈善机构关门歇业，因为“巨大的成本黑洞”就是这个行业永远难以跨越的门槛。

现在很多人所宣扬的用专职慈善组织取代社会福利建设的说法更是荒谬，因为这些组织要么回到政府供养的老路上去，要么就是靠“吃善款”生活，现在已经很多慈善组织伸手向政府要钱了，并美其名曰“购买服务”，慈善组织毕竟是社会的补充，民间慈善的主力军应该是刚刚退休，身有余力的老年人和尚未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更多靠志愿者的力量，最好不要或是极少量的占用募捐得到的款项。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慈善的存在本身是社会福利不足的表现，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可以覆盖所有人群，那慈善几乎就是不必要的，而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只需要一个制度而已，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因此发展社会福利才是根本，专职慈善只能作为补充。

来源：中国大势

地址：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49648.html

[【返回目录】](#)

刘国林：媒体在现代慈善中的功能与运用

现代慈善是一个广阔的爱心交汇和传递的大舞台，公开性、时效性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信息披露、社会监督更是不可或缺。随着现代慈善社会化发展，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现代慈善离不开媒体的介入，媒体的宣传、监督已成为现代慈善的组成部分。

怎样认识媒体在现代慈善中的功能与作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文仅就此谈一些粗浅看法。近些年来，慈善由往日的默默无闻，变为各类媒体关注度不断攀升，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成为主流话题，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当然，在认识上也还不尽一致。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慈善而言，媒体的功能和作用就是曝光，就是舆论监督。个别传媒为博得大众眼球，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语不惊人誓不休。真理和谬误之间有时只差一步。这种片面的认识，不但易于使媒体在现代慈善中失去客观准确的定位，对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不利，而且，其自身的信誉和形象也会在人们心中大打折扣。

我认为，媒体在现代慈善中至少有下列几大功能：

一、引领和导向功能。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慈善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发展虽然迅猛，但包括运行体制、机制、队伍专业技能、经验等各方面还不十分成熟。这就尤为需要在发展方向上、政策规范上加以正确的宣传和引导。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实践中哪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更值得推广。在这些方面，媒体显然应予发挥当仁不让的作用。

二、舆论监督功能。正确有力及时的社会舆论监督，是现代慈善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任何一级慈善组织对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应当真诚欢迎，而没有理由拒绝。对慈善组织和慈善工作者而言，应以一颗谦虚之心善对来自媒体的批评与监督，不断改进工作和作风，赢得社会的支持与信任。对媒体而言，同样需要加强学习，熟悉政策，擅于科学准确地实施舆论监督，力求做到公正客观。从工作层面上讲，监督并不等于使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双方始终处于对立面，从全局着眼，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因而，监督的出发点亦应是善意的，并非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至于对某些组织和个人所出现的腐败行为的揭露与抨击，则另当别论。

三、社会动员功能。我国是一个多灾国家。如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突发，紧急的社会支援救助便必不可少。往往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里，媒体充分发挥了它的速度快捷特点，及时告知天下，起到了很好的社会动员作用，为非常态化慈善求助捐赠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汶川、玉树、芦山大地震中，媒体传播、报道的作用就是例证。

四、为民代言呼吁功能。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全覆盖，但国之大民之众，个别地方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周之处。更何况，人们在平静的生产、生活中总会有突发的灾难和事件发生。当个别被

遗忘的角落、家庭和个人需要社会伸出援手时，通过媒体的代言和呼吁，往往为之带来转机，改变命运，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类情况，可以说不乏其例。

除上述功能和作用外，我觉得媒体作为国家或社会的一个单位部门，也是慈善大家庭中的一员，与其他企事业单位一样，也有自身应尽的社会责任。有些媒体带头捐赠，有些则辟出版面、拿出时段为慈善活动义务宣传，深受广大群众好评。

现代慈善是一项大众事业，需要各行各业和社会各界共同打造。只要大家都尽一份力，共同呵护，积极支持，它便会永葆生机和活力。

来源：慈善公益在线

地址：<http://www.csqyb.com.cn/bencandy.php?fid=151&id=4964>

[【返回目录】](#)

◎行业动态

社监委与红会“撇清”利益关系 重查郭美美事件提案仅获两票支持

昨日（6月11日），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委员王永透露，关于此前提出的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仅获得了包括他在内的少数委员支持。最终，社监委认为，关于对“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还有待进一步征集实证。此次会议明确了，今后所有社监委委员的监督都采用自愿义务服务形式参与，不再与红会有任何利益关系。

王永卸任自称“问心无愧”

昨日，王永透露，为了增加红会社监委工作的透明度，社监委的年中会决定，对社监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调整，以后或将定期召开媒体沟通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秘书长黄伟民将根据工作需要邀请包括王永本人在内的有关委员参加。

同时，王永从即日起不再担任社监委新闻发言人，但会继续履行委员职责。王永坦言，很多朋友和领导都曾劝他离开社监委，半年来，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社监委，也曾连续十天每天工作20小时。“我没拿过红会一分钱，问心无愧。我其实辞职很简单，发个声明就行。但如果都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和风险，那么请问中国的改革希望何在？”王永说。

重查郭美美仅获两票支持

在9日会上，社监委认为，关于对“郭美美事件”重启调查，还有待进一步征集实证。与此同时，针对近期网络质疑的社监委委员与红会存利益关联问题，会议最终决定，今后所有社监委委员的监督，均采用“自愿义务服务”形式参与，不能再与红会有任何利益关系。同时，社监委也将于本周五召开媒体见面会通报有关情况。

对于重启调查一事的最终决议，昨日，王永还是坚持表示，他一向主张重查郭美美事件，并先后三次在社监委提出。此次的年中会上，社监委讨论了这个提案，并在委员白岩松的提议下进行了表决。第一轮对社监委是否启动重查进行表决，只有王永和刘姝威委员赞成。

会议最终决定，由社监委建议红会协调相关部门，对于新发现的关于郭美美事件的证据进行调查，同时也欢迎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新的证据。

建议公众和媒体参与监督

王永认为，红会设立社监委是红会主动改革的举措之一，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没有样本可循，所有人没有经验，但是初衷不容置疑，那就是通过加强监督来帮助红会变得更加公开透明、廉洁

高效。半年来，社监委的定位不清晰是首先要反思的问题。

关于社监委的定位、职能等问题，委员袁岳认为，是帮着红会建立监督体系，还是作为顾问来为红会提醒，大家都是按各自朴素的理解去做监督。最后此次会议达成一种共识认为，“社监委将发挥社会各领域委员的专业特长，来构建红十字会的专业监督体系，扮演公益组织与民众之间的专业沟通桥梁。”

王永认为，社会监督至少应包括专业监督、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三个方面。专业监督一般通过顾问、咨询的方式进行，目标是防患于未然，形式上很像咨询委员会。公众监督通常指对贪腐违纪等个案的监督。社监委现有委员大都更适合专业监督。所以他建议社监委增加公众代表和媒体代表，以加强公众和媒体监督。

来源：北京晨报

地址：http://bjcb.morningpost.com.cn/html/2013-06/12/content_229971.htm

[【返回目录】](#)

广州慈善组织监委会名单公示

本月下旬即将成立的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已初步确定 15 名拟任委员。昨日，广州市民政局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了拟任人选名单。

目前的 15 名拟任委员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会计师、媒体人和慈善知名人士代表共 7 个界别的人士组成。其中，现任各级人大代表人数最多，达到 5 名；新闻工作者数量居其次，为 4 名，其中一人同时兼任政协委员。

在拟任名单中，有广州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城市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卢汉桥，广东省中医院原院长吕玉波，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陈安薇，原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子基，南方日报专刊部副主任、南方公益联盟副秘书长、南方公益周刊主编戴远程等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6/07/content_7197163.htm

[【返回目录】](#)

粤 25 家公益机构联名上书教育厅 倡建校园性侵防治体系

六一节前后，国内多次爆出幼女受侵害案，引发各界舆论哗然。昨日，广东省 25 家公益机构向省教育厅递交了联名建议书，呼吁尽快向社会组织打开校园空间，建立起具有“广东特色”的校园性侵害防治体系。

昨日上午，三位代表携带建议书来到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进行接待并表示，省教育部门已经在考虑实施部分内容，现有师资处、思想教育处和安全保卫处等联合负责，但仍有进步空间。他还说，“建议书非常详尽，将尽快报给相关领导。”三位代表向教育厅表示，25 家公益机构大都有一线教学经验和调研基础，如果需要师资和教材，他们非常愿意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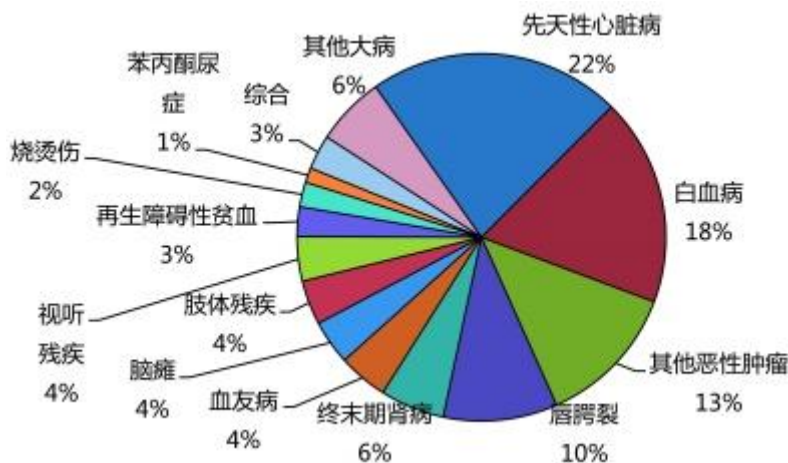
据悉，倡议建立性侵害防治体系在广东省尚属首次，此项建议书提出了“三期十建议”，即将校园性侵害防治体系分成一年近期，三年中期和五年远期，共十个具体可操作建议分步来执行。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柯倩婷介绍，“近期目标是在一年内开放一批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使得社会公益组织有机会进入学校开展培训，比如在新入学老师的师德教育课程中加入一至两节性安全教育课，并在主题班会课加入相关内容。”

来源：南都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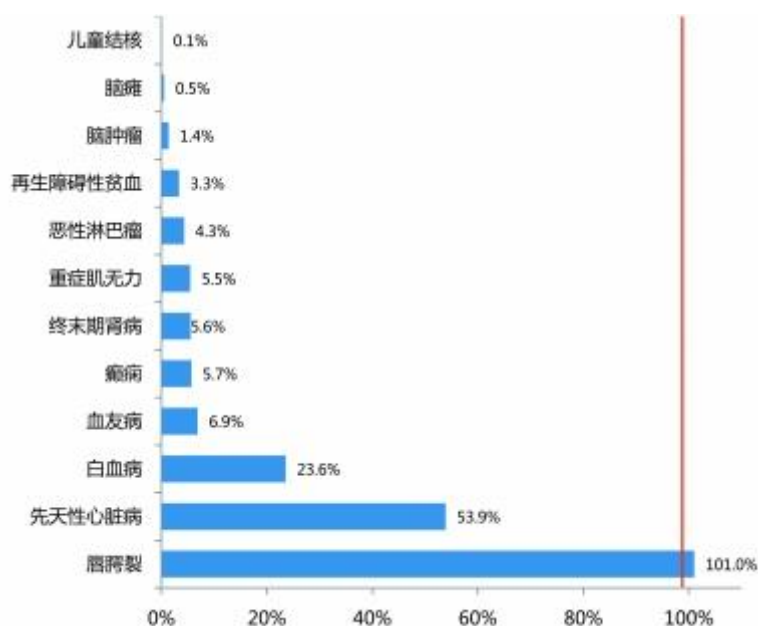
地址：<http://paper.oeeee.com/nis/201306/08/63982.html>

[【返回目录】](#)

儿童慢性疾病救助被公益组织忽视



儿童大病救助项目数量分布（按病种分）



慈善组织救助人数占新增患儿中需要救助患儿人数的百分比

经济压力

“最困难的时候，产生过放弃的念头。小女孩还有个哥哥，因为妹妹的病，哥哥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不管是生活水平还是受关注程度，不想一下子毁了两个孩子。”5月28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布《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和《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在《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对调研员讲。

该报告主要以14周岁以下贫困白血病患儿作为调查对象。在1171个有效调查样本中，经济窘迫是所有患儿家庭面临的最大难题。

“为了给孩子治病，家里以前三层的房子也卖了，在农村房子也卖不了几个钱。孩子她爸非常努力地工作，妈妈也在外面打工挣钱给她治病，我现在是整个人、整个心思都在她身上，太乖巧聪明了啊，舍不得不给她治。”一位患儿的奶奶告诉调查员，为了给孩子治病，家里花费了二十多万，现在欠着外债十七八万。

调查显示：82.78%的家庭医疗费投入在10万元以上，患儿家庭因病负债的平均金额为142,414.64元。虽然当前的医疗保险覆盖率比较大，但由于报销比例、报销范围、起付线、封顶线、异地治疗、自费药等因素的影响，报销比例在50%以下的家庭占63.03%。也正因如此，全国有高达62.6%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治疗的白血病患儿无法承受昂贵费用而放弃手术。高额的治疗费不仅耗尽了家庭的所有收入，有的家长甚至卖房、卖肾、借高利贷以筹集治疗费，经济条件恶化也造成家庭居住和就医环境更差，使患儿感染几率上升。

据了解，医学界公认的儿童白血病发病率为4~6/10万人。通过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方

式，80%~90%的患儿可以达到有效缓解，60%~70%左右可以治愈。但白血病的治疗时间一般较长，需要 2 至 3 年的时间，所需治疗费用 10 万至 30 万，骨髓移植费用 30 万至 100 万，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无疑是难以承受的。

调查员还描述：在每年新增的白血病患者中，部分家庭因为无力承担巨额的治疗费只能进行保守治疗，甚至是彻底放弃治疗，有相当一部分患儿在筹钱等待救治的过程中死亡。还有在一些偏远农村，因不能及时发现儿童患有白血病，或者相信一些民间偏方、宗教迷信，从而延误治疗。

据了解，患儿治疗费用来源前四位分别是亲朋资助、家庭收入、医保报销和基金会或爱心人士捐助，所占比例分别为 39.3%、31.9%、13.9%和 11.6%。

慈善资源不平衡

记者从《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中了解，儿童重大疾病主要包括白血病、恶性脑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儿童川崎病等。2011 年，我国 0~18 岁以下儿童数量为 3.03 亿，根据各重大疾病的发病率和儿童数量，计算出大病儿童每年新增人数，其中先天性心脏病、结核病、脑瘫、唇腭裂、川崎病和癫痫儿童每年新增病例最多。近年来，白血病、终末期肾病、先天性心脏病等疾病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在各类儿童重大疾病中，唇腭裂、简单先天性心脏病、结核病的费用较低；终末期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等需要终生进行治疗的疾病费用高；恶性肿瘤类如白血病、恶性脑肿瘤、恶性淋巴瘤的治疗费用也很高。

针对儿童大病救助，我国陆续出台了系列政策，但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仍然较低。报销比例最高的大病保险政策预计 2016 年才能在全国广泛开展实施。因此，公益组织的作用凸显。2012 年，全国 74 家慈善组织对各类儿童大病开展了医疗救助，共开展了 136 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

问题在于，通过调研发现，简单先心病、唇腭裂和马蹄足等费用较低的大病最容易得到慈善组织的救助，其中对于唇腭裂的慈善救助资金最多；对于先心病的救助，被调研医院的医生表示：“不缺少救助资源，目前的状况是医院手术资源不够，许多病人可以救治但排不上号”；治疗费用较高的大病慈善资源却较少，慢性病（如恶性肿瘤类、脑瘫、血友病、1 型糖尿病、终末期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的救助需求旺盛，在中华儿慈会 9958 接到的求助电话中，白血病和恶性肿瘤类的求助占到 50%。专家分析，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在于慢性疾病所需资金量大、治疗时间长、效果不明显或不确定，而其他的慈善项目投入小、见效快，因此儿童大病医疗救助项目尤其是针对慢性病救助并非慈善组织开展儿童类救助项目的首选。

从调查报告中可以了解：以慈善组织救助人数占新生患儿中需要救助的人数百分比来看，儿童结核病仅占 0.1%、脑瘫占 0.5%、脑肿瘤占 1.4%、再生性障碍贫血占 3.3%……而针对该比例，先

天性心脏病则占到 53.9%，唇腭裂甚至超过了 100%。调查结果显示：针对唇腭裂和先天性心脏病的救助无论是从救助资金还是救助人数上来看，都已非常充足；而针对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脑瘫等的慈善救助，无论是从救助人数还是救助额度上，都严重不足。儿童大病慈善救助在疾病救助资源分配间存在严重不平衡。

调整分配方向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慈善组织参与现状报告》建议，慈善组织应调整救助资源分配方向，加大对救助需求人数多、救助资金少的救助类项目的投入。

具体为：针对唇腭裂、简单先天性心脏病，由于自身治疗费用不高，可通过降低救助额度或提高救助标准的方式减少投入；针对脑瘫儿童，由于儿童数量众多，但单个病例所需救助资金并不巨大，而且早期的干预能够带来很好的康复效果，应扩大救助规模。“较其他慢性疾病而言，脑瘫儿童的康复必须在医院做，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容易掌握救助资金的是用于患儿治疗。”一位被调研医院医生表示。针对其他如白血病、癫痫病、重症肌无力等治疗周期长、花销大的病种，慈善机构也应该加大救助力度。

此外，血友病、1 型糖尿病、终末期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都属于发病率低、治疗费用高、需要终生治疗的疾病。由于并非一次性救治，对于基金会而言，对这类疾病的救助所达到的社会效果相对而言较小，是一般基金会尤其是私募基金会不愿介入的领域。对于这类疾病，报告建议，公益组织可选择这些疾病中救治效果较好的分型进行救治，对其他分型则进行人道方面的救助。

《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则通过对与白血病相关的政策进行解读，来呼吁全社会加强对白血病儿童的关爱和救助。报告建议，关注贫困白血病儿童，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增加我国医疗保障的资金投入，完善监督和管理，加强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此外，还建议政府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提高医疗保障的可及性，并鼓励社会捐助，动员社会资源。

来源：公益时报（记者张木兰根据报告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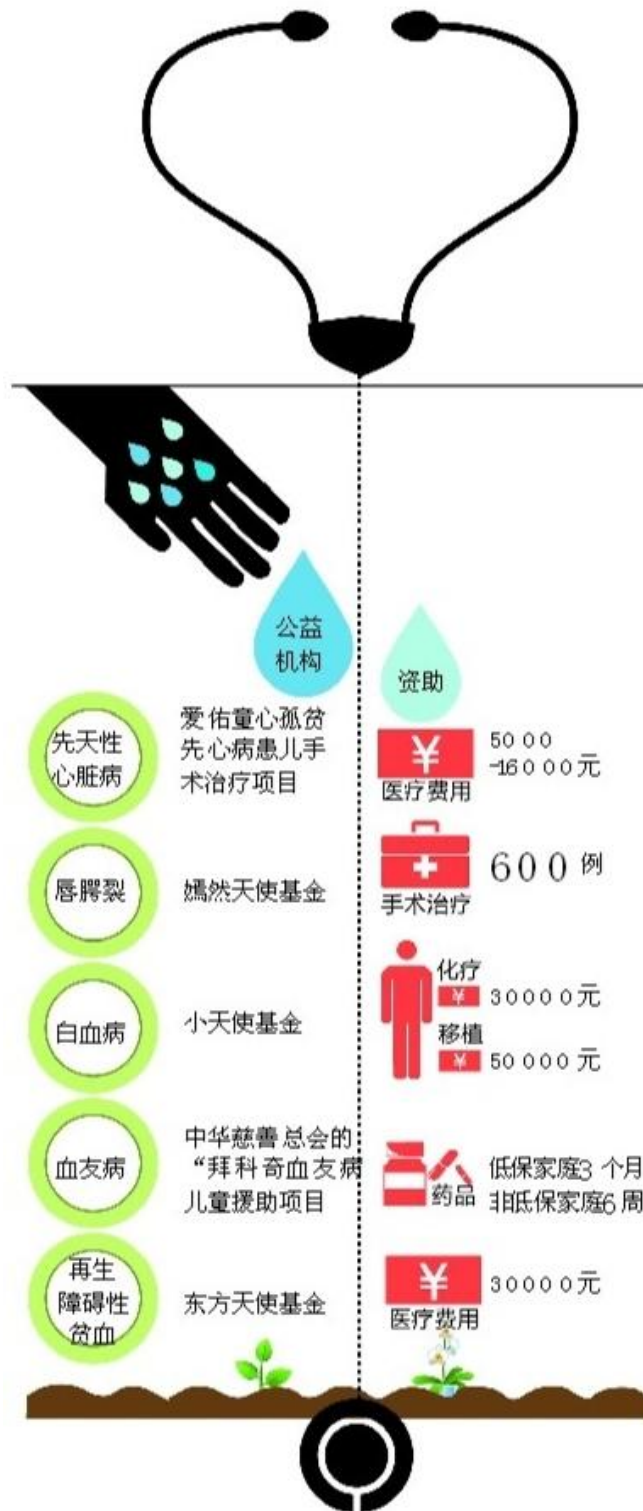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yaowen/201306/7fe9d916835a4ac481535156ffaef0c1.shtml>

!

[【返回目录】](#)

我国 74 家 NGO 或将联手造福大病儿童



近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两家受委托调研机构发布两份调研报告。该报告透露：在针对大病儿童救治方面，国内 74 家公益机构未来将加大对脑瘫儿童、恶性肿瘤儿童的救助力度。此外，该报

告倡导各公益组织尝试信息共享、联合救助等合作救助方式，共同造福大病儿童。

重症儿童家庭不能承受之痛

《中国儿童大病救助与公益组织参与现状报告》显示：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等原因，白血病、终末期肾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重大疾病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其背后是少则数千、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沉重医疗费用。可是，现阶段针对重大疾病患儿的医疗救助力度明显不够。

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为例，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专门救助儿童白血病的公益项目，从 2009 年起，累计投入资金将近 2 亿元资金对贫困白血病患者实施救助，累计救助人次 7000 多名白血病患者。可是，基金会相关人员称，按每个患儿 3 万-5 万元的救助标准算，红基会一年的项目资金仅能救助 1000 多个孩子，但排队求助者已达到 3600 多名。

除了这些医疗费用巨大的重大疾病患儿救助资金不足之外，一些医疗费用稍低、但患儿人数众多的重大疾病也面临救助资源不足的问题，如脑瘫儿童每年新增患儿中有 28 万需要不同层次的救助，但实际获得救助者数还不到 1%。为此，有不少公益机构透露，未来民间救助资金将加大对脑瘫儿童和恶性肿瘤儿童的救助力度。

民间儿童大病救治资源分布不均

据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统计，目前国内共有 70 多家儿童医疗救助公益机构，针对 10 多种大病患儿开展了 130 多个儿童医疗救治项目，惠及了上万名大病患儿和数百万户家庭。可是，民间机构投向唇腭裂及简单先心病（先天性心脏病）方面的救治资源明显充足，并略有过剩；而对白血病等恶性肿瘤患儿、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慢性病患儿的救助力度则明显不足。

“将民间救助方向和重症儿童的需求一对比，就会发现民间救助力量明显错位。”研究人员分析，原因跟具体疾病种类、治疗成效、以及公益机构管理能力等，均有关系。比如，唇腭裂治疗，往往只有一性手术就可以解决，医疗费用 5000-5 万元不等，治疗效果明显，而且公益机构管理难度不大；相反，白血病、血友病等重症疾病，不仅资金需求量大，而且需要反复多次化疗，让许多民间力量望而却步。

该院院长王振耀建议，中国公益组织儿童大病救助应结成联盟，全国 70 多家公益机构进行协同，让有限的救助力量，能更有针对性地救助重症儿童。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地址：<http://ndgongyi.oooo.com/html/201306/03/67968.html>

[【返回目录】](#)

红基会发布《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5月28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和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分别共同发布了《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国儿童大病救助现状与慈善组织参与报告》。

《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通过实地入户调查、电话问卷调查和数据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中国红基会小天使基金申请和救助患儿为主要样本，全面展示了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以及治疗、营养、教育、家庭等环节的现状，并对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大病救助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展望。

近年来，党和国家将改善民生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一系列关系民生的大事方面做出巨大努力。尤其是在关系居民健康的医疗保障方面，通过政策试点，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增加大病救助、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朝着让群众看得起病的方向在努力。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全民医保的制度框架，但重大疾病治疗的自付部分仍然让一些贫困家庭不堪重负。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一旦患上重病，将对其家庭和本人造成巨大负担，尤其对于大多数农村贫困家庭及其患儿更是如此。现在每年仍有很多重症儿童在死亡线上挣扎，很多家庭因孩子患病而倾家荡产。如何建立儿童大病救助机制，使更多患儿和家庭摆脱困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为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国儿童大病救助工作，2012年底，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委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院课题组，开展了“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从医学病理、儿童生活和心理角度，了解不同病种的儿童需要获得的救助情况。在大量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贫困白血病儿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报告通过调查“小天使基金”已资助、待资助的白血病患者，以及在调查中发现需要救助的白血病患者，建立起救助信息需求库，深入分析了我国贫困家庭白血病患儿的生存状况。

报告指出，已有的社会救助对于患儿获得治疗起到了一定作用，对患儿家庭承受的多方面压力有一定的缓解，多数家庭也都坚持寻求孩子的治疗和恢复。但社会对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庭的支持仍明显不足，不能满足其医疗费用的需求，也不能在其他方面给予患儿和家长全方位的支持。

报告通过对与白血病相关的政策进行解读，呼吁全社会加强对白血病儿童的关爱和救助，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1.坚持政府主导，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包括：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发挥基本医疗保险的“安全网”作用；拓宽保障渠道，发挥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进一步加大城乡医疗

救助支持力度，确保贫困人口真正得到实惠；建立切实可行的白血病儿童的救助方式，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提供儿童福利服务，改善现有的儿童医疗救助政策和制度。2.增加我国医疗保障的资金投入，完善监督和管理。3.要加强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4.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提高医疗保障的可及性。5.鼓励社会捐助，动员社会资源。

《中国儿童大病救助现状与公益组织参与报告》指出，在国家逐步加大对重大疾病的关注度并提高保障水平背景下，公益慈善组织发挥利用社会资源及提供细致专业服务的优势，广泛开展民间儿童大病救助工作，对于解决大病儿童及其家庭的困难，促进社会平稳和谐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报告指出，2012年，70多家慈善组织开展了130多个儿童大病救助项目，覆盖了10多种儿童重大疾病，对数万名患儿实施了救助。慈善组织儿童大病救助工作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使其成为我国儿童大病医疗救助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未来可加大对脑瘫儿童这类救助需求人数多、救助资金少的救助类项目的投入，在资金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增加对恶性肿瘤患儿的救助力度。

来源：人民网

地址：<http://gongyi.people.com.cn/n/2013/0603/c152544-21713938.html>

[【返回目录】](#)

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状况的调查



社区作为青少年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重要空间和场域，对于青少年公益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了解当前社区开展公益教育的现状，对推动社区公益教育发展，实现公益教育目标具有

重要意义。为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教育研究所作为国内首个专门从事青少年公益教育研究的机构，于2012年5-6月组织研究团队就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活动的现状、支撑条件、影响因素和社区对公益教育的认识等方面，对北京市海淀区207个社区（181个社区居委会和26个村委会）进行了相关调查研究。

仪式化、组织化、政治化倾向明显

绝大多数社区或多或少地开展过青少年公益活动，但主要集中在社区劳动、环境保护、安全教育和健康教育等常规性活动方面，同时也开展一些诸如慰问演出、捐钱捐物等具有仪式性、组织化和政治化倾向的公益活动。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2011年，有94.9%的社区开展过青少年公益活动。从开展活动的频次来看，开展过1-2次的社区占40.1%，3-4次占41.4%，5-7次的占10.2%，8次以上的占3.2%，没有开展过活动的社区占5.1%。大部分社区在一年中开展过1-4次活动。从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活动的主题来看，主要分为常规性主题活动和具有政治化色彩的主题活动。其中，社区劳动、环境保护、安全教育和健康教育是社区开展的常规性活动。调查结果表明，有74.5%的社区开展过社区劳动活动，73.9%的社区开展过环境保护活动，65%和43.95%的社区分别开展过安全教育和健康教育。同时，社区也开展过捐钱捐物、慰问性活动等主题活动，但这些活动往往具有仪式性、组织化和政治化的倾向。

面临内外部资源条件挑战

在社区中开展公益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基础条件，但公益教育要扎根社区，仍然面临着设施、资金、专业化人才，以及志愿者参与、家长支持、与学校合作等多种内外部资源条件的约束。

从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活动的自身资源来看，社区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资金和专业人士，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首先，社区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缺乏专业化人才支持。从获取有效资料的151份有效问卷中发现，仅有12人获取了中级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26人获取了助理社会工作者资格，分别占总人数的7.9%和17.2%。这个比例意味着大多数的社区工作者并没有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这对于开展社区青少年公益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次，从社区公益活动经费来看，来源渠道单一，经费支持乏力。研究团队发展、社区开展公益教育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社区的经费预算，例如85.2%的社区公益活动经费来自于社区经费预算。但是，专门用于青少年公益教育的资金短缺，很少有社区为青少年公益教育列出专项经费。一位社区工作者说：“社区的经费非常紧张，前段时间我们想给孩子们搞个活动，向街道文教科申请经费，最后只给了我们100块钱，甭说发奖品了，就是连购买活动材料都不够。”最后，服务机构和服务设施建设薄弱，已成为制约社区开展青

少年公益教育工作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来看，在获取有效资料中，直接或间接与青少年公益教育相关的有社区服务中心、儿童服务设施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其中虽然120个社区设置有社区服务中心，然而据研究团队多次观察，这些社区服务中心大都场地不足、办公条件简陋。另外，只有32个和33个社区分别设置有儿童服务设施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150多个社区完全没有设置相应的机构。

从社区开展公益教育活动的外部支持资源来看，大部分活动中有志愿者和家长参与，但参与程度不高，与周边学校的沟通合作程度较低，缺乏互动性。调查结果表明，16.4%的社区认为所有活动都有社区志愿者参与，44.7%的社区认为大部分活动有社区志愿者参与，27.6%的社区认为一些活动有社区志愿者参与，另外还有5.9%的社区认为很少的一些活动有社区志愿者参与，5.3%的社区认为社区志愿者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家长实际参与社区青少年公益活动的情况不容乐观，仅有38.85%的家长有时参加，29.3%的家长偶尔参加，18.47%的家长很少参加，4.46%的家长从不参加，8.92%的家长经常参加。从社区在开展青少年公益教育活动中与周边学校的互动情况来看，44.1%的社区与学校有过偶尔合作，29.6%的社区与学校极少合作，16.4%的社区与学校从未合作过，而仅有9.2%的社区与学校合作比较多，0.7%的社区与学校合作频繁。父母双方有一方来参与和祖孙一起来参与是目前家长参与的主要方式，两者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58.7%和27.1%。父母双方都来参与和都不来参与的各占3.9%。

三大瓶颈因素并存

缺乏资金支持、社区机构设施不足和人力资源短缺是影响当前社区开展公益活动最为主要因素，安全问题与学习成绩次之。

从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有89.2%的社区认为影响社区开展公益活动的主要因素是缺乏资金支持；25.5%的社区认为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是主要因素；34.4%的社区认为家长担心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是主要因素；63.1%的社区认为社区机构设施不足是主要因素；54.1%的社区认为社区工作任务太多，人力资源不足是主要因素；12.1%的社区认为社区缺乏专业化人才支持，社区工作人员不知道该如何开展是主要因素；2.5%的社区认为其他因素是主要因素。从这组数据来看，缺乏资金支持、社区机构设施不足和人力资源不足是影响当前社区开展公益活动最为主要的三大瓶颈因素。此调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社区开展公益活动现实基础条件”中的调查结果，由此说明社区自身对制约其开展社区公益活动的相关因素认识比较清晰、准确。有意思的是，与学校认识不同，社区认为安全问题、学习成绩并非主要影响因素。

主体意识有待增强

尽管大部分社区工作者对公益教育概念认知程度不高，对公益教育责任主体认识比较模糊，但

对社区开展公益活动对青少年成长作用的认识较高。社区对公益教育的认识与理解程度直接关系到公益教育在社区的实施与推进。

研究团队从社区对公益教育概念的认知与理解程度、社区对开展公益教育活动对青少年成长意义的认识、社区对公益教育责任主体的认识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社区对公益教育概念的认知程度较低，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社区占 6.33%，非常了解的占 3.8%，比较了解的占 14.56%，了解一点的占 75.32%。从社区对公益教育责任主体的认识来看，认为政府、学校、家庭、社区是责任主体的社区分别占 38.85%、26.75%、18.47%和 13.38%，还有 2.55%的社区认为是其他责任主体。实际上，社区公益教育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家庭教育为基础、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以社区教育为依托的教育模式，家庭、学校和社区才是真正的责任主体。但是，仍有高达 38.85%的社区认为政府是公益教育的责任主体。

当然，政府的参与对推动社区公益教育发展至关重要，但不是主要的直接责任主体。社区的这种认识偏差与我国社区“单位制”和“行政性”制度惯性所造成的社区自身功能定位错位不无相关，即社区往往把自己定位于完成各级政府机构交办的行政性任务，以及履行“补缺型福利”和“政府守夜人”的角色，而忽视自身对青少年公益教育所发挥的功能，自然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社区对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性程度认识较高，38.9%的社区认为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对青少年的成长非常重要，43.3%的社区认为比较重要，17.2%的社区认为一般，0.6%的社区认为不太重要。其中，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两项数据合起来高达 82.2%。从社区认为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应侧重在哪些方面培养青少年的认识来看，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社会责任感、社会交往、安全与健康知识、合作精神。82.3%的社区认为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应侧重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yaowen/201306/a20523bf5b5c4003abf1be46284a042d.shtml>

[【返回目录】](#)

南海外来工 NGO 进驻盘点

本周一，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到佛山调研。在南海里水镇河村社区，外来工群体的生活状况让胡春华十分关注，外来工收入水平、子女教育、未来在何处定居等都成为他关心的问题。

如何服务好外来工群体，事实上一直是南海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热点和难点。就在上周，在大沥嘉怡社区这一外来人口集聚地，“新南海人·梦家园”项目启动，8大服务外来工项目正式上马。同时，佛山首个社会政策观测站进驻“家园”，外来工的声音可以借助观测站传达到决策层。

在南海，越来越多社会机构、公益组织开始沉入社区，专为外来务工者群体及其家庭、子女提供社会服务。外来工群体能否真正融入本地社区？社会组织在开展外来工服务时还存在哪些待突破的瓶颈？如何留住这一群体？本周，带着上述问题，记者走访了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慧爱公益教育机构、广佛五金城小候鸟驿站等3家社会公益组织。

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外来工有了另一个公共空间

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设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出租屋中，负责人何晓波说，这一带估计蜗居着一两万外来务工者。

何晓波和南飞雁为外界所知，主要因其多年来坚持为佛山外来务工者提供的工伤维权服务。不过，南飞雁设在桂城的社会服务中心，更注重针对外来工工友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提供综合性社区服务，并促进外来工与当地社区的共融发展。

去年2月刚刚进驻东二街区时，南飞雁里人流量极少，仅有附近十来家外来工家庭参与其中。随着社区外展活动的推进，以及外来务工者们的口口相传，南飞雁人气渐旺。周五晚工友影院开放时，面积不大的服务中心里，有时会挤满30来个外来务工者。有人在这相恋结婚，有人在这寻求帮助，有人在这成长为外来工志愿者。

“在工厂、出租屋之外，我们终于有了另一个不受拘束的公共空间。”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肇庆人阿文看来，遗憾之处便是，融入外来工社区的社会服务中心仍然屈指可数，隔着好几条街区的人，来南飞雁的次数自然会比较少。“如果每一个集聚了超万人的外来工社区，能拥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小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看得见摸得着，这对外来工群体将是巨大的福利。”

南飞雁外来工义工队现在已发展到30来人，阿文和小张都是其中一员。周末里，他们排练应用戏剧、进行社区探访普法宣传，生活渐渐多了色彩。

困难之处

“要打破本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隔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迈开步子。”何

晓波说，南飞雁外来工义工通过探访本地困难家庭，也在为本地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我们有义工常常背一个本地病患老人上下楼，事情虽微小，但如果这样的事情多起来，本地人和外地人交流融合也才能多起来。”

慧爱公益教育

盼增强自我造血功能

“当你发现，孩子习惯于用拳头去解决问题，作为家长，你怎么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沟通？”周末，在桂城青苹果之家，慧爱公益教育机构主讲人胡嘉老师在她的亲子系列课堂上抛出这一问，随即引来家长们七嘴八舌的讨论。

慧爱公益教育机构自主研发了一套针对 9-13 岁儿童的体验式全人教育体系，致力于为中国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随迁儿童等，提供公益教育课程服务。

“慧爱教育力量有限，比如我们在外来工子弟学校东翔学校开展服务，最多能同时为 7 个班级提供课程，但整个东翔有着 2000 多名学生。怎样才让更多人受益于慧爱课程？”慧爱公益总干事姚冬玲希望能拓宽慧爱教育的辐射面。

进入 2013 年，借助优酷网等网络共享平台，慧爱上述理念正在变成现实：任何人都可以搜索观看看到慧爱公开课。“我们目前正在和网易公开课项目进行洽谈，看能否把慧爱公开课也挂到其平台上，让更多弱势家庭孩子能享受到慧爱教育课程。”

最初慧爱教育成立时仅有 10 来个志愿者。经过 3 年的发展，慧爱现有 100 多名志愿者。只有 4 名专职社工，如何推动 100 多位志愿者持续不断地投入公益事业？为此，慧爱建立起激励机制，根据服务时数将志愿者分为 7 个等级，并为志愿者创造自我成长的平台，比如有的志愿者喜欢讲台，其公众表达能力就得到了充分锻炼。“通过自我成长实现自我激励，帮助志愿者从志愿服务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困难之处

目前慧爱教育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及少量社会捐赠。“随着自我发展，我们希望能从事更多公益项目，但资金不足始终是个困扰；同时，公益机构要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也需要给予其更有竞争力的待遇。这一切，都需要丰富资金来源。”

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是该机构如今面临的一大挑战。“我们正和南海一所实验类小学接触，如果学校能购买我们的课程，我们就能将课程收费再用于服务外来工子弟，或是考虑对家长咨询进行收费，又或是通过开设城市孩子收费服务班，来支撑公益事业发展。”

广州三一社工机构“小候鸟驿站”

外来工妈妈不相信“免费公益”

今年 2 月底，佛山市首个以外来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综合服务中心“小候鸟驿站”在广佛五金城正式投入使用。小候鸟驿站由广州三一社工机构负责运营，为流动儿童及家庭提供亲子教育、爱心助学、生活艺术等服务项目，且所有项目全部免费。

安全教育，在小候鸟驿站社工们看来，得排在广佛五金城孩子们课程设置的首位。为此，驿站专门安排了流动儿童安全教育系列课程，包括正确使用止血带、绷带等，学习居家自救；情景演练学习火灾时如何逃生；安全回家课程等等。而“关爱、诚实、尊重、责任”的品格教育，则是小候鸟驿站的另一个重头戏。

起初在入户宣传时，忙着做生意的五金城妈妈，总把社工和志愿者们当做推销人员，“天底下哪儿有免费的午餐？”不过，随着社工们频繁地入户探访，以及体验过小候鸟驿站服务的妈妈们的口口相传，小候鸟驿站在五金城的知名度正在提高。如今到了周末，少数 80 后妈妈甚至会放下手头工作，陪孩子加入亲子游戏。

困难之处

目前，广佛五金城的家长们主要把小候鸟驿站当成托管班。但是，一个由社工来管理的机构，又岂能只做托管？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小候鸟驿站的社工们正和狮山大学城有关高校对接，希望能借助高校资源，邀请有特长的大学生过来组织活动，丰富孩子们的生活，改变家长对小候鸟驿站的刻板印象；同时，在与小朋友建立起联系后，社工们希望通过个案介入，让家长们真正了解社工的专长所在。

来源：南方日报

地址：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6/07/content_7196925.htm

[【返回目录】](#)

第五届 SEE·TNC 生态奖：官民合作共创美丽中国

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确定无误的答案。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唯有更多对自然怀有敬畏、对责任负有担当、对环境起而保护、对公益不倦热忱的个体、组织和机构，世界才有更好的可能性。

这也是我们的愿景。自 2005 年 SEE 生态奖（SEE·TNC 生态奖前身）设立以来，我们即致力于奖励参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力量，用我们的选择推动更美好世界的到来。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五届生态奖的评选，我们已不仅仅关注于草根的、民间的环保力量。在本届 SEE·TNC 生态奖的评选中，我们增加了“绿色治理者”这一奖项，该奖专为保护生态、污染防治及探讨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工作的基层政府机构而设置。SEE 基金会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环境作为公共产品，首先的责任人是政府。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奖项传播他们的良好经验，吸引更多的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通过全民给绿，通过政府组织和民间的良性互动，再加上传媒的传播和组织的工作，三方力量互相支持，扭转环境继续恶化的可怕趋势，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丽。”

官民合作无疑是此届生态奖的关键词。无论是“绿色推动者”、“绿色治理者”，还是“评委会特别奖”获得者，积极互动，寻求合作共赢，都是他们从环保工作中得到的有益经验。

荒漠上的绿色治理者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获得了本届生态奖“绿色治理者”奖项。从公元三世纪北魏王朝的第一个建都点到清代仅剩二十户人家的历史变迁，和林格尔完整地展现了一段生态破坏终止人类发展的历程。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水资源短缺，严重限制了地方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修复势在必行。

长期以来，县政府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地开展植树造林。和林格尔县直属机关干部年均义务植树 2 至 3 亩，这个习惯坚持了 30 年。“这里栽一棵树很不容易，要挖七八十厘米的坑，尤其是在一些岩土混合的地方更难，好多人手上都磨出血泡来。”逐渐地，植树成为一种习惯，大家都觉得植树如穿衣吃饭一样是生活的必须。截止 2012 年底，全县有林面积达到了 231 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 44%，森林覆盖率达到 34.3%，城区绿化率达 40%，村庄绿化率达 31%，农田林网和通道、河渠等绿化率均在 80% 以上。

2010 年开始，县政府引入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老牛基金会等社会公益力量，在内蒙古林业厅的指导下，探索更为综合的生态修复措施：利用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区评估的方法识别全县生态修复的关键区域；利用林业碳汇项目加强造林质量和管理力度；通过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尝试更科学的植被修复模式；挖掘修复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评估全县的水资源承载力等等。

从“播报者”到“推动者”

SOHO 中国董事长、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创始会员、微博名人……潘石屹的头衔很多，但他给自己的一个标签是：呼吸者。

最初关注 PM2.5 是源于太太张欣的咳嗽。“只要一回到北京就咳嗽，而且还咳得死去活来。”专家告诉潘石屹，咳嗽和空气质量尤其是 PM2.5 有着密切的关系。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细小颗粒物（PM2.5），会随着空气进入呼吸系统，然后进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起咳嗽、

肺炎、气喘、肺功能下降等呼吸系统疾病。

但在中国，PM2.5 并不是法定必须公布数据。2011 年 11 月 1 日，出于好奇，潘石屹下载了相关软件，开始每天早晨在微博上转发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 PM2.5 数值。

作为微博大 V，潘石屹的微博引发了公众对 PM2.5 的强烈关注。另一位微博名人“巴松狼王”、北京市环保局前副局长杜少中私信潘石屹，要和他谈谈。

杜少中带潘石屹参观了市环保局大门口和研究性监测仪、监测实验大楼、中心监控机房等处，展示了空气颗粒物从采集到测量、分析、统计的全过程。“我认识到，治理大气污染最关键的还是控制污染源，无论是来自工地扬尘还是汽车尾气，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要有所改变。”

2012 年元宵，胡锦涛主席要求北京一定要把治理 PM2.5 作为头等大事。随后，媒体都对治理 PM2.5 进行了重点报道。PM2.5 不再是不可言说的禁区。2 月 29 日，国务院要求各地向社会公布 PM2.5 的数值。当年 5 月，潘石屹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参加治理 PM2.5 的研究小组。

2013 年初，74 个城市启动全面检测和实时播报 PM2.5 数据，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公布，各地纷纷推出了大气污染治理规划。

潘石屹已不满足于“空气质量播报者”的角色。2013 年 1 月 30 日，他发微博呼吁：“治理空气污染需要全民参与，最重要的是立法。我发起了一个投票：呼吁立法《空气清洁法案》，会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将投票结果提交人大和政府。”在网上投票结束之后，他完成了给北京市领导关于出台《北京空气清洁法案》的建议。

在发出第一条 PM2.5 播报微博的一年多后，2013 年世界环境日，由于其在推动 PM2.5 政府公开中做出的出色贡献，潘石屹意外地获得了第五届 SEE·TNC 生态奖评委会特别奖。潘石屹认为，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在促成政府公布 PM2.5 一事中，“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只要呼吸空气的人都成了朋友。”

保卫水安全

邓飞和陶海军，他们是本届生态奖“绿色推动者”奖项的获得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记者，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水。

“我不想让我女儿以后过连地下水安全都没法保证的生活。”媒体人兼公益人邓飞如是说。

2013 年初，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公益媒体人，在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儿童大病医保、让候鸟飞等项目之后，联合基金会、法律界、媒体界、环保界、学界等 13 人组建“中国水安全基金”，包括困境展现、媒体报道、动员民众举报、污水独立检测、协助企业和政府、生态难民净水救助、公益诉讼、企业和环保组织的合作、环保政策推动和改变等版块，有序、依法展开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有效推动中国水安全。

在雅安地震中，邓飞启动了“中国水安全计划”。打电话、调设备、派人员，在灾区实施水安全计划，监控水源、监督政府、改善水源、灾区净水成为了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也会逐步上马。”

邓飞更加希望的是能共同合作，而非对抗。“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建立起一个保护中国水资源的跨界合作平台。揭露水污染、追究责任者，并不是要惩罚企业，相反，我们将竭力要在企业、政府、环保产业界建立起良好联系。环保产业界可以提供人力、技术以及相关设备；排污企业可以引进设备，学习国内外最先进的经验；政府则可以了解企业的需要与现状，修订法律法规，制定更为有效的监管计划。”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以前都是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普通公民根本没办法参与。邓飞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推动国家政策的修订，为整个社会改革参与者树立了一个榜样。”

面对触目惊心的河流污染，你是哀叹还是抱怨？是坐而论道还是起而行之？陶海军选择振臂一呼。2013年2月，陶海军通过微博联众发起《哭泣的母亲河》图片拍摄活动，倡议大家拿起手机相机、记录河流污染，共绘污染地图，“创造历史、从拍张照开始！”

活动收集的照片和反响远超陶海军的预期。企业家、媒体人士、环境专家、律师以及行业意见领袖、艺术家、官员、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几十万普通网民热情关注和支持。通过征图，网友看到广东、广西、云南、河南、湖北等全国各地的河道正在集体“哭泣”。《哭泣的母亲河 07—景区小河，伤不起！》展现了贵州省从江县高增河与小黄河遍布垃圾的情况。次日，从江县委县政府即宣布彻底整治污染，目前，小黄河垃圾已被清理干净。当地正在探索建立“村民+民间组织+政府”的联合治污监督机制。《哭泣的母亲河 21》发布山东临邑县临盘镇河流污染信息，《哭泣的母亲河 22—金水河，金色水》揭露郑州金水河遭遇工业废水直排污染情况，当地政府或执法部门都迅即表示要严查排污企业。

陶海军这样介绍自己关于“保卫母亲河”的设想：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反映现状的“哭泣的母亲河”；第二阶段是“母亲河，别哭”，主要是公益救助、法律咨询与诉讼等内容；第三阶段是公益行动要达到目标的最后阶段——“母亲河，笑了”。

环境保护，需要更大范围推动政策改革

解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原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第五届 SEE·TNC 生态奖绿色推动者奖项获得者。2012年，热爱野外、从事多年野生生物保护的她“回归红尘”，专职推动国家制定一部全面综合的《自然保护地法》。她如是总结自己两年来的工作：“中国的生态到了不得不保护的時刻，而我们的目的正是捍卫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

在解焱的带领下，WCS 在珙县工作十年，协助当地进行东北虎保护。但她知道，单靠环保组织

的工作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环保状况。“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没有理顺，即使 WCS 能力再强，把某个保护区的工作做好了，但全国其他上千家保护区怎么办？中国需要有人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政策的改革。”

2012 年 4 月，她带领近百位从事科研和保护的专家，志愿成立了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提出了制定一部全面综合的《自然保护地法》的建议，包括建立起合理的分类分区体系，科学规划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起有效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的监督机制，保障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费，确保社区参与保护并从中持续受益等建议。随后数月，工作虽然推进艰难，但一直陆陆续续往前走。先后有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贵州大学、厦门大学、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及多个国际保护组织等近百位生态、法律、政策研究、管理和社会建设等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目标直指保护地立法。

她通过宣传、研讨、上层交流、给国家提案等多种方法推动立法。这是民间力量推动国家立法的重要案例。在她的努力下，关于制定《自然保护地法》的建议最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立了 6 个议案、2 个建议；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接受了三个相关提案，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与自然、动物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获奖者的故事无法一一细述，他们都将和第五届 SEE·TNC 生态奖一起，为中国环保事业刻下一座里程碑，这也意味着，新的旅程正在开启。我们期待，生态奖的光芒能照亮更多走向环保道路的人士与组织。让我们一起，全民给绿，美丽中国！

来源：和讯网

地址：<http://gongyi.hexun.com/2013-06-06/154909307.html>

[【返回目录】](#)

回龙观拼车进城 公益组织买单高速费

民间“顺风车”公益行动终获政府支持，本月中旬，早高峰时段车载 3 人或 3 人以上走八达岭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清河主站的私家车，可免缴高速公路费。

高速费将由顺风车公益基金代付

昨天是“顺风车日”。民间坚持 10 余年的“顺风车”行动也在昨日取得重大进展。在团市委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顺风车发起人之一、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永宣布，从 6 月 17 日至 7 月

16 日，每天早高峰时段的 7 时至 9 时，从回龙观、西三旗入口驶入的，载有 3 人及 3 人以上，且贴有顺风车车贴，从上清出口、清河主站出口进京的私家车，均将由顺风车公益基金代为支付高速通行费用。

试点期间，志愿者还会在八达岭高速上述路段的收费处等候。只要私家车内载有 3 人或 3 人以上，无论是搭载自己家人、朋友还是公益拼车，都可以获得一张免费通行券，免缴高速费。

试点有效将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回龙观是亚洲最大的居民社区，王永介绍，据前期调查，每天早上 7 至 9 时，有 3000 多辆机动车走八达岭高速进城。但在早高峰时段，80% 以上的私家车里，只有司机一个人。“希望通过免高速费这个政策，鼓励 20% 的私家车主拼车上班，两个私家车主拼一辆车去上班，就能减少同一时段 10% 的机动车出行。”王永称，如果通过 1 个月的试点监测，确实减少了道路拥堵和机动车尾气排放，“顺风车”行动有望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此前，王永曾多次呼吁政府出台有关优惠政策，如对满载的顺风车免收高速通行费、优先使用公交车道、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等优惠政策。

虽然上述呼吁尚未实现，但王永认为，即将开展的顺风车免高速费试点，有望成为民间组织通过试点来探索和推动政府出台公共政策的先例。

提示

注册拼车人可自动匹配

顺风车公益基金管委会介绍，私家车主可通过实名注册加入顺风车行动获得顺风车贴。王永介绍，市民可通过下载“公益顺风车”APP 或登录顺风车网站进行注册和信息登记，就能够由系统自动生成供求匹配。匹配完成后，爱心车主和搭车者均能收到对方的信息，通过电话确认。“顺风车”启程时，顺风车公益基金还会为车主和搭车者自动购买一份有效期为一年的意外保险。

来源：新京报

地址：<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06/07/267425.html>

[【返回目录】](#)

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候选名单公示

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公益时报社、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推选活动于 2013 年 3 月启动,通过各省区市妇联、中央驻香港及澳门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国内大型基金会、企业、解放军及武警部队以及有关媒体共 72 家单位推选,共收到 85 个“女性公益人物”推荐名单、38 个“女性公益品牌项目”推选名单、36 个“关爱女性企业”推选名单、46 个“支持女性慈善传播典范”推选名单。

经主办单位初审和专家委员会终审,确定了“十大女性公益人物”、“十大女性公益品牌项目”、“十大关爱女性企业”和“十大支持女性慈善传播典范”候选名单。

现将第二届“中华女性公益慈善典范”候选名单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一周。

“十大女性公益人物”候选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

- | | |
|------|--|
| 王少华 | 香港大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 方黄吉雯 | “健康快车”创会主席、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 |
| 许淑清 |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
| 米合伦沙 | 空军 93980 部队 41 分队中队长 |
| 李 静 | 东方风行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乐蜂网及静佳 JPlus 品牌化妆品创始人 |
| 吕顺芳 | 江苏无锡市农民 |
| 李旻果 | 著名环保工作者、天籽生物多样性保护创始人 |
| 陈美仪 |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顾问、澳门善明会大会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直选议员 |
| 邰祥梅 | 百事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副总裁 |
| 徐书真 | 武警西藏总队医院特诊科主任、主任医师 |

“十大女性公益品牌项目”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 母亲邮包项目
- 慈善医疗和援助项目
- 支持妇女计划项目
- 桃源居社区妇女教育项目
- 恒天然乡村母婴健康项目
- 母亲微笑行动
- “巾帼圆梦”万名女性创业助学计划

南京爱心妈妈群

爱至伊·流产后关爱(PAC)公益项目

爱心一元捐项目

“十大关爱女性企业”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纪惠集团(香港)

江苏亚萍集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铝业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

“十大支持女性慈善传播典范”候选名单

中国记协国内部

人民日报摄影部

新华社摄影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妇女报采访组

当代中国画报社

新京报时政新闻部

澳门日报

新浪微公益

腾讯公益

来源：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地址：http://www.cwdf.org.cn/other_view_info.asp?id=198&otherid=110

[【返回目录】](#)

彩蝶计划发布《中国儿童领域民间公益图谱》2013 版

《中国儿童领域民间公益图谱》(以下简称图谱)是由彩蝶计划研制推出的一款供公众、儿童领域民间公益机构、企业/基金会、有志于儿童领域的公益创业者使用的参考性指南。

整个图谱透过儿童视角,梳理出了儿童从出生到 18 岁各个成长阶段不同层次的需求以及每种需求所关联的公益节点,同时使用红蓝绿白四种颜色标识每个公益节点当前的资源获取情况,以深蓝来标识上个公益节点的可参考案例。

图谱虽然包含了大量的信息,但是链条化的组织方式使其一目了然,就是希望能尽可能全面和系统的将国内儿童领域民间公益的现状和希求达到的格局勾勒出来。

图谱首次制作完成于 2011 年 12 月,并在新浪微博及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广州年会上发布。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反响,2012 年 6 月,综合诸多朋友的意见,对图谱进行了二十多处的补充,形成第二版。2013 年 6 月,又进行了多达 32 处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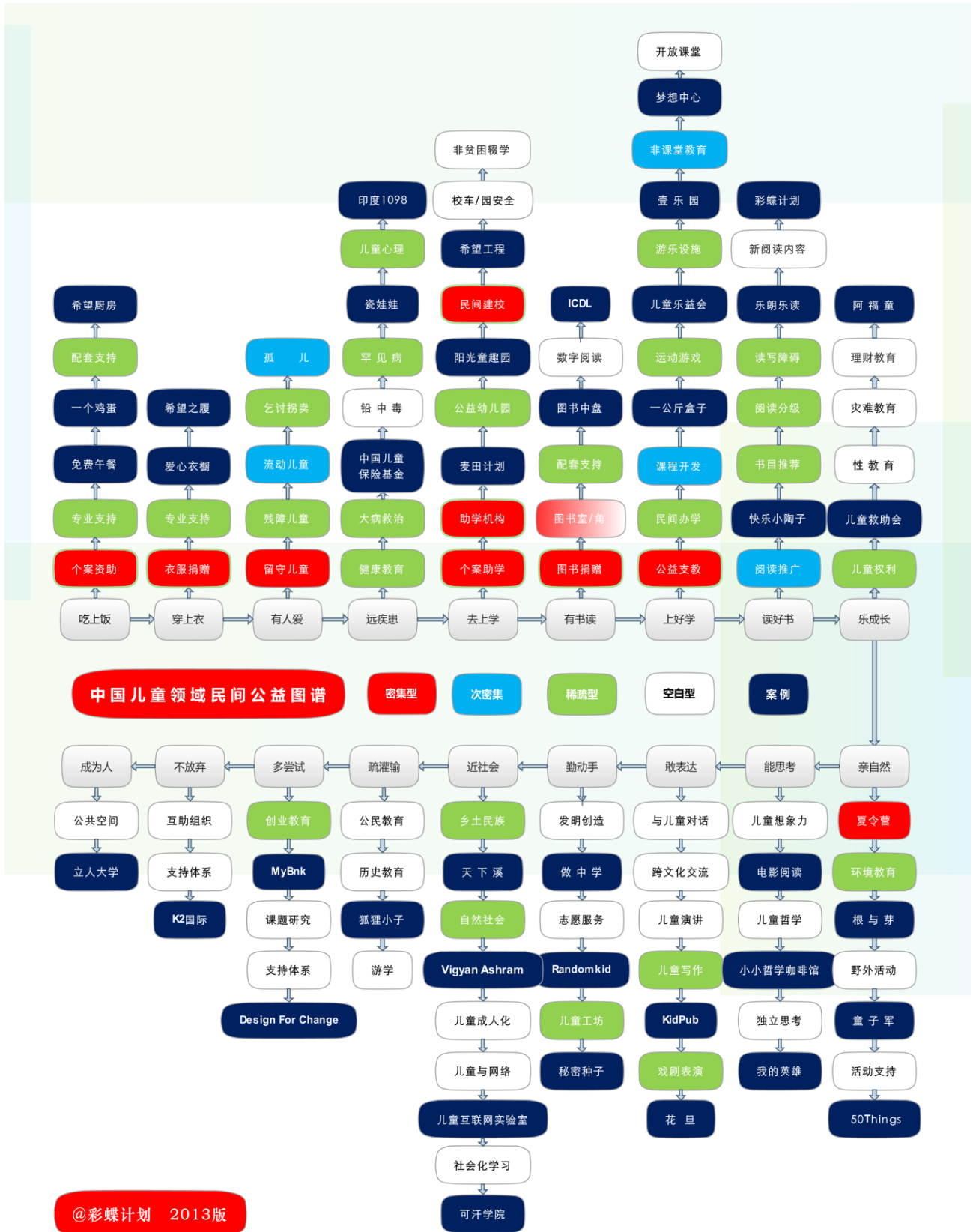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阅读图谱,特做以下简要解读。

制作背景

根本来说,图谱的设计是要解决儿童领域民间公益项目的“碎片化”以及资源获取不足两大问题。这也是彩蝶计划一路走来亲身的感受。

虽然当前全国有成百上千家关注儿童的公益组织,但细细梳理就会发现很大一部分聚集在相同的节点上,让该节点耀眼,为社会所关注。也有一些机构在其他节点开展工作,但基本是各自为战,发展艰难。这就是公益项目的“碎片化”,导致的后果是机构/项目之间较难合作(关联点不多或者项目之间有断了的节点)、项目长远成效难以评估、不易找到机构定位造成大量公益资源重复投入……

另一方面,不管是捐赠方(机构或者个人)只能看到耀眼的节点,不能看到儿童成长过程需求的丰富性,捐赠行为本身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性,这造成资源过度集中,而少被人关注的节点的项目很难获得支持。



来源：彩蝶计划

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684914253>

[【返回目录】](#)

◎公益人

曲栋：释放生命的创造力

导读：如果不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讲和，不与自己的理想讲和，一个人不可能找寻到心灵的宁静。

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自我

如果说有个“美国梦”的话，中国的年轻人会有近似的“北京梦”或者“上海梦”。对来自偏远的黑龙江小城的曲栋来说，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一个上海梦。

由于足够聪明又足够努力，曲栋一直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一路过关斩将考进复旦大学法律系，1995年毕业后留在上海，在待遇丰厚的外资房地产企业工作。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有户口、有家庭、有孩子、有房子，一个两手空空的年轻人从助理开始一路做到法律部经理，不断面对挑战，成为领导、成为主管，曲栋坦言自己曾经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但那种新鲜感和面对挑战的成就感并没有维持太久，足够聪明又足够努力的他很快得到了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期待中的成功，但也早早触到了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和人事斗争，说到底，自己只是巨大商业机器里的一个小小齿轮，在这个巨大机器的运转规律面前，内心深处被称之为“理想”的东西显得又可笑又无力。当一切轻车熟路之后，工作和生活都进入了一种循环，“混成中产阶级”又当如何？人生就是上上班、打打牌、吃吃饭，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成功”、就是人们追求的“上海梦”的话，曲栋觉得这样的梦想很没劲。一想到自己漫长的未来都将这样度过，在如许不真实的生活里，任凭自己的心在这错乱不堪的世界里变得麻木，空有一身才华、无穷的创造力无从挥洒，曲栋就觉得绝望：“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苦闷归苦闷，不甘归不甘，以曲栋的聪明不是看不透，不管曾经如何豪情万丈心比天高，数不胜数的年轻人都将一样，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在安逸的生活里被打磨成棱角全无的中年鹅卵石。

2000年9月，曲栋与几位复旦法律系师兄弟一起成立了一个为面临拆迁的社区百姓做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的公益组织“热爱家园”。这个事情的起缘偶然又偶然，由于一个看似偶然的契机，曲栋与几位复旦法律系的师兄弟碰到一起，然后，由于更加偶然的一个机缘，他们开始合计做点儿什么。当然，这帮学法律的人知道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在当时的中国，公益组织是个新鲜事儿，特别是在上海，更没有听说过 NGO 这个词。让人苦闷的是不像自己想象的一样能够得到社区居民热烈的响应，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阻力。有一次，同伴老刘辑录《拆迁法律汇编》要去社区散发，有人担心惹事劝他不要去，最后都把老刘劝毛了：“不管你们去不去我自己反正是要去！”第二天，老刘进到社区发材料的时候，曲栋不远不近跟在后面，老刘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到后来才发现

我一直悄悄在他身后，感动得不得了！”每回说到这件事，曲栋笑得像个孩子。

“热爱家园”激发出了曲栋人生里被压抑的创造力，他为此投入了自己所有可能的时间，搞网站、做活动、回母校联系大学生志愿者，甚至一次又一次专门跑到北京“寻亲访友”——看看人家首都的 NGO 里都是些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他通过别人做的和自己体会到的，看到一种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其中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可能性，虽然不可能决定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切切实实是在“为历史的发展创造着各种可能性”。以这种有些尴尬的身份从事民间公益事业并不轻松，但是，在面对那些所有的问题和阻力、接触到这个世界是更多真实的痛苦的同时，反而觉得自己的心变得更柔软、敏感了，觉得活着是有意思、有意义的，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里有是爱的。

一年、两年、三年，曲栋能够体会到自己心里那份被偶然点燃的热情并没有消退，相反，有一种力量正在慢慢长大，曲栋三十岁了，他确信这是自己人生想要的东西。想清楚之后，他要在这个东西和现实生活之间做一个选择，辞掉了外企的工作，做过一番斟酌后放弃自己开所，而选择加入别人的律师事务所。在当时的上海，全职从事 NGO 的工作无法养家，加入律所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自由度，把自己大半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到这件不赚钱只赚辛苦的事情上。

如果说曲栋加入“热爱家园”事出偶然，但此后所作所为则是他个性与特质的必然。后来由于更加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视察并指示之后，“热爱家园”名正言顺得以注册，也使得他们有机会体味现行管理体制下，有了社团身份之后的利与弊。后来，曲栋和几位朋友一起以企业形式注册了“绿根力量”，明确地把推动公民社会组织的成长作为机构目标，专门关注 NGO 能力建设，为民间志愿者组织提供评估、培训、咨询和网络建设。

逼仄的空间氛围、机构发展和日常工作遇到的问题都没有真正困扰曲栋，如果说这段时间里有什么纠结的话，就是自己在内心愿望和现实生活之间的摇摆。“热爱家园”最初的成员都是复旦学法律的师兄弟，情况很接近，大家都需要在“现实生活”和“公益事业”之间找寻平衡，每个人都要尝试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活法。看上去曲栋平衡得很不错，两边做得都很成功，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纠扯如何煎熬。做 NGO 能够满足愿望，但做律师收入高，几年来一直处在这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切换之中。虽然他已经得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开始有意推掉律所的事情，但这种纠结、和纠结带来的痛苦一直都在，直到 2008 年春天。

2008 年春，律所同仁去风景优美的三清山。每年律所会选风景优美的地方做团队建设，为大家充电。同仁们用这段时间在山水之间放松自己，然后重回十丈红尘继续“战斗”。而这一次，曲栋把自己完整地交给了心中的那些纠扯，空对满眼美景，把自己坐成了一个“思想者”。他面前摆了两样东西，一样是 NGO 的事业，是理想，或者称之为生活的意义；一样是律所的工作，赚钱，享有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些年来，让他身心俱已疲惫不堪的是一直想两者兼顾，如果必须做一个选择，必

须放弃一样的话，放弃哪个？放弃律所的工作吧？赚到的钱要比现在少很多，曲栋觉得有点儿不舒服，那就放弃 NGO 的事情吧。

从最初接触公益组织到现在马上就是十年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包括这些年来承受那些纠结就是为了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如今，当逼迫自己做出一个唯一选择的时候，没有想到会让自己面临这样的境地。曲栋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一想到这一节，心里居然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放弃 NGO 生活就失去了意义，做律师赚钱究竟是为了什么？甚至，我还活着干什么？”曲栋决定把所有选择的烦恼都留在三清山，不再继续纠缠这个问题：全职去做 NGO，过一种内心愿望与现实存在高度统一的生活。

在众多的邀请中，曲栋选择了 ICS，负责机构日常事务和公民教育及 NGO 发展工作，即使是在 NGO 这个行当里，也不是待遇条件最好的，但这里做的事情和做事情的方式能够最贴近自己的愿望：“我的生命存在就是为了和更多的青年人一起，通过更多的公益服务，一起实现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现实世界里陪伴理想

如果不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讲和，不与自己的理想讲和，一个人不可能找寻到心灵的宁静。看上去是在两种并不严格互斥的可能性中做出的取舍，其实，对于曲栋这样的人来说，是别无选择，他只是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灵宁静的活法，不如此，就会觉得生活不爽、不舒服、不完整。在 ICS 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许更多更琐碎，但曲栋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心很安静，在繁忙的工作节奏里过上了平静生活。“尽管我的工作中、生活中还有着非常多的困难与艰苦，但我的脚可以踏踏实实地走在土地上，我的心可以平等、真诚地和身边的人交流，我的生活可以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不管是在绿根还是 ICS，曲栋的工作主要是对 NGO 提供支持，接触各式各样的年轻人，与他们一起面对如自己当年一样的无穷无尽的困惑。同样的青春年华，同样的理想与现实的纠扯，与自己当年不一样的，已经进入到 NGO 里的年轻人更多提到的是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曲栋被称为“老曲”已经很多年了，面对年轻人的困惑，“老曲”常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没有困难”、“这些生活的困难是 NGO 的工作带来的吗”？

其实，就算是“老曲”，也在面对接近的问题。来到广州工作要先找地方住，他掂量自己眼下的收入，在中介提供的单子里选了两个月租一千多块的小单元。年久的老楼房、黑乎乎的楼道、窄小的房间和脏污的墙壁，曲栋脱口问人家：“这能住吗？”在看第二家之前，他先让自己想想清楚，如果顶不住这些现实的压力，就只能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于是说服自己换一种眼光，接受老旧的小窗户，接受水压不够无法使用的热水器。“老曲”会跟年轻人坦然分享自己当时的感受，要先想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人生选择，想清楚哪些是我们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只有这样

的接受，才能让我们去面对而不逃避，让我们将我们的专注回归到自己该如何去回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面对生活的困难时，更多地在抱怨，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无力和焦虑之中。而这样的人是无法有积极的行动的，也没有耐心和平静去思考，当然也无法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两年之后，曲栋说服家人，举家迁来广州。提到自己全职从事 NGO 工作的感觉，曲栋一再用到了“幸福”这个词，真正过上理想与现实高度一致的生活，每天心里想的，全都是工作的事情，用上了所有的聪明才智，焕发了人生的创造力，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智都放在 ICS 的运行、转型与提升。

当初“绿根力量”做得最有名的事情就是 NGO 能力建设，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满足“热爱家园”自己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大家都有接近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推动社会进步，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体会到能力不足，迫切需要学习。怎么办？学习嘛，通常的办法是找老师来教，还有一种是同伴之间彼此学习共同成长。在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下，NGO 是个新鲜事物，根本没有现成的老师和培训课程，他们选择了后者，一群“最先吃螃蟹的人”扎堆取暖、互相学习。大家一起交流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学习交流项目管理经验，而且，会在更长一段时间里（三年或者更久）关注同伴的个人成长。作为主办方，曲栋对此的理解是，通过这样的项目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大家有机会彼此倾听，有共同学习，有彼此的支持也有价值观的影响，是人人互动以及个人自我内在的发现。他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觉得最为受益的人其实是自己，与在这里结识的许多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如今曲栋接触 NGO 已经十多年了，从青年到中年，经历了个人的困惑迷惘尝试摸索，也见证了 NGO 快速发展的过程，从当初“热爱家园”在上海“一百亩地一棵苗”到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涌现出来。2008 年 5·12 地震后公益组织的抢眼表现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十多年来飞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公益理念广泛传播、影响公众的契机，带动了民间资金的涌入以及政策的宽松，曲栋南下广州适逢广东着力推动民间公益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建设，ICS 多年前就是“绿根力量”的合作伙伴，更多面对的是更富公民社会特质的 80、90 一代人，他们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追求自己的理想、更富创新精神且勇于实践，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对曲栋个人来说，在这个时候迎来人生的又一次转变适逢其时，因为他自己也在经历内心的蜕变，度过了个人成长的瓶颈期。作为一个带团队的人，首先要面对自己和团队的关系与问题，他有很美好的理想，思考很多问题，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与人辩论，总觉得自己有道理，以他的聪明敏捷、雄辩和能力，这样的曲栋是强势的，给人压力，团队氛围就会有问题。曲栋还必须面对与“自我”的关系，一方面有清晰的目标和极强的行动力，另一方面也有自己天性中悲观与消极，看起来充满力量，但是内在动力不足。在朋友的支持下，曲栋参加了一些商业心灵成长课程，自己受益之余也将这类培训中的内心探索引入“绿根力量”的课程，注重个人积极心态的建设和内在力量的寻找，

不仅用脑袋思考，也用心来感受。曲栋坦言，如果自己不曾经历这样的个人成长，很难具备足够的能力推动 ICS 的提升。这种内心成长对人的影响，会延伸到个人对机构发展的推动，而机构的发展又会影响到公民社会的发育。当然不能仅仅理解为“只要曲栋成长了一切就会变好”，但显然需要无数个“曲栋们”的成长，NGO 的领导人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往往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就是在开创一个新的领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需要在“不可能”里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需要这个人内心强大、有开放的心态、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不断尝试，才有可能寻找到改变的可能性。曲栋希望通过 ICS 的工作，与大家一起分享生命中的思考与收获，共同经历这样的成长。

随着 NGO 组织大量出现，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专门从事 NGO 组织能力建设，从最初的培训班发展到包括顾问咨询、交流访问、孵化器、领导力训练等多种形式，ICS 怎么做？

最早 ICS 做的培训与“绿根力量”很接近，是针对起步阶段 NGO 领导人进行的能力建设，曲栋到来后改为支持不同省份的公益支持机构做类似工作，并重新定位了 ICS 的“公益领导力协力营项目”，致力于那些扎根社区的资深民间公益组织领导人的领导力提升，为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人（具有 5 年以上民间公益组织领导人经验、长期开展社群或者社区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领导人）提供高端支持。他们已经坚定了投身公益领域的人生选择，并且具有长期的基层行动和服务的经验与能力，未来 10 年后他们将成长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成长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无论何种形式的能力建设，根本都是支持人的成长。这样的成长应该是思想、行动力、内心力量等全方位的提升，是一个在团队中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曲栋在自己在过去的十几年经历的基础上，设身处地考虑民间公益组织的年青领导人成长的需求，致力于支持他们成长为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和中国公益领域的中坚力量。这样的过程，不仅是释放和发挥这些人、这些机构的生命力、创造的力过程，也是释放和发挥我们身处的时代的生命力、创造力的过程。

来源：腾讯网

地址：http://book.qq.com/a/20130328/000003_1.htm

[【返回目录】](#)

◎亮机构

爱报道工作室：小学毕业的农民创立的公民记者团队

摘要：当一个有着一张大嘴，一脸笑容，一腔东北味儿的人站在你面前说：“您好！我叫王发财，是民间通讯社爱报道工作室的一名公民记者，您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吗？”你会是什么反应呢？

当一个有着一张大嘴，一脸笑容，一腔东北味儿的人站在你面前说：“您好！我叫王发财，是民间通讯社爱报道工作室的一名公民记者，您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吗？”你会是什么反应呢？

十年前，没人知道王发财是谁，更没人知道爱报道工作室是什么。但如今，王发财已经成为了业内的王老师，爱报道工作室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小学学历的农民创立首家公民记者团队

王发财既不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也不是大媒体的从业者。最初的他只是一个农民，一个草根。“我只有小学学历，初中稀稀拉拉上过两年，童年时代，除了长白山区巴掌大的一块天，我没有领略过更精彩的世界。”王发财说。

人穷志不穷，渴望知识的他业余时间都去白山市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影响了他，这位管理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隔三差五就能收到几百块的稿费。钱虽不多，但对手头拮据的王发财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王发财认识了中国青年报吉林站站长，跟着这位站长去做了两回采访后，王发财学会了些许技巧，并开始远离村庄去采访一些陌生的人，探寻不寻常的事。这种新鲜感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在信息闭塞的山村，通过采访探寻未知的事物，在他看来就是精神上的一种礼遇。

从此，王发财就在新闻报道这条道路上一直行走，并开始创办中国首家公民记者团队——爱报道工作室。

2008年初创时，工作室叫京都报道工作室，主要报道一些传奇人物故事。后来王发财改变了想法，尝试报道社会中的普通人，报道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社会群体，替他们发声，传递价值观。于是京都工作室解散。

2012年，王发财与妻子欧阳洁共同创立爱报道工作室。“爱报道，喜欢报道。不为钱，人人都是报道者。”这就是爱报道工作室创立的初衷。

确保报道内容质量的同时发展渠道

不到1年的时间里，爱报道工作室的成员已经有五六十人，除王发财一人是全职员工外，一半成员是兼职工作人员，另一半是志愿者。这些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记者，有律师，还有学生。

最初的爱报道工作室一无所有，采访精英名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了采访一个明星，王发财需要打数百次的电话，没有当事人的电话号码时，王发财不惜跑遍大半个北京，到对方的工作地点等候。没有记者证，就全靠真诚打动对方。慢慢地，王发财有机会采访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并且与他们成为朋友。

爱报道工作室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但他们的报道已经遍布全国各地。自成立至今，爱报道工作室已经和国内 300 多家媒体合作过，长期保持合作的媒体就有 30 多家，一篇稿件最多传播过 50 多家媒体。

爱报道工作室的稿件坚持以内容为王，保持每月十多篇的供稿量。为了保证稿子的质量，每篇稿子王发财都要亲自把关。

爱报道工作室对每一条新闻线索都要进行多次核实，确保稿件的真实可靠。然后派出采访成员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尽量减少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采访。所有稿件在写作前，团队成员会从角度的选定、文风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稿件发出前都有专人负责修改和校对。

而在信息发达的如今，渠道又成为了各家媒体争夺的另一法宝。爱报道工作室也紧跟时代的潮流，开设爱报道官方网站，开通官方微博@爱报道工作室，将来还讲打造微信群及爱报道电子期刊。

未来做专业新闻报道机构

在中国，自由撰稿人很多，公民记者也不少见，但像爱报道工作室这样的集体机构全国只此一家。面对未来，王发财说：“我想做专业机构，并不想做成公益机构。”

王发财说，爱报道工作室未来可能会往几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可能会成为各大媒体在北京的采编中心，另一个是爱报道工作室自身创办杂志或报纸，又或者汇集采访资源，帮助同行，再或者考虑培养年轻人的独立新闻意识，对新闻事业发展做贡献。

在爱报道工作室，王发财可谓是整个组织的核心。掌握着组织运作的大权。稿费由他发，资源也由他提供，各项事宜几乎都是他在全权处理。

当被问及：“如果自己不干了，这个组织会跨么？”

王发财从容地说：“我觉得垮不垮不是问题，它的思想会延续就好。一起共事过的人，价值观还在，只要生命在延续，价值观就在传递。”

来源：南都网

地址：<http://ndgongyi.oeeee.com/html/201306/04/68588.html>

[【返回目录】](#)

EXiDEA: 希望大学生都能做公益

组织简介

EXiDEA 志愿者团队

EXiDEA 由英语单词“exchange”和“idea”缩写而来，其意是希望在校大学生参加公益，交流思想。

EXiDEA 是由大学生自主创建和管理的志愿者组织，以“支持大学生关注并独立思考社区问题，进而服务于云南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为使命，以“致力于以青年学生推动志愿服务在中国的普及化”为愿景，让大学生以实际行动实现自我，用专业知识回馈社会。

Everyone Can Be a Volunteer（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这是 EXiDEA 的宣言。

EXiDEA 前身是 Discussion Group（英语讨论组），2007 年 9 月正式成立 EXiDEA 志愿者团队昆明办公室。EXiDEA 为各大高校的学生提供一个了解国际意义志愿者的机会，一个与世界 NGO 相互合作的机会，也给社会人群一个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机会；它为各大 NGO 提供一个志愿者人群；它为想要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群创造机会，并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服务工作中来，让志愿者精神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茭菱路创意英国的一个屋顶花园，就是 EXiDEA 办公室所在地，这个自 2007 年成立的志愿者团队截至目前累计支持了 800 多人加入到志愿服务中，在公益行动的过程中，机构负责人胡琳艳则希望，EXiDEA 不是中介机构，而是希望能深入影响志愿者，专注志愿者管理，与其他 NGO 共享资源，各自发挥所长。

用英语思考和讨论的平台

有时，一个想法的诞生往往源于思想的碰撞。EXiDEA 的创始人是一位昆明理工大学的学生，他在翠湖的英语角遇到来自美国的 Susan Straight，Susan Straight 在美国从事多年青年人成长公益行动，当 Susan Straight 提及 NGO 这一对年轻学生来说相当新鲜的概念时，“那位昆工的学长对 Susan 做的事情很感兴趣，就讨论其用这一理念来做一些事情”，胡琳艳说，2005 年 Discussion Group（英语讨论组）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

英语讨论组为热爱英语的同学提供一个用英语思考和讨论实事、生活的平台，“它鼓励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爱生活，并用自己的视角独立思考社会问题，分享人生态度”，胡琳艳介绍。让英语口语更上层楼的同时也让思维方式更加活跃，“我们在英语讨论组的每次活动中都会穿插一些志愿精神的宣传及志愿者行动的倡导工作，所以 Discussion Group 也是 EXiDEA 精英志愿者的聚集地”。至今，英语讨论组仍在云南大学呈贡校区、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和云南财经大学继续。

2007年,随着组织活动范畴的不断扩展,正式更名为EXiDEA。EXiDEA由英语单词“exchange”和“idea”缩写而来,其意是在希望在校大学生参加公益,交流思想,这也是Discussion Group成立的初衷。

与国际成熟 NGO 合作

运作初期,EXiDEA与国际上成熟的NGO合作,以此带动自身的快速成长。

2006年7月至2007年8月,EXiDEA与中华仁人家园一起开展活动。仁人家园是一个非牟利房屋事工组织。仁人家园由Millard Fuller于1976年在美国创立,致力消除世上的贫乏居住环境及无家可归的情况,并积极以行动及提高意识达到提供适当住屋的目标。通过义务工作,以及获得商业机构在金钱和物资的捐献。EXiDEA与中华仁人家园合作先后组织了四批志愿者分别赴云南省嵩明县达达村和武定县干海子村帮助村民建房屋,参与志愿者共计78人次。其中第三批的时候还有10名外国志愿者参与。

对于长期生活在校园的大学生来说,建房活动中不仅体验生活丰富阅历,更吸引他们的还是在多样化的实际环境下学习英文。因为有仁人家园为EXiDEA提供后勤保障,项目开展顺利。

2008年下半年,由于项目资金不到位,为村民建房屋的计划落空。但志愿者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为了不打消志愿者的热情,EXiDEA下决心自己独立组织活动。也在与NGO合作的过程中,EXiDEA也认识到了自身的长处,熟悉了NGO的实践过程,独立运作也成为可能。后经多方的考察和与志愿者们的沟通,他们选定了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的上打马坎村。

上打马坎村此前仅有的一个公用厕所是露天的,“蹲位只有4个,厕所里长满青苔,还常出现排队上厕所的情况”,胡琳艳说,针对该村公共卫生条件差的现状,EXiDEA与村民协商搭建公共厕所。由于之前没有足够的经历,EXiDEA这次建厕所的难度是意料之中的。志愿者的食宿问题、安全问题以及厕所的质量问题对他们都是很大的挑战。

一边请教,一边学习,他们白天在工作的时候与志愿者们交流心得体会,晚上与村民们沟通看看哪些方面可以改善的,直到2008年9月,最终在村里建起了两个简易公共厕所。这是EXiDEA开展的农村发展项目,此外他们还在玉溪、墨江等地的村寨建蓄水池,解决饮水问题,修建篮球场,开展传统文化保护等活动。

城市社区的需求也有回应

农村需求得到回应,城市社区也进入了他们的关注视野。昆明市文林街天君殿巷小区,是EXiDEA以前的办公室所在地,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居民回迁社区。陈旧的楼房,贴满了小广告的楼道,灰暗的墙壁。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在EXiDEA看来是一个十分有必要回应的社会需求,自然地萌生了一个“让社区亮起来”活动计划。

胡琳艳介绍, Light Community “让社区亮起来”, 是以社区服务为主展开的由 EXiDEA 独立开发的公益项目。“我们服务的社区主要是城市里以老年人及外来务工人员为主要户主的陈旧社区, 或回迁社区。我们为他们重新粉刷楼层内或社区内不洁净的墙面, 清洁社区棋牌凉亭等”。

天君殿巷小区一共有 22 幢, 每幢 4 个单元, 由于年久, 灰尘落得厚厚一层, 在粉刷墙壁前, 志愿者先把楼道里的灰尘清扫干净, 再往墙上涂上腻子粉, 最后再把刷墙留下来的垃圾清理掉, 整个楼道逐渐焕然一新。由于志愿者只能在周末等空余时间来, 这项工作在 2008 年开始, 持续了整整一年才完成。目前, “让社区亮起来”正在安宁的阳光社区开展。

城市流动人口子女志愿教育服务也是 EXiDEA 关注的焦点, 项目结合志愿者的所学所长、兴趣爱好, 为孩子们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课程。项目每年活动两期: 3 至 6 月活动、9 至 12 月活动。目前项目在安宁市洛阳池社区开展。自 2009 年 7 月起实施, 该项目已完成四期志愿者服务工作。

与 7 家公益机构合作运作农夫市集

经过多年的运作, EXiDEA 目前仅有胡琳艳一名全职工作人员, 也依然面临一些“生存考验”, 如资金来源的问题。

在去年开始运作采耘农夫市集则是 EXiDEA 与 7 家公益机构合作开展, 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三次, 每次交易额万元左右。这是 NGO 为本地农户提供的农夫市集, 农夫市集作为新兴的保障消费者健康和农民利益的农田与餐桌对接的食品购买模式, 让从事生态农业的农户能够和消费者直接沟通、交流, 既能帮助消费者找到安全、放心的产品, 也帮助农户拓宽市场渠道, 鼓励更多农户从事生态农业, 从而减少化肥和农药带来的环境污染, 维护食品安全, 实践公平贸易。

前三次集市均得到了“社区伙伴”的资金支持, 目前暂停举办, 这些公益机构提交了计划书, 正申请新的资金来源的支持。

“我们面临资金支持不稳定的问题”, 除了 Susan Straight 每年约 5 万元的资金支持外, EXiDEA 更希望能通过自身获得更多元化的资金来源。目前通过基金会筹款均是依托项目, “如果一个项目可以通过基金会筹到款, 这个项目必须深入, 这就意味着人员投入更多”, 胡琳艳说, 她希望项目设计面广, 但同时希望项目能够层层深入, 这对机构和志愿者来说都是好事, “不希望志愿者只是浅显地参与公益活动”。这对 EXiDEA 来说, 则是一个矛盾所在, 因为无论从人力、资金来说, 均是不足的, “希望能有基金会认同我们来做青年人成长教育的理念来支持我们, 而不是从项目出发”。

机构负责人胡琳艳在大二加入 EXiDEA, 毕业后成为全职工作人员, “我们不希望做中介机构, 就是把志愿者介绍到需要的 NGO, 我们更希望的是对志愿者有所管理, 可以从不同层面深入影响他们。”

志愿者的实践活动需要有项目为依托, 在 EXiDEA 以往的工作中, 曾与不同的 NGO 合作, 为

他们的项目提供志愿者，而且学生关注面不同，EXiDEA 希望给志愿者提供多元化的领域和项目，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 EXiDEA 人力有限，如果完全靠自身运作，一方面对项目深入发展不能保证，在项目数量上也有局限，人数少，无法扩展更多项目。“我们希望与其他机构合作，伙伴方专注项目，我们专注于志愿者管理，各自发挥所长，共享资源。”

来源：云南信息报

地址：http://news.ynxxb.com/content/2013-6/4/N10796742237_3.aspx

[【返回目录】](#)

◎国际观察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十周年庆特刊（五）：2025 年的非营利组织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加速了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步伐。现在 10 年所经历的变化，远远超出过去几十年。本文分析了驱动非营利部门变化的 4 个动力，并预计 2025 年，非营利组织可能出现 4 种场景：新公共管理场景、公民场景、问责场景、创新场景。但作者也预计，几乎没有一种场景，可以独占鳌头。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吧。

同所有组织和机构一样，非营利组织也深受政治框架、政策及规划的影响。因此，如果想知道在未来，比如 2025 年的非营利组织什么样，我们就必须回顾往昔与当前趋势。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体见证了非营利组织作为健康、社会、教育和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在经济意义上的普遍加强。同时，通常以公民社会、民主建设和政治参与为背景，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和政治角色也被反复地强调。事实上，许多国家正发生着这些新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驱动力来源于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成为有“混合福利经济”之称的新公共管理（NPM）方法的一部分，这些方法高度依赖“准市场”和竞争性招标流程。有关这种发展的例子包括：卫生与社会服务提供中服务外包制的扩大，各种各样“以券代补贴”的项目以及政企合作。本质而言，在社会服务的提供上，这种政策选择将非营利组织视为比政府公共机构更高效，同时比监管成本高、且可能牟取暴利的盈利性企业更值得信赖。

第二，非营利组织被视为建设及重构公民社会、加强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中心。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同类型的公民组织似乎成为了多元化社会的粘合剂。它的基本假设是，处于协会联结的密集网络中的人群不仅对社会问题带有更少的倾向性，而且更具经济成效性和政治参与度。

第三，非营利组织对社会问责而言至关重要。在提高公共机构及企业治理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重要的工具。问责机制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参与式预算、公共支出跟踪调查、公共服务交付监控和消费者保护。这些活动的隐含前提是，诸如选举、公共监督机构以及媒体这些传统问责机制还存在不足；而非营利组织通过揭发和倡导，努力帮助那些未被倾听的声音发声。

第四，就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非营利组织被视为创新之源。事实上，更小规模、更贴近社区的特点使非营利组织成为寻求解决方案的创意代理，因此，它也被公认为比政府更适合做社会创新。

与此同时，政府也正寻求与非营利组织的建立新形式的伙伴关系，以便识别、审查及扩大社会创新，以构建更灵活的公共应对。

上述四种观点对非营利组织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假设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以下或许就是非营利组织 2025 年的场景：

新公共管理场景：非营利组织成为一系列组织有序的准企业实体，通过竞争性招标流程以及分包协议等方式，承担原本由政府提供的任务和功能，以最大程度发挥非营利机构在复杂的社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为对复杂社会市场中的非营利提供者进行竞争优势最大化，这种承担原为政府权限下任务及作用的准企业实体如今通过竞争性招标流程与合同安排完成交付。最终，非营利部门可能成为政府精简合同制度运行下的专有延伸服务代理。

公民场景：非营利组织是带有自我组织及修正能力的社区构建模块。它们是高度自主、各自利益与高度参与、互动协调一致的良性公民社会一部分。非营利领域将会形成一套防止、检测、纠正社会弊病成为“社会问题”的联合制约机制。作为公民社会自治基石的非营利组织，借着慈善事业的支持，协调自己的活动，并与“技术治国”的小政府保持一定距离。

问责场景：非营利组织既参与倡导，也推动倡导。作为一种不妥协的力量，同时拥有慈善资源的独立支持，非营利组织通过构建并推动政治议程，监督政府及商业，挑战现状和保护弱势。事实上，非营利组织是一种反制力，在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监督，确保政府和企业各尽其责。非营利领域创造并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多元化和活力。

创新场景：非营利组织被鼓励去解决对于政客们来说成本太高或不合时宜解决的问题。当选的领导人可以宣称“我们正在处理”。对于不愿严肃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世界而言，非营利组织无疑是块遮羞布。非营利机构吸引慈善风险资本，并且融入社会投资市场，成为了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搜索引擎”。

当然，未来四种场景中，任何一种独占鳌头的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其中一种场景将成为主导，尤其在经济层面。就这一点而言，新公共管理场景将继续塑造服务型非营利组织的演变。它将促使盈利-非营利的混合形式出现，这种改变将不仅仅停留在卫生和社会福利领域，教育和研究、环境、能源和信息技术等公共契约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也将发生改变。

以上列出的各种场景不仅为非营利领域，也为政府和企业预测了不同角色。某个层面上，非营利组织将可能分饰两角，一方面对政府活动进行补充或者制约，另一方面与商业进行竞争，譬如新公共管理的场景。这个观点与古典自由主义非常符合，它也同样出现在公民场景及问责场景中。另一个层面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是更为复杂的政企合作关系中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公共及商业机构以互补的形式展开工作。

随着公共福利及政府责任逐渐从政府转向其它主体，这也铺平了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向私人部门过渡的道路，因此，这两种远景都将成为可能。政府作为“推动者”和“鼓舞者”的作用已明显增加并将持续。这种进展将继续推动非营利组织所有四个方向的发展，其最终的定位，看似矛盾却又充满活力，貌似不稳定却又对于社会至关重要。

原文链接: The Nonprofits of 2025, by Helmut K. Anheier,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Spring 2013

来源: 善天下

地址: <http://www.gpcommon.org/ch/2013/06/05/ssir-5-nonprofits-in-2025/>

[【返回目录】](#)

国际非公募基金会募款方式观察

自 2004 年以来，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猛。截至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中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达到 1591 家，但筹资问题就成了制约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硬道理”。就此，《公益时报》汇集了一组国外非公募性质的基金会、公益组织与民间团体在募款上的经典案例，并从本期起逐一刊发，希望能为国内公益行业从业者有所借鉴。

案例一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邮件募款

在这例邮件募款中，世界自然基金会虚构了一只大猩猩被迫离开家园后的日记，让读者以动物的视角看待周围的环境，从而使读者同情它们的处境。这样一来，呈献给潜在捐赠者的不再是一份第三方的报告，而是一篇第一人称的陈述，使他们有如亲身体会般感受大猩猩居住地——雨林岌岌可危的现状。

世界自然基金会德国分支利用这组独特的邮件，呼吁公众为东南亚婆罗洲的雨林和大猩猩募捐。该团队虚构了这份写于印度尼西亚雨林中的大猩猩日记，用前后 5 次邮件将大猩猩失去居住地后所面临的困境详细叙述，并在最后一封邮件中为故事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结局——这只大猩猩找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为他们提供的庇护所。在这组邮件中，有一个位置鲜明的按键，供读者直接进入募捐页面。

该团队还为这次募款设置了比较性研究——向半数读者发送上述邮件，向另外半数读者发送以往传统型邮件。其结果是，虽然点开“日记”邮件的读者只比点开传统型邮件的读者略微高出，但

是“日记”邮件所带来的直接募捐就超出传统型邮件六成。在整个邮件的发放过程中，5 次“日记”邮件是单一的传统型邮件募款额的 7 倍。

募款目标

世界自然基金会这次邮件募款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邮件订阅者进行捐赠，从而为这项保护雨林的项目筹资。

独到之处

这次“婆罗洲”项目包含了 5 封在不同时间向订阅者发送的邮件，每封邮件都包含了这份大猩猩日记的一则片段。除了“第一人称”的描述外，邮件还提供了诸如当地雨林现状和大猩猩数量的相关数据，并且与每一份邮件所描述的情形做对应。

邮件结构

- 邮件使用大量图片促发读者情感
- 日记主人公和它的家庭成员被一一介绍，并被赋以人性化
- 目的是传递“大猩猩是濒危物种”信息
- 所列事实由相关数据所支持
- 每封邮件均包含醒目的募捐按键，有效提升募捐率

募款成果

这次募捐采用了比较性测试。邮件订阅者被随机分入两个不同的组别：一半订阅者收到“日记”邮件，而另一半则收到与平时相同的传统型邮件。事实证明，这种新型邮件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对比传统型邮件 25.7% 的点击率，第一封“日记”邮件点击率为 26.54%，而整个过程中，5 份“日记”邮件的点击率则高达 44.49%，大大高于传统型邮件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击率 31.94%。

最大的收获在于通过邮件直接获得的募捐率。看过第一封邮件后，“日记”邮件阅读者的募捐数量要比传统型邮件带来的高出 60%。

随后几封“日记”邮件所带来的募捐者更是逐步攀升，第二封邮件获得了高出传统型邮件 110% 的募款人数，比第一封“日记”邮件还高出 31.25%。

案例二

利用统一标识营造公众意识

你是否注意过“粉红运动”，又或者见过某位名人佩戴“粉红丝带”？如果换成是“黄色腕带”，你是否知道这又代表着什么？这两组不同的倡议通过使用视觉化的象征物品发起不同的运动，使“乳腺癌”和“癌症幸存者”这两个议题更频繁地被公众谈起，其背后所代表的意识也深入人心。视觉化装置的使用可以让募款运动深入人心，并让某项具体的帮扶话题具象化。

挑战

如何利用统一标识赢取公众对某项话题的关注与意识

案例 A：“活得坚强”

环法英雄兰斯·阿姆斯特朗为癌症幸存者发起筹款活动，由耐克公司提议并制作 500 万条印有“活得坚强”（LiveStrong）的黄色腕带，并另为该活动捐助 100 万美元现金。在这一案例中，黄色代表的是阿姆斯特朗在环法赛事中所穿的黄色领骑衫，而这种腕带的售价为 1 美元。由于售价低廉并且其意义简明，瞬间内，这种腕带在各个年龄段得到了迅速的普及。所获资金全部流向以兰斯·阿姆斯特朗本人命名的基金会，该基金会致力于提升癌症患者的生命质量。

尽管该项目的发起阶段是通过耐克公司制作的传统广告，但真正的宣传则来自于大众，癌症患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开始佩戴这种腕带，在短时间内营造了一场大众运动，使得癌症患者和他们的需求得到广泛的关心。

案例 B：粉红遐想

“粉红丝带”运动这些年得到了反复的尝试，它是非营利组织和商业联合生产商品并支持某项具体话题的经典案例之一。

1993 年，雅芳公司与这项乳腺癌防治运动一道创立了“粉红丝带”的概念，这条丝带售价 2 美元。在最初的两年中，这条丝带带来的募捐量为惊人的 1000 万美元。

到 1996 年，有 80 至 100 家公司已经参与到这项倡议中来。倡议允许各家公司对这条丝带有个性化的改动，但其盈利必须归于“乳腺癌研究基金”。

在这一期间，乳腺癌的研究规模与公众意识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这要归功于这条“粉红丝带”的普及度和多种用途。一方面，各家公司都可以此为自家产品进行宣传；另一方面，通过销售该丝带，人们能真正为乳腺癌关注项目筹集资金。

成果

阿姆斯特朗的“活得坚强”腕带为癌症患者募集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并且，通过这一方式组织者有效地普及了“公益”这一概念，还促成了社交网络的雏形——任何地点的人都可以通过某一事物参与到某项议题中，并且相互结识。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销售超过了 8000 万份腕带，为这家相对较小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项目经费和运营经费。

“粉红丝带”并没有被注册于某家机构，所以，它有时也被许多公司滥用，以致于“乳腺癌研究基金”并没有收到部分应得的资助。然而现今，无论“丝带”以及粉红色在任何场合的出现都能让公众自然联想到乳腺癌防治运动，它们已经成为这场运动的唯一标识。仅在运动的最初阶段，从

1991 年至 1996 年，美国用于乳腺癌研究的资金就翻了四番，达到了 5.5 亿美元。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tjxw/201306/caa82606921d49ec91d22c80ea33290b.shtml>

[【返回目录】](#)

影响公益未来的十个先锋概念之一：开源运动

摘要：开源貌似已经是一个很红很红的词了。那……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开源（英语：Open Source）是一种向用户开放产品的设计开发和装配出品过程细节，并且促进用户自由对产品进行修改、调整、完善的理念或者价值观。开源运动首先在互联网上获得广泛使用，开源软件的使用者自由获取软件的源代码，并且大量使用者自由修改和更新软件源代码。

开源运动的传播借着互联网行业急速发展的浪潮迅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拥护者，现在早已超越了在互联网的应用边界，而作为一种更加开放自由的设计思想被多数行业尝试与实践。开源硬件、开源 3d 打印、开源设计等等都已经被应用和传播。

如果真的硬是要总结出个核心思想来讲的话，开源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自由分享，并且实现使用者与内容生产者的角色融合，让用户自己成为修改完善产品的生产者。海量的用户形成庞大的生产维护力量保证产品的持续完善的同时，还打破的知识产权商业化的垄断，保障了所有用户都能够自由无限制的使用产品。明明是地球上所有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推动了种种技术、产品和生产方式的诞生和进步，为什么商业寡头们就能够凭借商标认证局的认证就可以完全享有对其的支配和所有权益呢？为什么这些商业公司就能够堂而皇之的用这些产出来卖钱呢？为什么这些产品不应该属于公众属于所有人？开源，其实就是意味着知识的所有权、使用权、修改权利、分享权利的重新定义，开源运动正在用一种更加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节搭建一个更加自由、更加便于分享的概念平台。

不过，开源精神并不是与商业思维水火不容。很多商业公司都在用一些开源的行为实现商业宣传或者品牌塑造的目的。很多商业的机构把开源精神当成了自己公司或者产品品质的一部分，远的说有奥美、麦肯锡等咨询公司自己主动出书，把自己公司优秀的案例、工作方法与工作模式公开分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公司或者产品内部的信息，让业内朋友能够交流学习，也是给公众做了很棒的宣传。本来都是属于公司内部要拿来挣钱的东西，为什么还敢于直接出书分享？一是摆出行业老大

的自信：“就算出书都写给你们，你们也模仿不了我们的运作。”，另外这确实是传播、宣传的很好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道公司是如何工作，如何服务，从而了解公司的价值精神。近的说，ibm、intel 等很多大公司也开始投资做开源项目，而 firefox 这些开源互联网产品，也都非常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用户自发对产品的纠错汇报、代码优化、漏洞完善已经成为 firefox 持续更新完善的主要动力。

当然，开源浪潮的兴起，与开源思想背后的破除寡头垄断、崇尚自由、限制商业权力的价值观与代表了自由、民主以及多元的价值趋向有非常强的关联。类比到公益行业的发展也是一样，开源运动背后的价值观与公益行业整体的价值认同非常一致，而现代公益的发展的赋权赋能、弱势群体协作与自立自强等价值观和开源运动的实现的价值初衷也非常匹配。如果真的要去做对比分析，公民权利上面也有非常多的开源的尝试：大陆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推动倡导、公开政府三公消费报告的倡导、政府重大项目的环境评估公众参与，其实都是公民对于决策开源、信息开源、参与权力开源的努力。

如何推动公益项目的服务对象参与到公益项目的运营当中来？如何能够运用开源思想高效低能耗的实现社会理想？如何能够让好的项目以及智慧能够波及到更多的受众？如何能够动用群体的力量对公益项目进行持续的改进完善？这些问题都能够从优秀的开源案例中获取灵感。

来源：创思客

地址：<http://www.thinker360.com/page/3779>

[【返回目录】](#)

印度孟买“送饭工系统”揭示社会企业本质

印度孟买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微型企业及社会企业家。他们虽然处境困难，却从未轻言放弃，用毅力与决心，最终带来了真正的改变。以下事孟买人值得借鉴的两个方面课：家庭与世界知名的送饭工系统（Dabbawalas）。

社区维护

孟买十分拥挤，每天有 700 万人搭乘火车，550 万人乘坐公车，可想而知这是一座相当忙碌的城市。刚踏入孟买时，一切看似混乱不已，但仔细观察后却会发现它乱中有序。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为了家庭，追寻着目标，创造工作、商业活动，推而广之，这更是为了周边的社区。

孟买有着世界上最拥挤的贫民窟 Dharavi（位于孟买的中心，将近有 100 万人居住）。令人意想不到的，那里很安全，人们很好客，而且每个人都充满着希望，准备要为自己与家庭创造更好的

生活。

Dharavi 的社区互助合作，透过当地企业，创造出相当程度的财务独立。在 Dharavi 就有超过一万个行业，包含皮革、陶艺与回收事业等等。大型企业将工作外包给 Dharavi 的妇女，这不仅提供微薄收入，更重要的是让当地妇女有相当程度的购买能力，以及取得家中的平等地位。

虽然在 Dharavi 的生活很艰辛，但透过 Dharavi 当地社区的企业，能够看到社会企业的本质：互助合作、为所有人提供机会、为自己与家人创造更好的明天。

送饭工 (Dabbawalas)

谁是送饭工 (Dabbawalas)？他们把客户家中煮好的饭准时送到办公室，之后，再从办公室回收饭盒到个别客户的家。他们每天为超过二十万个顾客，运送超过四十万个餐盒。

送饭工有两个特点一：

第一，有 80% 的送饭工不曾接受正式教育；

第二，他们用饭盒上的编码系统 (coding system) 来运输，而不是发达国家用的 IT 或是电信系统。最神奇的是，不靠任何科技产品，运送错误率居然仅有一百六十万分之一，几乎接近物流业梦寐以求的零失误率，这一切靠的仅是编码系统与未受过正式教育的送饭工们。

送饭工服务已运作超过一百二十年，拥有五千多名员工，却能以扁平的组织型态与委员会运作，并享有同样的薪水，可见组织里的每个人都是互相依赖的。由于组织高度信任每个送饭工，所以他们也能与顾客协商每笔订单的价格。这是一个回应社会问题的企业，他们透过信任员工与赋予财务责任，给社会上较贫穷、或没接受过教育的人们创造工作机会。

有时我们认为“创造改变”，是“要做一件大事”或是“那是别人的事”，但实际上改变却掌握在每一个人的手中，关键在于愿不愿意为自己、家人甚至无论远近的社区，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这两个方面揭示了社会企业的本质：透过社区与个人，为国家某些艰难的问题，带来真正的改变。

孟买教给我们的：集体责任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与共享意识 (shared awareness) 都会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明天。

来源：社企流

地址：<http://www.seinsights.asia/story/614/14/1133>

[【返回目录】](#)

耐心资本的黑暗之舞 ——敏智经验与启示

在社会影响力投资开始升温的今天，敏智（Acumen）则早在 2001 年就开始了实践。如果说敏智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创始人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ogratz）的化身，那么其实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 80 年代。在非洲、印度、巴基斯坦，亲身看过慈善与援助的无效，亲手操刀金融服务、烘焙坊等组织建设，而后将这些经验作为财富，采用耐心资本进行大胆探索，杰奎琳·诺沃格拉茨和敏智为我们充分展示了其人性和人道的温柔与至刚、悲悯与睿智、谦逊与大胆，给我们贡献了 一笔丰富的经验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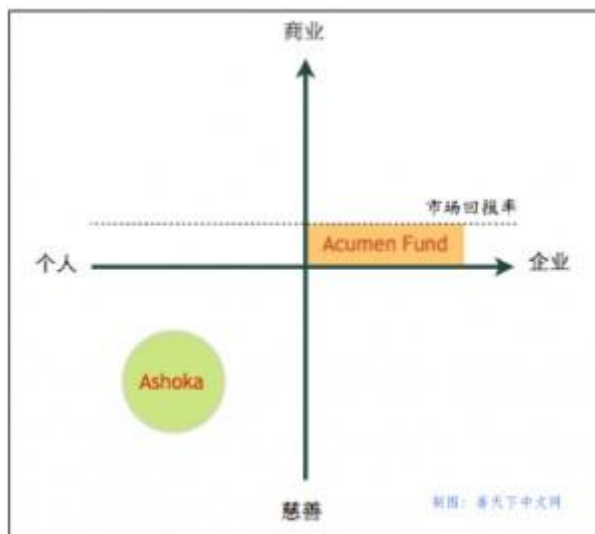
十年耐心黑暗之舞

《如何改变世界》一书让国人了解到了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和阿育王（Ashoka）这样的机构存在，但在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发展领域，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ogratz）和她创立的敏智基金（Acumen Fund）和前者一样，是一支推动社会投资运动（movement）蓬勃发展踏实而坚定的力量。尽管说“社会影响力投资”这一术语直到 2007 年 10 月，被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意大利召集的一次会议提出而广为人知，而但包括敏智基金、阿育王、草根资本（Root Capital）、奥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 等在内的先驱就早已经开始探索实践。

敏智基金成立于 2001 年，但实际上用商业手法进行贫困问题解决之道的探索在此之前的十多年就已经开始，即其传奇创始人杰奎琳·诺沃格拉茨在大学毕业短暂的华尔街银行业从业经历之后，就在非洲投身到发展事业中。杰奎琳发现年少所认为的“黑暗非洲”显然不愿意也不需要外人来拯救，而“好心办了坏事”的慈善援助却是比比皆是。从理想主义到只要能轻轻推动世界有一点变化的务实主义转变与人生体察，以及多年的发展领域的探索与经验，使得敏智基金诞生了。关于杰奎琳的传奇故事，推荐阅读其所著自传体作品《蓝毛衣》（The Blue Sweate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一书。

敏智基金成立伊始，启动资金主要是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思科基金会（Cisco Foundation）与三位个人慈善家，后盖茨基金会、google.org 和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都有投入资金。由于秉持用投资的理念以及基于这一市场条件的现实状况，敏智基金提出并践行用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支持有能力、想法与行动解决自身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在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耐心资本，它是一种长期投资方式，目的在于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并同时寻求资本回报。它是一种非传统慈善方式解决贫困的大胆新尝试，并不愿意因为资本所有人而牺牲终端消费者的利益；相比传统投资则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对投资资本的回报时间跨度也较长。与阿育王在世界各地寻找、甄别和筛选社会企业家，然后对社会企业家个人进行个人生活费用，到商业网络发展的资助支持模式相比，敏

智基金家的支持，主要是围绕推进其商业创业方面，如帮助社会企业家引入技术、做商业计划、如何实现盈利。



敏智基金经过十多年实践的显示，耐心资本确实能也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敏智基金主要投资在健康（始于 2001）、住房（始于 2002）、饮用水（始于 2003）、能源（始于 2007）、农业（始于 2008）、教育（始于 2011）这六大领域。自 2001 年 4 月成立到现在，敏智基金累计投资了约 8300 万美元，接受投资的社会企业有 73 家，本利返还 1300 万美元，带动的跟进投资和联合投资达 3.68 亿美元。仅仅看此数据我们还没有太大的冲击力，我们与 2011 年，敏智基金十周年纪念发布的报告数据一对比，就能有直观的感受。主要从撬动第三方资金的杠杆作用方面来看，2011 年是 2.06 亿美元，仅仅 2 年不到时间，其网站显示数据为 3.68 亿美元，撬动的资本数额增幅达到了 78.6%。这得益于敏智基金本身十多年的耕耘，乃至回溯到创始人 20 多年前就开始的探索。同时，这说明影响力投资市场正开始加速升温。新慈善运动的走向正开始发生变化（关于慈善资本的创新路径可参见“善天下中文网”的另一篇解读——《全球慈善新运动，中国如何定位？》），从基金会的战略慈善、企业慈善到金融投资界都开始关注并参与影响力投资也不无关系。



敏智十年之体悟

在敏智基金十周年的时候，回顾经过的十年，敏智总结了十点经验：

1. 尊严是比财富更重要的人道精神。
2. 无论资助还是市场，都无法独自解决贫困问题。
3. “贫穷”是对一个人经济状况的表述，而不是说他是什么样的人。
4. 长期而言，没有培育地方领袖、地方资金和强大的地方社区，我们就无法成功。
5. 毫无例外，每次都是伟大的个人起作用。
6. 技术创造本身不是答案。
7. 如果失败不是一选项，你就基本不可能成功。
8. 政府很少投资解决方案，但他们可以推广有效的方案。
9. 任何货币都无法与信任相比，而信任的赢取是无捷径的。
10. 耐心资本投资是建立在一价值体系之上的，它不是一系列应被遵从的步骤。

总体而言，其经验涉及了坚持的核心价值理念、组织内部观念改变和外部则善加利用政府力量三个方面：

坚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敏智基金的核心价值理念一句话概括，大体是：以人为中心，尊严为导向，建立信任，打造具有“道德想象”的领导力。

首先，无论是演讲、访谈，还是撰文，杰奎琳·诺沃格拉茨言语频率最高的词是“尊严”，以此作为起点与出发点，这不仅仅是他人，也是自己的起点，这已经内化为杰奎琳·诺沃格拉茨个人品质的有机部分。在杰奎琳·诺沃格拉茨看来，“贫穷”不是对人本质的标签，它只能是对人经济状况的

一种事实描述，不应该带有价值判断色彩。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状况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选择和决策的空间很小。他们有内在改变自己境遇的动力，但恰恰是选择机会的缺乏，使得他们的潜能无法充分释放。同时，他们也是一个完整的人，有合理的消费需求，他们为了安全的饮用水，也会愿意支付价格进行购买。

其次，信任是最坚挺的货币，希望是最强大的催化剂。信任的建设是要花费长期的时间，而摧毁它只需瞬间。敏智基金以十多年的经验，谆谆告诫大家，它不取决于大部分时间“我们做了什么”，而取决于“我们是如何做的”。低收入社区群体对带来“他们问题解决方案”的外部进入者，一向抱有可以理解的警觉。多年来，传统慈善援助的失败，使得贫困最终没有实质改变。金字塔底层的人群对改变不抱大的期待，人们更难以信任外部介入者，他们甚至早就生成了期待直接给付资金和物资的心理依赖。因此，如果新的贫困应对之道依然是一面通过笼络、迎合建立关系，另一面进行新扶贫方式的理念布道宣传，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要大胆创新性战胜贫困，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深化自身的同理心，这一等同身受的共情，才能让你自己真正视自己和他们是不可分的一体，才能为受益人群、援助人等提供最大的希望，继而坚定，直至成功。

再次，伟大的商业计划，仅仅是个商业计划，没有人的执行，它永远都是限于纸面。但是，在为金字塔底层人群市场这种基础设施极端薄弱的挑战环境下，进行商业计划开发与开发，必须要求强有力的领导者。他首先需要有“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即能够将自己置身他人境况下，从他人角度进行解决方案设计的能力；此外，还要具有独特的经济和商业运作技能，能在每个固有现状中找到突破，并愿意为底层的消费者解决迫切的问题。他们坚韧、严明、坚持，同时具有同理心、开放的胸怀和忍耐力。此外，需要在当地培育地方领袖、地方资本和地方社区。因为，强有力的地区性贫困解决方案的长远可行性，不是身处远方的资助方决定得，其深厚、长久的支持是来自于当地团队、地方资本，以及最重要的是有数千万的当地消费者。

组织内部观念改变

在组织的内在改变主要是学会倾听消费者、进行勇于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敢于承认和接受失败。

在传统的慈善援助中，由于缺乏真正的向捐赠人和捐赠机构的反馈环节，使得受赠人的声音听不见。而在慈善-商业光谱的另一端，传统的风险投资资本和私募基金是将投资人的需求放在首位，就算是这可能损害消费者的需求或完全视穷人而不见。因此，如果我们把穷人是看做全面的人，就会发现他也有自己的需求偏好，他对产品和服务和我们任何一个普通的市场参与主体一样，都会有满意或抱怨。要建立真正的、可持续的以及低收入群体作为自己生活行动主体诚实参与的体制，就需要学会利用市场，将之作为一种倾听和监测的工具，学会耐心倾听消费者们的声音。

在战胜贫困的过程中，技术创造本身不是答案，还须勇于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创新之道必须建

设，不会不请自来”，在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性递送中，需要消费者实在的投入、与销售商的合作和恰当的经济激励，这些通常比精致的设计更重要。无论一项创新如何伟大，商业最终还是要落在现实世界中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而现实世界是买方、销售商、商业伙伴、雇员，尤其是消费者每天都在对你的产品的喜爱与否进行用脚投票的选择。因此，商业模式的创新就非常重要。

勇于承认失败的开放心态，对于成功至关重要。贫困问题由于时间、地域的不同，其解决方案也各异，根本没有一剂包治天下的灵丹妙药。对于任何人没有现成的答案，都需要去探索寻找。专家写成的计划在面对瞬息变化的市场常常是失效的。因此，在这样的领域拓荒，失败是正常，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谦逊，勇于接受和承认失败，并从中习得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深化问题，为成功突破提供实现的可能。

善加利用政府力量

外部推动方面，主要是对政府作用的认识上。敏智基金的建立是基于一个信念，即公共部门本身是无法解决大范围的贫困问题。在敏智的早期阶段，一直都避免重大的政府合作关系。在肯尼亚的 A to Z 纺织厂项目中，敏智看到公共部门如果不扭曲市场的话，是可以成为解决之道规模化推广的重要力量。政府部门可以创新性设立补贴项目，甚至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成为一些成功的社会企业的客户，可以让一新项目实现飞跃，为规模化的扩大注入资金。

敏智经验之启示

善之“心”

敏智基金的经验，说到核心，套用中国国情行话，首先就是要切切实实地以人为本，所谓慈与善，都无非是要抵达心底，触及心灵，无论对于受善者，还是对于为善者，都是如此。尽管在整个慈善的过程，我们所谓的战略慈善、影响力投资等无非是达至触及人心，引起广泛变化的一个工具和手段。但在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下，价值理性很容易就被忽视和替代了。如果没有了背后的价值核心，工具理性终无所依，不知不觉中就自我迷失。

对于当下的中国慈善这不可不察，尤其是在公益丑闻不断占据新闻头版的现在，每个公益人首先都要纯化和修炼自己的内心，唯此才能催化和爆发巨大的人性力量，感动自己，感染他人。在《慈善之驱动力：打造高影响力非营利组织的六大实践》《Forces for Good: The Six Practices of High-Impact Nonprofits》一书作者通过对 12 家机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出六大实践中的一点是培育、催化出组织口碑的宣传布道者，而这些出现布道者的出现恰恰就是人心被感染和征服的结果。

善之“行”

慈善本身是一种践行，不能是坐而论道，“身未动，心已远”自有其美好的意境一面，但徒有激情与理想，却不能落地实现只能是枉然。它应该是知行的合一，既需要强健的肉身、长远的眼光，

更需要强大的内心，需要坚韧、悲悯、谦卑，还需要足以冷静、切实推动执行的能力。敏智基金在其网站写道：“仅仅有热情和想法，你走不了多远。真正的领袖是需要价值观、技能和经验三者兼具。”杰奎琳·诺沃格拉茨本身就是对此理念的一个非常好诠释和典范。她 20 多年如一日地在非洲、印度、巴基斯坦穿梭，即使现在身为敏智基金的 CEO，还时常到一些项目实地做借贷人的财务尽职调查，尽管她办公室是在纽约曼哈顿，但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路途中。在被问及为何有如此频繁的差旅时，她回答到“作为一个机构的真正道德责任，就是花上时间，坐下来，倾听消费者和它所服务的人群的看法。”

如果说影响力的催化和规模化形成是通过涟漪效应来实现，那么每个怀有人道、自尊价值观，以及有足够技能和能力的个体的实践，就恰恰是投入池塘的那颗石子，如果这样的石子不断增多，那么影响力就会不断一个涟漪接一个涟漪地产生。在我们不断被杰奎琳·诺沃格拉茨个人魅力和敏智成就感染的背后，我们需要聚焦和学习的是其与敏智长年笃定、睿智、冷静、坚韧、大胆地践行新理念的踏实行动。

善之“势”

杰奎琳·诺沃格拉茨在这次 SSIR 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对于未来十年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挑战，总结了四点。其中第一点所言的“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和技术支持”，在我们的《拨开黑暗之雾——慈善资本在建设普惠商业中的作用》一文中已经有过深入分析。但其提及的各部门在影响力投资生态中的作用、影响力评估以及人才和领导力问题中，对于影响力投资生态问题，更是不能不引人所发。

从域外的社会发展实践，就慈善来看，经历了 100 多年的现代慈善自然演进过程，这是一个自然而有机的进化过程。从卡耐基、洛克菲勒基金会时代开启的现代慈善，到现在的战略捐赠、战略慈善、影响力投资实践，这是有其一步一步推进的政策、社会、经济与实践等要素的全面促成。在域外的慈善实践中，基金会做上游，运作组织在下游，中段各类中间组织的链条早已形成，已经是在谈论生态系统问题。尽管当前的社会企业，以及与之对应的影响力投资是对当前“非公有领域则即属私有部门”二分法的突破，也带来了实践上的挑战和难题，但是基于其慈善生态的完整，亦即其无论经济，还是慈善的社会基础设施和配套（infrastructure）都相对完善，所进行的只是如何重组、调整、调适和协同，然后螺旋上升地衍生出新系统的过程。

反观中国的现状，借用《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一书的说法，如果说西方慈善是从慈善 1.0 演进到了 3.0 的版本，那么当下的中国，由于近 30 年的去中央化、市场化的改革，经济总量获得飞速增长；社会服务的民营化改革，以及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现，使得被挤压的慈善激情与资本短时间有了爆发性突增；而经济全

球化、网络全球化的发展，对于信息和思想的传播起到难以置信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造成我们看到中国慈善的局面是慈善 1.0、慈善 2.0 和慈善 3.0 没有这种自然演化过程，就短时间内就已是“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我们有大量的救济型运作组织，不少挂着“基金会”的名头，承担着的却是非营利组织的角色和功能，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社会企业、战略慈善、影响力投资的讨论与实践。而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对于中国影响力投资生态建设的就更是一重大挑战。这更需要我们具有智慧、耐心、笃定和道德的内心来支持，来践行和建设。

来源：善天下

地址：http://www.gpcommon.org/ch/2013/06/03/pacient_capital_acumen_fund/

[【返回目录】](#)

新慈善-阿诺德的“点球成金”模式

阿诺德夫妇今年还不到 40 岁，他们代表了新一波的慈善模式：不惧于挑战深沉复杂的社会问题、充分利用技术和数据、追求系统解决方案而不是小修小补式的慈善。

一封邮件带来 355 万美元

加力·陶比斯（Gary Taubes）是个很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专长在食品领域。2 年前，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目前关于肥胖的科学要么漏洞百出，要么完全不具说服力，现在需要的是系统的实验，来回答关于我们的身体如何处理食物的一些关键问题。有一天，他收到一封 5 行字的电子邮件，称“以我对营养学的粗浅了解，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他在邮件中解释他在运作一个基金会，专注于公共政策。邮件署名很简单，John。

陶比斯注意到邮件发送者全名是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Google 一查，原来这个人原安然公司的天然气期货神童交易员，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这个基金相当低调，即使在它的本部休斯顿也没多少人知道，更不要说全国了，可是在对冲基金的圈子里，它却因为其巨额收益堪称传奇。

陶比斯把邮件转发给了彼得·阿蒂亚（Peter Attia）。阿蒂亚是医学博士，和陶比斯一起成立了一个专事营养学研究的非营利机构。阿蒂亚打电话约见阿诺德，得到的回复是：“先给我们这个领域内 20 个顶级专家的名字，这其中要有一半人认为你脑子坏掉了。”几周后，阿蒂亚和阿诺德会见。谈话之间，显然阿诺德和他的员工，至少已经和阿蒂亚供的清单里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专家通过话了。而另一点很明确的是，对于启动一项全面的营养学研究，阿诺德不是在开玩

笑。他显然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他的抱负也很高：如果把所有最好的最聪明的食品科学家聚集起来，给他们提供所有需要的资源，他们能实现什么？

从那封简单的邮件开始，陶比斯和阿蒂亚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目前阿诺德基金会投入 355 万美元，支持阿蒂亚的营养学研究项目。

从神童交易员到特立独行的慈善家

阿诺德，在过去 10 年间，积累了 40 亿美元财富。这期间，在华尔街，超越这个收益的人，屈指可数。1996 年阿诺德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安然公司。5 年后他就成为了全公司薪水最高的员工，2001 年他的奖金提成就高达 8 百万美元。所有提到阿诺德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用一个词来形容他，“聪明绝顶”。此外，阿诺德在圈内也以“对天气规律和油气管道研究得细致入微”而著称，人们也熟知他从不惮于基于自己的研究，对天然气价格走向押下巨额赌注。Arnold 最具传奇的交易之一是 2005 年卡特琳娜飓风之后，对手 Amaranth Advisors 押巨资判定由于更多风暴即将发生，所以天然气价格将高涨；Arnold 做了相反的判断。这一单为阿诺德赢得了 1 亿美金的收益，而 Amaranth 却垮掉了。2012 年 10 月，阿诺德选择了退休，开始了他的新事业——慈善。这一年他 38 岁。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宣布，但已经决定要把几乎所有的财富全部用在慈善事业上。在美国历史上，白手起家积累了如此巨额的财富，而又在如此年轻就全力投身于慈善的人，阿诺德是第一个。

与阿诺德并肩的，是他的妻子劳拉（Laura）。劳拉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先后担任公司法律顾问和某石油上市公司的法律总理事。现在两人共同成立了劳拉及约翰·阿诺德基金会（Laura and John Arnold Foundation）。和很多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里出世的新慈善家们一样，他们选择了和前辈们不同的行善方式。传统的慈善家们，喜欢把钱捐给自己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上过的学校，待过的医院；或者是所在社区里紧急的需要——诸如饥饿和教育。而阿诺德夫妇，不按常理出牌，而且似乎比同辈的新慈善家们来得更为彻底。

在行善之初，阿诺德夫妇就已经决定，他们不会选择枝头低挂、顺手可摘的果实。他们希望专注于引发了“道德缺陷”的社会问题，利用他们的资源，对公共政策和解决方案产生影响。用约翰·阿诺德的话说，就是“寻找有高杠杆效应的机会”。于是，他们选择了几个相当宏大的领域：解决肥胖问题、K-12 教育、刑事司法改革。同样的，他们的手法，也迥异与前辈。他们强调数据和研究，追求客观结果。这显然与阿诺德的操盘经历有关系——他们将花大量时间，做研究，评估信息，然后押几个大级别的宝，虽然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阿诺德说，很多基金会不愿意选择风险，因为他们只希望证明自己的成功。阿诺德基金会希望去探索政府不可能去证实的领域，或者企业因为看不到快速回报而不愿意去投入的领域。他们知道阿诺德基金会的很多项目，不过不是大部分的话，都会失败，或者无疾而终，“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承担风险，那么最终的结果将非常有限。”他们聘请了新

泽西州前任检察长安妮·米尔格莱姆（Anne Milgram）主导刑事司法改革项目。米尔格莱姆用“Moneyball”来描述阿诺德基金会的模式。如果你看过《点球成金》这部电影，你一定熟悉在美国职业棒球联赛中，奥克兰运动家队如何通过数据建模研究分析，以小博大，战胜了薪水预算是其 3 倍之多的财大气粗的明星球队。

阿诺德模式

简单的说，阿诺德模式，和前面提到的“点球成金”类似，就是将资源集中在有希望产生重大解决方案的研究上，以期对根本性问题产生实质影响。

去年（2012）阿诺德夫妇承诺捐赠的总额达到了 4.23 亿美元，在去年美国捐赠排行榜上位居第三，仅次于巴菲特和马克·扎克伯格夫妇。阿诺德基金会目前进行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其中一项进展是通过对 150 万个案例进行数据分析，米尔格莱姆和她的团队为法官们设计了一个风险评估工具，今年将在 3 个司法辖区试用，这个工具能减少司法程序中的不公正，同时大幅降低审前羁押的费用。

除了以小博大，阿诺德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系统化和数据导向捐赠思维，这可以从他们对休斯敦食品银行的资助上窥斑见豹。

美国的食物银行（Food Bank）是美国非营利机构中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救助的一个重要机构。它接受个人、企业（尤其是超市和餐饮行业）捐赠的食品，分拣包装以后，免费发放给需要救济的群体。有时候他们也会定向采购需要的食品。占地近 28,000 平米的休斯敦食品银行，是全美最大的食品银行。阿诺德夫妇向他们捐赠了 1000 万美金，用于扩建仓库。

食品银行可以说是最老式、最传统的救济式行善方式了，表面看来，这似乎与阿诺德夫妇的捐赠哲学相距甚远。事实上，阿诺德基金会在捐赠时，就已经明确表示，其真正兴趣并不止于帮助食品银行提高效率。据食品银行的经理布莱恩·格里（Brian Greene）介绍，阿诺德夫妇是被食品银行的数据吸引了。这些数据表明，领取食品的大部分人并非穷得揭不开锅了，相反，这些人大多有家可归，有屋可居，可是在当前的经济萧条中，他们宁可花钱付房租而不是买食品。所以，表面看来，食品和饥饿是最直接的问题，但其背后是更深层的原因，譬如失业、慢性健康问题等，而食品银行并没有处理这些问题。

阿诺德敦促格里去思考，如何能够最大化利用休斯敦食品银行的分发网络，向低收入人群交付其它服务。在分发食品的同时，能不能同时进行职业技能和财务知识的培训？能不能进行 2 型糖尿病的排查，帮助他们控制糖尿病？

阿诺德的这些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全美国共有 200 个食品银行，与 61,000 个机构合作，把食品分发到社区层次（好比中国的街道层次），每年触及的人群达到 3700 万人。当格里把这些问题

提交给其总部“供养美国”(Feeding America)的领导们时,这让他们非常兴奋。“供养美国”的开发总监毛拉·达利(Maura Daly),说,“有人提出这些问题,对我们而言,简直就像梦想成真。我们不是没想过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知道单靠分发救济食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可是,大多数捐赠人对于在更高层面上解决问题兴趣寡然。”

就食品银行而言,阿诺德夫妇目前所做的,是资助一项评估:哪些机构在这个系统中最有效,哪些机构的结果可以规模化?把食品分发和职业培训服务关联起来的想法,真的可行吗?达利坦言,他们目前也没有答案,可是重要的是,“阿诺德夫妇敢于大胆构想。”

如果你感觉刑事司法和食品银行距离中国实践有点远,或许可以看看阿诺德基金会资助建立的“捐赠图书馆”。这个在线图书馆面向慈善家和捐赠者,收集了数百个非营利机构的信息,分属于司法公正、健康、教育、环境、人道救助几大类。他们统一制作视频,让非营利机构就10个问题简短作答。捐赠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自己所关注的领域有所了解,锁定一些愿意支持的非营利机构。“图书馆”还设立了沟通渠道,捐赠者可以向有意向的非营利机构匿名提问,免除被“追捐”的顾虑。

虽然目前“捐赠图书馆”的“馆藏”还很有限,收录的机构大多规模不大。可是,国内的非营利机构,也许能在各自相关的领域内,找到一些对标项目和对标机构,或者在测量指标上获取一些启示。另外,这个图书馆的视频,对于非营利机构还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可以通过观察不同机构对同样问题的回答,发现和学习有效沟通和无效沟通的区别。

阿诺德模式并非人见人爱

阿诺德模式听起来似乎不错,可是在慈善界里,其实还不算普遍。

且不说仍然有很多慈善家们希望实现看得到的改变,这些愿望直接体现在让多少人有饭吃,让多少人有书读,更是有很多慈善家热衷于慈善,是因为行善带给他们的情感触动,这些感动也许来自访问他们所资助的新学校,也许来自阅读他们所资助的非营利机构的动人年报。阿诺德模式没有这些要素,而且他们所选择的领域,也许很长时间内都看不到结果。John和Laura对此有充分的估计,除了财富,他们已经准备好足够的耐心。当然,不是每个亿万富翁都能像他们那样奢侈地拥有40年时间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

同时,当他们希望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变时,势必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在休斯敦的公立学校体系中,由于他们所推动的养老金改革和对教师实行更严格的评估,阿诺德夫妇被视为第一号公众敌人。盖尔·法伦(Gayle Fallon)是休斯敦教师联合会的主席,他认为阿诺德夫妇对数据的狂热是一种误导,“并不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测量的”。

阿诺德夫妇在BridgeSpan公益咨询公司制作的采访中这样解释他们的行善理念,原来一切都源

于挫败感：

“我们最先开始的领域是教育。这似乎是个很自然的选择。我们都来自于普通中产家庭，中学都在公立学校。我们深知公立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刚开始，我们觉得支持教育很简单。我们选择那些干得不错的非营利机构，资助他们扩大规模。这种感觉很不错，觉得自己向社会做了一些回报。但是，当我们介入越深，了解越多，就越发意识到，如果事情真那么简单，这些问题早就该解决了。我们开始质疑我们的捐助究竟起到了什么效果。最初的自足被挫败感取代了。我们开始认识到，如果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善，我们什么都实现不了。所以，我们决定退一步，做研究，了解问题的症结，然后集中资源去解决根本的问题。”

阿诺德夫妇的公开信

读过这篇文章，或许你会认为阿诺德是个腰缠亿万只看数据的冷酷家伙，其实不然。早在他退休之前，他早就作为志愿者，服务于多个教育相关的非营利机构，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下面是阿诺德夫妇在“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上的公开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应该更清楚地了解这对年轻夫妇的财富观和慈善观：

“对于我们的今天的财富，我们既觉得难以置信，又感觉令人谦卑，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有一天能到达今天的境地。我们的背景和很多美国人差不多。我们俩都成长于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家庭教育一直强调价值观、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我们中学都在公立学校就读，上了私立大学也一直通过打工支持学业。当然，我们也曾希望有一天能变得“富有”，就像所有年轻人希望那样想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我们今天真的“富有”了。我们拥有的财富，已经超出了照料家庭、养育孩子以及提供舒适生活方式的需要。

我们深深感恩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给予我们的种种机会，感恩所在的社会经济环境能让我们充分地利用这些机会。我们感觉我们有责任让其它人也拥有这样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财富，它本身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工具，让我们可以用来实现积极的变革。为此，我们已经将相当大一部分资产捐赠建立劳拉和约翰阿诺德基金会，而且在有生之年会继续此行。我们身故之后，绝大部分资产将遗赠给基金会。

在基金会，我们专注于如下领域：（1）慈善投资可以促成产生从长远上可以自我持续的解决方案的领域；（2）我们可以让相对小金额的投资实现高杠杆效应，对社会福祉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3）由于市场失效、缺乏信息或者其它原因，不能依赖市场产生最佳结果的领域。这些基本原则已经引导我们在好几个领域进行了投资，譬如教育改革、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社会公正。

我们能在生命中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一项重要的使命，为此我们深感幸运，同时也感觉时不我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把我们大部分财富、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慈善中，我们全心准

备在有生之年实现具有变革意义的结果。再也没有什么工作比它更有意义，也没有什么使命比它更伟大。想要让世界有所不同，就该从现在开始。”

来源：善天下

地址：<http://www.gpcommon.org/ch/2013/06/11/arnolds-foundations-moneyball-model/>

[【返回目录】](#)

Kiva：让普通人开“世界银行”

莫萨·迪恩（Moussa Dieng）是塞内加尔姆布尔市（Mboul）的一个禽畜饲养农民。他和博克·迪奥姆协会（Bocc Diom）的同伴有一个商业计划，他们想购买并饲养母牛，然后在姆布尔市 12 公里以外的佩基斯（Pekesse）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再把它们卖了。他需要借 1200 美元来买牛。

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Quayaquil），亚历山德拉·卡斯特罗（Alexandra Castro）含辛茹苦地养家糊口。她是一个水果批发商和小贩，她需要 925 美元以批发价购买水果，以使自己的生意做大。

莫萨和亚历山德拉只是 Kiva.org 上几千“贫穷企业家”中的两个，Kiva 是一个小额信贷网上平台，普通人可以通过它联系到这些人——帮助他们把生意做得更好，最终改善他们的生活。

小额贷款的 eBay

Kiva 建立于 2005 年 10 月，当时其创始人马特·弗兰纳里（Matt Flannery）只是将一些需要起步资金发展小买卖的穷人资料告诉家人朋友，并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这些信息随后被大型的博客网站发现，需要贷款的穷人很快得到了资金。马特和网站其他成员由此发现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于是开始与乌干达的一个小额贷款机构取得联系，接着又开始考虑联系其他小额贷款机构，让他们把申请贷款者的信息公布在网站上。

普雷马拉尔·沙阿（Premal Shah）目前是 Kiva 的主席，他将 Kiva 称为“小额贷款的电子港湾”，通过一个网络平台，把需要资金的人和有空闲资金的人联系在一起。放款人可以在网站上看到贷款申请者的信息，自主选择借贷金额，甚至可以少至 25 美元。放款人可以使用信用卡，通过在线支付提供商 PayPal 贷出资金。

网站上公布的贷款申请者来自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一个出售化妆品的洪都拉斯妇女，也可能是柬埔寨一个小编织作坊，或者是加纳一个修车场。借款人有固定的还款期限，一般是 12

至 18 个月。当放款人收到返还的资金后，他们可以选择收回资金或者继续放贷。

沙阿称，自从孟加拉小额信贷模式创始人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主动登录网站提供资金的人数突飞猛涨，“短短一夜间，我们网站的访问量几乎翻了一番”。他同时指出，最近出版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新书《给予》也促发了新一轮对小额贷款网站的兴趣和关注，以至于 Kiva 网站需要寻找更多的借款人，把闲置的资金放出去。目前，网站已经贷出了 1100 万美元，沙阿希望在今后 3 年内贷出 1 亿美元。

以慈善方式提供资金

Kiva 的运作原理非常简单，主要基于同世界各地小额贷款机构的合作。首先，各小额贷款机构通过走访等形式，获得贷款申请者的基本信息，公布在 Kiva 网站上。网站上有贷款申请者的详细信息，包括照片、业务计划等，这些申请者需要的金额从 75 美元至 1000 美元不等。网站模仿网上商店的做法，根据偿还前期贷款的情况、经营时间和贷款总金额等把申请者分级。

在放款人选择完放贷对象，将资金转移给 Kiva 网站后，Kiva 会把资金以免息或很低的利息借贷给相应的小额贷款机构，然后这些机构再以一定利息将资金借贷给需要的穷人。目前全球范围有大约 3300 多个小额贷款机构，大多数规模非常小，限制其发展的因素是难以从银行得到资金。

Kiva 的想法是，通过网络从普通人那获得资金，借此把小额贷款机构获得资金所需要支付的成本降低，甚至让他们不需要这项成本，那么他们就将有更多资金贷给穷人。此外，一旦小额贷款机构发展壮大，就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有需求的穷人，同时降低贷款利息。这就是 Kiva 现在依仗的经济学理论。

由于 Kiva 向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资金并不收取利息，因此 Kiva 如何生存并获得利益成了一个难题。沙阿说，Kiva 的资金来源于有空闲资金的个人，这些人并不十分在乎经济回报，更在意精神上的回报，因此他们愿意以从事慈善事业的心态提供资金。而 Kiva 的本身的运作成本不高，而且还得到了部分捐助。正因如此，Kiva 得以通过这些渠道获得资金，以免息或以极低的利息向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资金，让这些机构贷款给穷人。

消除“贫穷的惩罚”

沙阿介绍说，全球有大约 20 亿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每天的可支配支出在 2 美元以下。Kiva 的宗旨是“授之以渔”，现在的关键在于许多人知道如何“捕鱼”，但他们缺乏起步资金购买“渔船”和“渔网”。如果他们有了启动资金，就能挣钱养家糊口，继而让孩子接受教育、支付医疗费用，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穷人而言，最大的困难就是从银行那儿得到贷款作为起步资金，因为他们没有担保物申请贷款，于是只能向私人借钱。而向私人借钱的问题在于，放款

人往往征收高额利息，利率甚至高达 80%到 800%。这种穷人被迫为任何东西支付更多钱的现象被称为“贫穷的惩罚”，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接触使用正规的市场。据估计，全球有大约 5 亿人需要低利息的贷款，但过去 30 年只有 1 亿人得到这种贷款。

近来，许多小额贷款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发挥作用，他们为亟需资金的穷人提供资金，用下次以更低利息贷款的权力作为激励，让借款人以名誉作为担保，保证比较高的还贷率。这种小额贷款机构范围非常广泛。以乌干达的一个教堂为例，牧师熟悉附近的民众，了解有四分之三人都做小买卖，于是将教堂闲置的资金贷给需要的人，当这些借款人偿还贷款后，这些资金又可以贷给其他穷人。

如果小额贷款机构能够得到更多资金，他们就可以更快扩大业务，为更多穷人带去资金。而 Kiva 筹集的资金正为这些小额贷款机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流。目前这些机构将资金贷给穷人收取的利息是 37%，尽管听上去比较高，但是比起私人高利贷要低很多。而且由于借款人贷款额度一般都比较小，所以也能承担这个利率。

透明化运作模式

Kiva 将所有信息透明化的运作模式作为吸引普通民众提供资金的一种方式，所有贷款申请者的信息都公布在网站上，放款人可以了解申请者的个人信息、生意类型、贷款目的等详细信息，自主选择贷款人。举例说，放款人可以把钱贷给加纳的乔伊丝·奥乌苏——她需要 800 美金改善自己的服装店；或是萨摩亚的谢尼·托阿——他需要 800 美金购买冰柜储藏捕来的鱼。

另外，Kiva 随时跟踪贷款使用情况并在网站上公布的做法也吸引了不少放款人。

Kiva 将偿还款项和贷款的使用情况公布在网上和定期刊物。放款人可以通过网站的更新信息随时了解借款人的情况，包括他们的买卖发展如何，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等。此外，这些借款人的信用度也非常高，还贷比例平均达到 95%。沙阿说：“如果他们不可信赖，那么他们就无法获得更多资金。”

而借款人的信用也让放款人感受到一种满足感。沙阿说：“让放款人兴奋的是，在你没有意料的情况下得到回报。”他还说，其实这种新型贷款方式更像慈善事业。尽管这种新型慈善事业较之捐款等普通慈善事业更类似银行业务，“但你依然会有一种帮助他人的温暖感觉”。联合国已经将 2005 年定为小额贷款年，许多经济学家和国家领导人也已经开始谈论通过小额贷款机构向穷人提供更多资金的新慈善模式。

背景资料

Kiva 一词在非洲斯瓦西里语中意为“成交”，其创立源自于程序员马特·弗兰纳里前往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拍摄农村创业活动时的灵感。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Kiva 的贷款总额为 1.77 亿

美元，用户 80.5 万人，借款人数 50.8 万。Kiva 目前在 56 个国家有贷款业务，贷款人分布的乡村有 209 个，46 万人接受贷款，其中 81.68% 的贷款给了妇女创业者。与 Kiva 合作的小额贷款机构有 125 个，还款率 98.99%。

来源：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gjal/201306/b33d8a4afed446a98bb568d9cf69ad34.shtml>

[【返回目录】](#)

盖茨基金未来十年主推避孕 从源头解决贫困

据美国新闻网站“每日野兽”报道，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共同创办人之一梅琳达·盖茨近日表示，该基金会未来十年的工作重点是推广家庭计划生育，以及为女性提供有效的避孕措施。

梅琳达在接受访问时讲述了一位尼日尔母亲的遭遇。尼日尔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非洲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已经是 5 个孩子母亲的 Sadi 告诉梅琳达，她已经很难养活这些孩子了，更不用说再添上一个，但是村子里的卫生院和 15 公里外邻村的卫生院都不提供避孕针，她无法决定是否怀孕。

正是千万个跟 Sadi 一样无法获取有效避孕措施的母亲遭遇让梅琳达及其合作创办的基金会决定，把为每个女性提供有效可靠的避孕措施，让她们能够自主决定要不要孩子和什么时候要孩子作为未来十年的工作重点。

实际上，女性有效避孕的问题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随着各种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介入，这个问题便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近年来，随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世界又开始重新重视起这个话题。

2012 年 7 月，该基金会和英国政府联合主办的“计划生育峰会”在伦敦召开。该峰会计划在 2020 年以前筹资 4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45 亿元）为 1.2 亿名女性提供有效的避孕措施。

有调查发现，计划生育对女性本身和她们的家庭影响十分巨大。能自主选择节育措施的家庭生活更富裕，母亲的经济来源更多，孩子更健康，接受教育的时间也更长。

由于盖茨基金会的努力，如今，家庭计划生育问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该基金会在捍

卫女性权利方面的重要地位的讨论又被重新提上了全球卫生议程

目前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制定相关的计划生育策略，也采取了许多新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梅林达表示，目前所做的努力较之从前并不是换汤不换药，现行的措施旨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为女性提供她们迫切需要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教育、医疗服务和有效的节育手段。

应女性自己的迫切需要而推行的计划生育计划与从前有根本的区别。以往的计划生育几乎都是在政府的强制手段下实施的，而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推行的计划则完全是基于女性自身的要求。

但是，盖茨基金会的主张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反对和质疑。一方面，支持合法流产的人责怪该基金会并没有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而另一方面，反对者坚称避孕有损道德，坚决反对生育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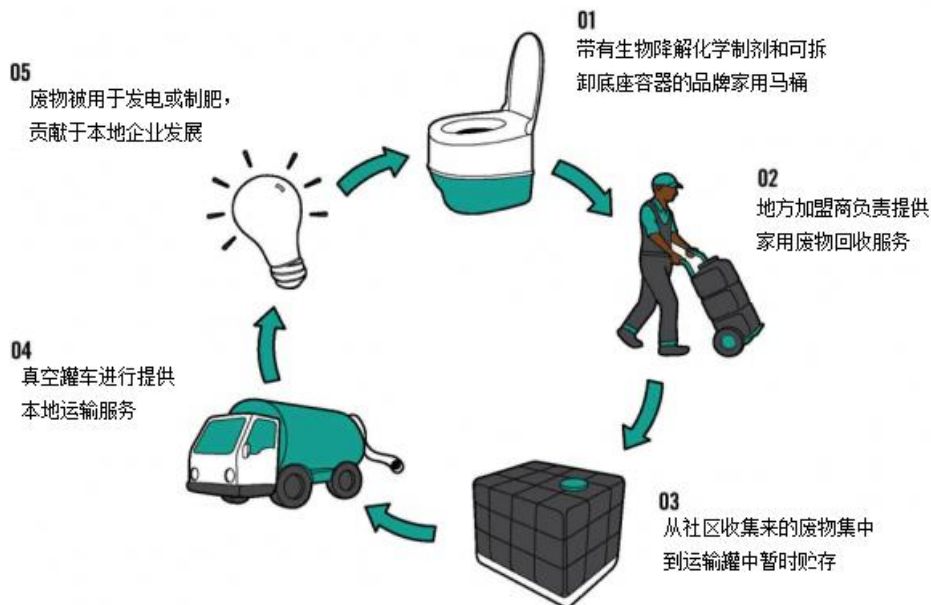
对此梅林达认为，基金会的努力都是为了帮助女性生活得更好，所以一切工作都将从女性的角度来考虑。在相信她们有权利决定是否怀孕的同时，也坚信她们有能力为自己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来源：环球网

地址：<http://hope.huanqiu.com/globalnews/2013-06/3998297.html>

[【返回目录】](#)

廉价马桶改善非洲家庭卫生



联合国资料显示，全世界有 26 亿人口生活在未达卫生安全标准的环境里，约 800 万人在室外就地排泄。随着人口的增长速度及乡村迁徙，仅采取污水处理是不够的，必须提供成本低、系统性

的解决方法。

非营利组织 **Water and Sanitation for Urban Poor**（以下简称 **WSUP**）和联合利华决定找一个和它们有良好关系，并愿意付钱提升环境卫生的地区，来进行一项家庭卫生计划，非洲加纳的库马西雀屏因此中选。设计界的龙头公司 **IDEO** 也加入了这项计划，并于 2010 年一起去当地进行了田野调查。

在加纳，公共厕所虽然普遍，但周遭的卫生环境让人不敢恭维。客户都是平日努力工作，为家庭牺牲奉献的人。他们希望家人能够拥有更好的卫生设施，而不是走一段距离到公共厕所排长队。**Clean Team** 因此将自己定位为提供专业、可靠和稳定的产品及服务的品牌。在非洲，品牌是很重要的，将有助于人们对于不熟悉的新产品或服务产生信心。当然，在供给端也必须要信守承诺，提供相应的服务。

IDEO 根据研究报告显示的当地民众需求，设计了“高接触服务性厕所（在向顾客提供服务时，保持较多的面对面的接触机会。如一般餐厅为高接触服务，自助餐厅则为低接触服务。）”计划，主要是透过价廉物美的家用马桶来提升家庭环境卫生。而这个计划之后演变成了 **Clean Team** 这个社会企业。

Clean Team 在库马西地区进行实验性计划，少量制造马桶，并提供租借和清理的服务。**Clean Team** 一开始的目标客户是家中没有厕所的中低收入社区，后来延伸至希望提供廉价服务的其他社区。针对客户需求设计的商品一定会有市场，这与目标客户一开始有没有意愿为环境卫生的提升付费无明显关系。

为了达成提升家庭卫生环境的这个理念，**Clean Team** 第一步是大量生产价廉、质精且耐用的马桶，然后发展清洁马桶的化学制品及设备；最后则希望能将废弃物转为生质能源。现在 **Clean Team** 正和 **WSUP** 一起重新设计厌氧消化的流程以降低成本和增加机动性，未来会持续引进新科技来创造废弃物的附加价值。

在 2011 年，**IDEO** 帮 **Clean Team** 设计了制服、广播宣传和广告海报。2012 年，史东基金会和盖兹基金会资助了资金，用来制造一千个马桶。

2012 年四月，**Clean Team** 开始和加纳当地的公司合作；六个月后，一千个马桶通过了生产线，并送至客户的手中。至 2013 年二月底，**Clean Team** 已拥有超过二十名员工，而家庭卫生计划已使超过两千人受益。他们的目标是在 2014 年，客户数达到一万名，并使七万人受益。

制造一个马桶的成本大约在五十至六十美元。目前 **Clean Team** 不对使用马桶收费，但收取视次数而定的污物处理费，一个礼拜提供两到四次服务（一个礼拜两次，月费十美元；三次，月费十五美元；四次，月费二十美元）。污物在收集之后会送到污水处理系统，**Clean Team** 打算把这些废

弃物用做生态能源处理或作为肥料卖给农场。Clean Team 也和盖兹基金会研制更完善的污水处理程序。

来源：社企流

地址：<http://www.seinsights.asia/news/131/1159>

[【返回目录】](#)

◎企业社会责任

“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在京召开

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暨“2012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发布典礼昨日在北京举行，论坛汇集国内外关注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专业人士，分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发展的新趋势，探讨社会关切的重要议题，共同促进中国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商务部世贸司副司长刘毓骅表示，本次论坛深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与中国梦的关系，分享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先进经验、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优秀实践、倡导企业跨界合作等，这些议题非常值得关注，“只有充分反映现实，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社会责任建设才更有价值，更有生命力”。

论坛发布了“2012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经过近 6 个月的工作，共有 362 家企业参与，经过提交评估问卷和“责任竞争力”实践案例及专家委员会的审核，26 家企业获得“金蜜蜂企业”，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的先锋榜样。

2007 年以来，《WTO 经济导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寻找蜜蜂型企业活动，宣传和鼓励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积极支持和帮助有履责意愿的企业，呼吁培育责任消费和责任投资的市场机制和环境，推动全社会形成鼓励企业履责的良好氛围，覆盖区域由 2007 年度的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到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已经发布 6 次，累计已有 1800 多家企业主动参加活动，168 家企业成功入选成为“金蜜蜂型企业”，120 多家企业成为“金蜜蜂入围企业”。

论坛由《WTO 经济导刊》、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联合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共同主办，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的代表、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等 400 余人参与论坛。

来源：人民日报

地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606/c1001-21765218.html>

[【返回目录】](#)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榜发布

2013 年 6 月 8 日讯，北京，今日，第八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暨“2012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发布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政府部门、企业界的代表、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等 400 余人参与论坛。论坛由《WTO 经济导刊》、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联合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CSR Europe）、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CBCC）、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HRM）共同主办。

连续 8 年举办论坛，今年聚焦“责任共筑中国梦”“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已经连续 8 年举办，每一届论坛的主题不断深化，探讨内容更加广泛。2013 年，在“建设美丽中国、共筑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下，绿色低碳、生态文明、幸福和谐等作为社会责任领域的关键词，为全社会空前关注。这些关键词，同时也是以“金蜜蜂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共同关注，并成为“金蜜蜂企业”发展的方向和基础。

社会责任管理作为未来企业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实现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系统、全面的社会责任管理；不断深化责任理念、完善责任管理措施和行动，是“建设美丽中国、共筑中国梦”的重要路径。

商务部世贸司副司长刘毓骅表示，本届论坛深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与中国梦的关系，分享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先进经验、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优秀实践、倡导企业跨界合作等，这些议题非常值得关注，“只有充分反映现实，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社会责任建设才更有价值，更有生命力”。刘毓骅说。

秉承以往论坛的国际化及专业化特色，本届论坛汇集国内外关注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领域专业人士，分析、交流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发展的新趋势，探讨社会关切的重要议题，共同促进中国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社会责任发展新趋势”的主题论坛中，来自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日本企业市民协议会以及德国、瑞典、西班牙和英国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地区和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最新进展和未来趋势。

“金蜜蜂 2020”倡议新增 2 家标杆企业今年，“金蜜蜂 2020”倡议已经发布了两周年，2011 年，《WTO 经济导刊》联合 11 家标杆企业，就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发起了 10 个议题。如今，伴随着“金蜜蜂 2020”倡议所涉议题的全面展开和逐渐深化，一大批金蜜蜂的先锋企业在实践中有意识地通过借助于自身的核心优势，选择与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领域，不断创新企业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交流的形式，积极鼓励和带动更多的企业参与到“金蜜蜂 2020”倡议的实践中来。

今年，两家新加入的标杆企业发起了新的项目：由宜信公司发起了“普惠信用”议题下的“信用创新 惠普大众”项目、华衍水务集团发起了“水资源”议题下的“水资源保护·思源”项目。

“金蜜蜂 2020”倡议发起企业相互沟通了倡议行动进行中的困难和挑战，并分别展示了未来的发展计划。

在平行分论坛环节，伊顿、南方电网公司、巴斯夫等金蜜蜂 2020 发起企业与诸多利益相关方、合作伙伴一起就各自所发起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两年来，在标杆企业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参与社会责任的实践活动，主动性和自觉意识逐渐提升。这些行动路线与成果，共同体现着倡议之初设立的“共同愿景、共同行动、跨界合作、共享价值”四大关键词的精神，“金蜜蜂 2020”已成为中国社会责任理念传播与实践推广的重要平台，正在引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迈向更深入、更高效的崭新阶段。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第 6 次发布，26 家企业获评“金蜜蜂企业”称号

会议隆重发布了“2012 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

经过近 6 个月的工作，共有 362 家企业参与，经过提交评估问卷和“责任竞争力”实践案例及专家委员会的审核，26 家企业脱颖而出，荣获“金蜜蜂企业”，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的先锋榜样。

来源：北京晚报

地址：<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35992>

[【返回目录】](#)

“中国企业社工培育计划”企业社工认知度调查在京启动

5 月 21 日“中国企业社工培育计划”企业社工认知度调查在京启动。本次调研活动是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指导下，由易才集团、恩三基金会及公益时报社联合北京零点指标数据公司共同发起的公益活动，旨在通过对企业社工课题的调查研究，了解企业和企业员工对社工的具体需求，培训相关人员企业社工技能，指导企业社工相关工作，在服务企业员工的同时唤起社会公众对企业社工的了解和关注，建立企业社工服务指导中心，建立企业社工服务模式，为今后全面深入开展社会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据悉，本次调查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中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成都为调查重点，计划历时两个月时间，采用定性深访与定量访问相结合的方式，访问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企业社工、

社工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企业社工领域专家学者五类人群。通过对他们的走访调查，了解企业社工认知度、企业社工发展现状、受益人群满意度、现阶段企业及企业员工核心需求、企业社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感知与需求等五个方面内容。

企业社会工作是当今许多西方企业应对雇佣关系的通用策略。该策略源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员工协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简称 EAPs), 后来被美国企业界普遍借用。它是由企业为员工设置的一套长期、系统的福利支持项目, 涉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职业健康和安全、家庭生活、维权行动、裁员和退休服务以及日间照顾等项目, 并雇有专业社工参与执行, 这些社工称为企业社工(Corporate Social Workers, 也有称 Industrial Social Workers, 或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ers)。根据企业的规模或性质的不同, 有内置模式、外包模式、联合模式、协会模式等。

事实证明, 企业社工在介入和调节雇佣关系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把社工专业服务延伸到企业领域, 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服务企业员工、管理者和消费者, 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与企业有关的社会公共政策, 以员工身心健康、职业发展与规划、社会参与为主要内容, 以推动社会、企业与员工的共赢发展为目标。

来源: 公益时报

地址: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qycsr/201306/3d0fe2fcdb644b1f9aef4d928ab7ad9.shtml>

[【返回目录】](#)

《2012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基准报告》发布

近日,《2012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基准报告》发布, 报告在分析 2012 年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基础上, 公布八大主要发现, 其中指出, 中国企业责任竞争力实践处于较高水平, 但比去年(2011 年)有所下降。

据统计, 报告评估共发出问卷 1500 多份, 收回有效问卷 309 份, 回收率约 20.6%。其中, 有 19 份非企业组织问卷, 95 份样本提供了责任竞争力典型实践案例。本次基准报告揭示了八大主要发现:

1.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处于深入发展平台期, 寻找“蜜蜂型”企业活动影响持续扩大。

2007 年至 2012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平均得分率从 50.81%增长到 61.41%, 中国企业社会责

任实践处于发展的变盘期。寻找“蜜蜂型”企业活动在地域覆盖率、参与企业数量等方面持续扩大影响。

2. 领袖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水平全面优于成长型企业。

领袖型企业总体得分比成长型企业高 75.76 分，得分率高出 21.05%，在战略与治理、与利益相关方关系、信息披露和责任竞争力四方面全面优于成长型企业。

3. “领导重视、战略融入、规划先行、组织保障”成为社会责任管理推进的基本路径。

企业从战略层面深刻认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设立或明确社会责任管理部门，制定社会责任规划，将社会责任与日常管理和运营紧密融合，但总体上社会责任管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4.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和绩效不断提升。

参评企业普遍重视对投资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环境等利益相关方履行责任，依据对自身影响的重要程度，有序开展各具特色的社会责任实践，但是社区、行业等利益相关方履行社会责任的绩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5. 企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参评企业更加重视社会责任沟通，已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的比例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纸质邮寄和电子邮件报告的方式，更加重视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有效性，更好地发挥报告沟通的价值。

6. 企业责任竞争力实践处于较高水平，但比去年有所下降。

参评企业注重运用专业优势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责任竞争力得分率为 74.44%，除过程创新得分率不超过 70%外，其余各项指标得分率均超过 70%。与去年相比，责任竞争力实践各个指标得分率均有所下降。

7. 在华跨国公司对在中国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普遍持积极态度。

在华跨国公司普遍重视社会责任工作，将社会责任管理与日常运营紧密结合，积极开展员工本地化、本地化采购、环境保护、社区参与和发展等社会责任实践，并通过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方式面向利益相关方传播。

8. 非企业组织日益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成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新生力量。

以行业协会（联合会）、学校、医院为代表的非企业组织在执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防治商业腐败与贿赂的措施等的必尽责任方面做得相对较好，比较关注对出资人、监管部门、政府、客户、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实践，但普遍还未将社会责任内容融入发展战略。

为此，报告提出建议：1. 营造更加宽松、和谐，有利于企业履责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完善企业履责的外部约束，增强企业履责的内部动力。2. 推动企业将社会责任与实际运营相结合，逐步形成

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基础的新的管理方式和体系。3. 进一步明确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诉求，提升对利益相关方履责的水平和绩效。4. 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增强企业运营的透明度。

报告认为，2013 年，在“建设美丽中国、共筑中国梦”的愿景之下，绿色低碳、生态文明、幸福和谐等作为社会责任领域的关键词，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些关键词，成为以“金蜜蜂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共同关注，并成为“金蜜蜂企业”发展的方向和基础。

对此，商务部世贸司副司长刘毓骅接受采访时认为，只有充分反映现实，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社会责任建设才更有价值，更有生命力。

据悉，该报告为《WTO 经济导刊》连续发布的第六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基准报告。今年报告增加了在华跨国公司、非企业组织社会责任实践 2 个专项调查，呈现在华跨国公司和非企业组织开展社会责任实践的概况。

来源：新华网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6/09/c_124839247.htm

[【返回目录】](#)

央企社会责任：领先的尴尬

央企社会责任的领先者地位，缘何与公众感知之间存在偏差？

“2006 年仅有 4 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而 2012 年，所有中央企业全部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保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引领者的地位。”

这是近期出炉的《2012 年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专题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得出的结论。报告为我们展示了央企社会责任报告的上述成绩，也指出了不足：“虽然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整体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未来，央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还要纳入考核体系，实现硬约束。

报告质量需改进

作为《报告》的撰写方之一（《报告》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与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接受《国企》采访时指出，所有中央企业全部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报告质量比前几年有了很大提高，但尚需进一步提升。

他表示，一个好的社会责任报告必须至少具备完整性、实质性、可比性、平衡性、可读性和创

新性。

完整性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信息搜集渠道，增加对关键指标的披露。遗憾的是，2012年仍有部分企业的报告披露信息比较少，急需改善。具体来说，有7家中央企业的报告篇幅在40页以下，内容较为简略，比如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8页）、中国冶金地质总局（36页）。40页以下的报告，因篇幅较少，无法完整地披露企业有关理念、制度、管理、实践案例等信息，内容充分性有待提高。

可比性方面，要增强对关键绩效指标连续多年数据的披露以及同行业比较。具体来说，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未披露连续3年及以上的纵向可比性数据，也未披露与同行的横向可比较数据。究其原因，一方面企业可能披露定量连续可比较数据的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披露定量数据对利益相关方的意义；二是披露的方式有待提升，有些企业只披露1或2年的定量数据，而未披露连续3年的数据。

平衡性方面，不少报告“报喜不报忧”，或有选择性地披露一些轻微负面信息，对一些重大负面问题则不予说明，弱化了报告可信度。比如，中国西电集团公司、中国中丝集团公司等14家企业未在报告披露企业运营过程的负面指标和数据。中央企业要敢于承认履行社会责任的不足之处，以更加透明的方式获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和社会的认同。

钟宏武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是简单的总结材料，也不仅仅是宣传工具，需要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实践进行深度挖掘、有效梳理，并系统、客观、真实地展现。这个过程中，需要企业建立健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指标体系，发现短板、弥补空白，有效提升管理水平。

为何认同度低

除了相关企业报告质量存在一定的不足外，《报告》披露出不少亮点。如2012年，所有中央企业全部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大部分央企已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接近90%的央企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制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战略规划。

根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2012）》统计结果，地方国有企业得分（35.9）、外资企业得分（29.7）、民营企业得分（24.2）、中央企业得分为65.4分。（2011年四者得分分别为36.4、31.9、23.6、61.2）。报告显示，央企社会责任履行整体水平比较高，远高于民企、外企，也高于地方国有企业，并且央企在基础责任之外，做了很多的衍生责任。“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保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引领者的地位。”

不过，尽管央企近年来履责水平不断提高，但公众的满意度并未同步提升。央企社会责任的领先者地位，似乎和公众感知之间存在偏差。

相关人士分析称，造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公众期望值高。公众会认为央企占有大量公共资源，社会责任履行应该非常好，已远远高于对一般企业的要求。一般企业经营

不善可以破产，央企不行，比如裁员等市场机制下企业应有的市场行为在央企身上不好用。尽管央企站出来做了一些事情，但与公众的期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公众不满足。二是公众对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时有矛盾，很难回应。比如，央企做公益捐赠，捐少了，会有批评声音指出，财大气粗的央企就捐那么一点，国家养你何用。捐多了，同样会有批评声音，央企是全民的财产，怎么能随意处置，充当慈善明星呢。对于此类社会责任实践，企业很难把握住尺度。三是我国正处于改革深水期，很多矛盾集中在央企身上体现。比如收入分配。客观来看，特殊企业存在收入过高的问题，竞争性央企收入不是那么好。但经理人工资是由经理人市场决定的，与是否是国企没有关系。经理人都打工的，有足够好的薪酬，才有足够的动力推动企业发展。薪酬太低，吸引不了也留不住人才。还有同工不同酬的问题，难以体现社会责任。同工不同酬好处是效率大幅提升，坏处是企业内部员工分三六九等，存在歧视和压力。另外，客观上，中央企业有跑冒滴漏的现象，也会出一些问题。但与整体经营行为相比，比例很小。相比而言，一些民营企业的出事比例很高，却很少受到关注。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公众需求，有时看坏不看好，抓大不抓小。

专家建议，央企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提升社会责任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沟通，及时披露社会、环境信息，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同。

从数据领先到口碑领先

尽管中央企业都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也都有自己的社会责任管理部门，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有很大差异。

钟宏武向记者表示，央企想“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社会责任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是企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标志。而且社会责任管理是系统理念，绝不是单一的写写报告，已成一种发展模式、竞争方式和管理策略，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他表示，中央企业不能把社会责任当作企业的一项额外工作。社会责任应该与企业行为紧密结合。它的核心是以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来指导企业开展工作。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企业，要把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管理。“中国企业，包括央企在内，绝大多数的履责水平离卓越还有相当距离。要想推进，一方面要靠外部体制机制的改进，另一方面要靠企业进一步深化认识，提升责任感，健全责任管理体系。”

钟宏武对此举了个例子。一座大楼的电路出了问题，电力公司怎么做才是负责任之举？立刻抢修？还不够！电力公司首先应该为大楼提供应急供电车，先保障客户用电，然后再进行电网维修。从先抢修到先供电，是企业从本位主义到服务客户的转变，也是企业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到企业经营行为的基本体现。

“央企的产品和服务没有问题，如果问题出在供应商或合作伙伴上，央企能不能发挥作用、尽

社会责任了吗？答案是能。”钟宏武表示，央企可以开展供应链审查，对合作方应尽的责任提出要求，比如不能雇用童工、污染环境。中央企业目前没这么提也很少这么做，以后肯定是发展方向。企业必须超越以往的“效益管理”，在思想方式和经营方式上向责任管理转变，尽管这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和司空见惯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做斗争。

可喜的是，央企履行社会责任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据《国企》记者了解，在 2008 年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 2011 年发布《中央企业“十二五”和谐发展战略实施纲要》的基础上，国务院国资委于去年 5 月成立了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指导委员会。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在研究制订《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指引》，探索建立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引导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节能环保、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好带头作用，不断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出资人启动了硬约束，这对央企履行社会责任是个强有力的推动。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们相信，从数据“领先”到口碑“领先”，是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更是破解领先者却认同度低如此尴尬的关键。

来源：人民日报

地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6/11/c_124839484.htm

[【返回目录】](#)

福特汽车全面拓展对草根环保 NGO 支持力度

福特汽车环保奖金增至 200 万元，草根环保 NGO “绿色晋级”计划全面升级。

上海，2013 年 6 月 5 日—— 恰逢全球第 42 个世界环境日，福特汽车于今日宣布，全面启动 2013 福特汽车环保奖及草根环保 NGO “绿色晋级”计划。本届福特汽车环保奖突破性地增设“社区参与创意”奖项，并大幅度提高奖金总额至 200 万元，用以奖励优秀的草根环保团体及个人。此外，作为福特汽车环保奖的重要补充，去年启动的草根环保 NGO “绿色晋级”计划在今年得到全面升级，包含“绿色 NGO 能力建设培训”、“导师计划”、“绿色 NGO 孵化项目”、“NGO 学习网络建设项目”及“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五大部分，旨在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能力建设培训，助力草根的环保力量茁壮有机成长，并借此拉动全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与参与。

“福特汽车始终致力于推出更精良的产品、建立更强劲的业务、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作为福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福特中国于 2000 年启动了福特汽车环保奖，并延续至今”，福特

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礼祥表示：“与此同时，我们深知，环保事业需要社会各界携手相持共同努力，而对草根环保力量的支持，也需要更加可持续、系统化的机制。从 2012 年起，福特汽车引入新的战略合作伙伴——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社会创业家学院。希望借鉴恩派在草根环保 NGO 组织建设方面的专业经验，更好地为民间环保力量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十四年携手相持，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自 2000 年启动以来，福特汽车环保奖始终致力于引导和鼓励民间环保力量的发展，至今已发展成为中国目前由企业独立运作、卓有声誉的环保奖评选活动。与此同时，福特汽车积极探索创新的理念与实践，以期为基层的草根环保 NGO 提供更多实效性的帮助。其中，去年启动的“绿色晋级”计划可以算是一次积极有效的试水。项目取得的巨大成功给福特汽车环保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经验——除了奖金，草根环保 NGO 的长效可持续发展更加需要其源自内部的有机生长能力。

为了更好地了解草根环保 NGO 的生态与现状，从而使奖项未来的设置能够更好地吸引、协助、促进这股环保力量的发展，福特汽车委托其战略合作伙伴恩派，以 2000 年到 2012 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的获奖项目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及专家访谈的方式，对奖项 13 年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整理形成《福特汽车环保奖历届获奖项目现状调查——暨中国基层环保力量发展调研报告》。

调研显示，一方面，福特汽车环保奖使得相关项目获得了资金支持，并赢得了当地政府、媒体、公众更多的关注，提升了其社会影响力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也借由此，对当地的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获奖项目目前大多还存在着系统化、专业化、可持续性发展水平不一、能力较弱的情况，在项目管理、人才培养、及宣传推广等方面的能力亟待提高。

从“授人予鱼”到“授人予渔”及社区参与，合作共赢

结合福特汽车环保奖多年来对中国草根环保 NGO 发展趋势的主观经验，并参考《福特汽车环保奖历届获奖项目现状调查——暨中国基层环保力量发展调研报告》的客观结论，福特汽车及其战略合作伙伴恩派重新规划了 2013 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的奖项设置及“绿色晋级”计划。全面升级的 2013 福特汽车环保奖及“绿色晋级”计划助力草根环保 NGO 全面加强其硬件和软件，实现更加可持续的有机生长。

纵观福特汽车环保奖近年来的申请项目，福特发现，和以往大多以个人或小团体为单位开展小范围的环保活动不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草根环保 NGO，成功地通过与社区合作，更加行之有效地将环保的理念与实践普及给广大公众。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副主任丁立也向福特汽车环保奖提出建议：“环保领域的动员能力最重要，环保最终是要改变人的行为，因此需要大量的人的参与。未来福特汽车环保奖可以考虑更多地支持环保机构的动员能力的培养。”考虑到社区合作项目

的巨大辐射效应，本届福特汽车环保奖特意增设“社区参与创意奖”，并追加奖金 50 万元，专门用以奖励创新性的社区环保理念与实践。

2013 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奖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 万元，设有“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自然环境保护——传播奖”、“社区参与创意奖”三类奖项。在此之前，福特汽车环保奖在 13 年间累计授予奖金 1, 410 万人民币，共有 301 个中国大陆的优秀环保团体或个人获得了奖金资助或提名鼓励。

除了大幅提高的奖金额度，福特汽车此次还给草根环保 NGO 们带来了全面升级的“绿色晋级”计划，包含“绿色 NGO 能力建设培训”、“导师计划”、“绿色 NGO 孵化项目”、“NGO 学习网络建设项目”及“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等五大部分，旨在通过全方面的能力建设培训，提升草根环保 NGO 的软实力。

绿色 NGO 能力建设培训

2012 年，福特在其合作伙伴恩派的支持下，对中国 100 家草根环保 NGO 进行了能力建设培训。2013 年，福特将优化 NGO 培训课程的开发和设计，围绕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媒体传播三方面的话题，开展多场次的学习交流互动，让更多的草根环保 NGO 获益。

导师计划

在 2012 年的“绿色晋级”计划中，福特和恩派合作，进行了第一次导师计划的尝试，对 19 家机构进行了为期数月的一对一的导师辅导，结果显示，所有机构的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2013 年的“绿色晋级”计划中将继续延续针对重点项目的“导师计划”。此外，今年的导师计划在导师与 NGO 的匹配，辅导的方式与流程，导师在地化辅导等方面都有了更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绿色 NGO 孵化项目

今年的“绿色晋级”计划还全新引入针对初创期绿色公益组织的“绿色 NGO 孵化”概念。项目将为加入“孵化项目”的初创期组织提供硬件设施（办公场地、办公设备）、软实力培训（陪伴成长、咨询支持、能力建设）、财务支持（小额补贴、注册协助）等方面的全方位孵化手段，辅助它们平稳度过最易夭折的初生期，同时建立有机的生长机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NGO 学习网络建设项目

此外，为了突破资源的限制，为更多的草根环保 NGO 提供经验交流分享的平台，福特创新性地提出了“NGO 学习网络建设”的概念。项目由福特和恩派牵头，以地域为划分为草根环保 NGO 建立简易便捷的沟通平台，同时鼓励参与者积极互相分享自身的知识、经验、资源，建立自助互助的学习网络。

环保 NGO 系列工作坊

今年的计划还增加了福特汽车“更美好的世界”系列工作坊，针对草根环保 NGO 提供免费能力建设培训，旨在让草根的环保公益人在互动性极强的学习环境中，接触到最前沿的理念，体会多重角度的思考方法，并且有效地将所学知识与能力付诸实践。“自福特公司创立之初，就把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的核心要素之一”，福特汽车公司基金与社区服务项目总裁 Jim Vella 先生表示，“福特汽车环保奖在中国创立十四年并坚持至今，资助和鼓励了众多充满活力、梦想与坚持的草根环保团体和个人。这股来自民间的环保力量正是推动中国环保事业不断发展的生力军。去年，福特汽车公司基金投资了 25 万美金，用于草根环保 NGO 的能力建设培训。今年，我们将投入超过三倍的资金支持，用以扩大并加强草根环保 NGO 的能力建设培训，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

2013 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为“同呼吸 共奋斗”，旨在释放和传递建设美丽中国人人共享、人人有责的信息，倡导在一片蓝天下生活、呼吸的每一个公民都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切实履行好呵护环境的责任，自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对于福特汽车来说，环境保护从来都不是在“世界环境日”的应景之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福特还将赞助若干往届获奖团体，在全国各地举办“绿色环保接力”活动，希望通过点面结合的辐射效应，传播环保理念、推广环保实践，影响带动更多的普通公众，让绿色的力量溢满中华。

来源：MSN 中文网

地址：http://auto.msn.com.cn/auto_industry/20130608/1573439.shtml

[【返回目录】](#)

信息技术助力南京非营利组织实现高效管理

6 月 6 日，由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2013 微软非营利组织信息日主题论坛——IT 新技术助力非营利组织效率管理”在南京成功举行。超过 50 家来自南京及江苏地区的非营利组织参加了此次论坛，并与政府领导，公益专家，行业同仁和微软员工志愿者积极分享、探讨如何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在志愿者管理、传播管理方面提升效率，有效促进当地社区建设和健康发展。

“微软非营利组织信息日（NPO IT DAY）”是微软中国致力于以信息技术提升非营利组织信息

化水平的公益项目，通过新技术交流与信息技能培训协助公益组织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南京市委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书记许宏，雨花台区区委副书记杨明和雨花台区民政局局长宋海红出席了本次活动并致辞，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兼江苏省总经理孙建东及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丘仲辉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以及信息技术行业的领导者，微软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为非营利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信息技术方面的有力支持。南京在公益组织发展、社区建设方面出类拔萃。此次‘微软非营利组织信息日’走进南京，就是希望以微软一己之长协助当地公益组织在资源管理等问题上有所发展突破。”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兼江苏省总经理孙建东表示，“南京是我国集历史人文和现代化发展为一体的重要经济，文化枢纽，也是微软十分重视的新兴市场。自 2003 年成立南京分公司以来，微软在江苏地区持续投入，并利用自身的特长和优势支持江苏省软件产业发展和信息技术人才培养，通过创新技术为当地公众服务。”

据了解，南京市活跃着各类社会公益组织近 1.8 万家，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之首，每个社区均有 10 个以上社区社会组织，开创了独具南京特色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南京市委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书记许宏表示：“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独立公共主体，在价值引导、行为带动、资源动员、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南京市政府将继续扶持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授权相关社会组织承担更多公共服务领域职能，创造各种合作条件，使社会组织与政府形成有效的功能互补机制，构建新型公共服务体系。此次微软非营利组织信息日活动为南京当地公益组织搭建了信息化问题的重要交流平台，促进了当地社会组织的信息化发展，有助于提升整体公益环境。”

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丘仲辉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随着我国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及公众对公益组织的管理能力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益组织只有在项目实施，人才管理，合作伙伴联络，公益传播等多维度平衡发展，才能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壮大。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将促进公益组织的运营效率在各维度上显著提升，直接影响公益组织的结构性升级和发展。‘微软非营利组织信息日’南京站活动为江苏省乃至全国的公益组织应用信息技术实现管理突破提供了先进经验。”

本次微软非营利组织信息日包括了“案例分享”、“诊断堂”、“技术推荐”以及“软件技能培训”等环节。在案例分享部分，牵手上海志愿者服务中心介绍了自身卓有成效的志愿者管理方案，全球青年实践网络 CAPE 和益云社会创新中心也分别分享了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志愿者高效管理及公益传播的经验。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经理金莹介绍了通过使用微软公有云产品实现跨组织、跨地域的便捷及时沟通、高效协同办公，从而更好地管理志愿者和服务社区的案例，为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参考。

微软公司员工志愿者们也积极参与了此次活动。在诊断堂环节，微软志愿者们与非营利组织代表一起进行案例探讨并就非营利组织在日常管理中遇到的信息技术应用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微软中国还派出了一名专业培训师，在下午的培训专场与到场的非营利组织代表们分享了高效应用日常软件的方法与经验。

“微软非营利组织信息日”自 2010 年起在中国开展以来，已成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及非营利组织沟通交流的有效平台。通过本次南京站活动，微软携手南京市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一道为当地社会组织的发展搭建了软实力促进平台，为社会组织信息化管理能力的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闻背景资料：

微软非营利组织信息日（Microsoft NPO IT Day）是微软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主题活动，旨在协助非营利组织通过使用信息技术，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迄今已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成都成功举办五届，每期活动都根据当地公益组织的需求量身定制。在中国，微软通过非营利组织信息日活动，倡导并促进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IT 业界同仁分享经验，交流观点，开拓思路，学习技术，共享资源，协调行动，进而达到协助非营利组织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透明度，提升竞争力的长远目的。

来源：新浪公益

地址：<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6-06/101143244.html>

[【返回目录】](#)

◎公益布告栏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关于举办基金会培训班的通知

各基金会：

根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委托，由“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资助，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拟于7月初在北京市举办一期基金会培训班。现将培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班时间、地点

时间：2013年7月1日——2013年7月4日（7月1日报到）

地点：北京市新闻出版干部学校（北京红螺钟磬山庄）

地址及电话：北京市怀柔区红螺路5号红螺寺西侧，010-60681145

抵达方式：

1、机场到酒店：岗山村南站乘坐850（快）或850路至东直门站下（50分钟），在东直门交通枢纽中心外地铁口换乘867路（东直门—红螺寺）至红螺寺下车即到。

2、北京南站到酒店：乘坐地铁4号线至宣武门站换乘地铁2号线，东直门下车，在东直门交通枢纽中心外地铁口换乘867路（东直门—红螺寺）至红螺寺下车即到（1.5小时）。

二、培训内容

培训班拟邀请国内外专家和民政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就发达国家基金会和我国基金会的募捐模式，以及我国基金会行业发展以及规范管理等方面进行介绍和解读。

三、报名方式

地方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可通过传真或邮件形式，填写培训人员报名表（见附件）报相应登记管理机关，由地方登记管理机关将信息汇总后报我会。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请直接向我会报名。

四、注意事项

（一）每家基金会可派1-2人参加。培训班名额有限，报满为止，报名截止时间6月25日；

（二）培训中食宿费由我会负责，参训学员需承担往返交通费及300元材料费。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常晓逊，霍媛媛

联系电话：010-85120282，010-85120289，18801139485

传真：010-85120282，010-85120289

邮箱：canpo_peixun@163.com

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

2013 年 6 月 8 日

附件：

本次培训班为封闭式培训，全部参训人员都将安排住宿，请务必将各项信息确认无误后填写清楚，以邮件或传真的方式按通知中联系方式报至我会，谢谢！

培训人员报名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单位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备注					

[【返回目录】](#)

“社会性别与发展：社区项目策划与管理”培训

一、培训简介

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GAD 网络）是一个由全国各地众多妇女非政府机构自愿结成的非政府、非赢利性联盟。2011—2012 年曾举办面向全国各地社会组织的系列社会性别培训，受到各地参与者的欢迎。为回应参与者需求，将于 2013 年 7 月 27 至 31 日举办一期“社会性别与发展——社区项目策划与管理”培训。

本次培训的目标为：

- 1) 增强参与者将社会性别融入项目各个环节的意识和能力；
- 2) 提高参与者应用社会性别分析及开展具有社会性别敏感项目工作的能力。

主要的培训内容包括：

- 1) 将社会性别融入项目的意义；
- 2) 如何在社区发展项目中融入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与工具、项目周期管理、干预策略与方法；

3) 策划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社区发展项目。

二、报名条件:

- 1、从事社区发展工作，所在组织正在实施或准备实施妇女/社会性别项目；
- 2、本人对社会性别有极大兴趣，愿意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奉献力量；
- 3、能够全程参与培训；
- 4、承诺在培训后三月内提交一份在项目中融入社会性别项目的工作报告。

三、报名流程

请申请者认真填写本启事所附报名表，并附上贵机构社区发展项目的简要介绍，1000 字左右。（内容含：项目目标、对象、范围、进展及有关性别方面的简要分析等）发送到指定邮箱，截止日期 2013 年 6 月 30 日。我们将于 7 月 10 日前发送确认函最终确定参加培训的人员名单。

电邮地址：gaoying710@163.com

联系人：高莹

联系电话：18802235252

四、须知:

1、对经确认参会的 GAD 网络内 1 学员不收取任何培训费用，食宿免费，报销往返于培训地点的长途交通及市内交通，长途交通方式按资助方相关规定，市内只提供公共交通；

2、经确认参会的 GAD 网络外学员不收取任何培训费用，食宿免费，但交通费用自理，如所在机构和个人实有困难可向项目协调小组提出资助申请，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给一定比例学员予全额、半额等不同资助，标准同上；

3、本次培训为 GAD 网络系列社会性别培训一部分，表现优异者若申请下一阶段培训可获优先资格。

本次培训由香港乐施会资助

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GAD）网络简介：

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GAD 网络）是一个由全国各地众多妇女非政府机构自愿结成的非政府、非赢利性联盟。

工作宗旨：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

工作手法：以倡导为主，辅以交流、培训、研究和社会活动。

工作原则：平等、开放、透明、民主。

若欲了解 GAD 更多信息请点击 <http://www.china-gad.org/>

来源：NGO 发展交流网

地址：<http://www.ngocn.net/?action-viewnews-itemid-87326>

[【返回目录】](#)

【刊物简介】

公益慈善周报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董强策划编辑，旨在为 NGO 领导人以及政府民间组织管理负责人提供一周公益慈善新闻回顾，把握当前公益慈善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从而为 NGO 机构发展与地方民间组织政策推动发挥积极作用！

【主办机构简介】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人文与发展学院先后参与了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亚洲开发银行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民政部民间组织局相关政策调研项目、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基金会项目案例研究以及众多国际与国内 NGO 的项目评估与监测项目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公益慈善领域主要关注的重点：

- 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
- 公益组织发展咨询研究
- 公益项目开发、评估与监测
- 公益组织能力建设

【刊物订退阅】

如果您的同行或相关人士希望订阅此刊物，请发送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位至 gycsweekly@gmail.com 即可。

如果您希望退订此刊物，也请直接回复上面邮箱告知。

主办机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董 强
编 辑：赵丽霞、杨文、蒋育龙、陈婉君、阳慧颖
办公电话：010-62731470
电子信箱：gycsweekly@gmail.com